

理论与实践

LILUN YU SHIJIAN



1949-1959

庆祝建国十周年专号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九五九年第十期目录

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刘少奇(2)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
广东省社联筹委会主任 杜国庠(14)

高举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繼續前进 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 戈 枫(16)

进一步开展經济学界的学术活动 广东經济学会会长 王全国(18)

为历史科学的大跃进欢呼 广东历史学会会长 杨荣国(19)

进一步开展教育学的学术活动 广东教育学会筹委会副主任 饒璜湘(21)

作好党培养和組織理論队伍的助手 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孙 孺(22)

欢呼在党的领导下教育事业的胜利 中山大学校长 許崇清(24)

高等教育事业大跃进中的一朵紅花 暨南大学副校长 梁奇达(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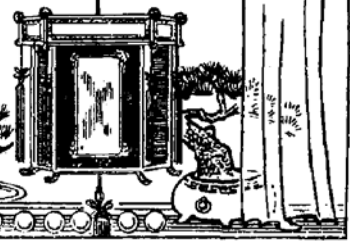
党的教育方針的伟大胜利 华南师范学院院长 王燕士(28)

培养又紅又专的人民教师 广东师范学院副院长 张海鰲(30)

为培养更多更好的中等教育師資而奋斗 广州师范学院副院长 杜伯奎(31)



和 国 成 立 十 周 年



在高速問題上我們与右傾机会主义者的分歧……丘子江(33)

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严克柔(39)

当前右傾机会主义思潮的阶级根源及其危害性……龙世雄(43)

試論国民經济的战略平衡……梁 釗(47)

——駁所謂“国民經济比例失調”的謬論

世界观与方法論的一致……王致远(51)

張載的唯物思想(上)……楊榮國(57)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及其发展問題……董家遵(62)

关于心理学若干問題的討論……吳江霖(67)

从柳永的三首詞談到有关古典文学評价的問題……王 起(75)

大众邏輯学講話(第一讲)……李匡武(79)

撫今思昔庆佳节……陈一百(82)

九斤老太的嘮叨……燕 如(83)

“借东风”及其他……賀 青(84)

动 态

华南师范学院学术研究日益活跃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举行研究工作报告会和展览会
中山大学历史系热烈討論“老子”思想問題
“中国历代人口土地田賦統計”一书已脫稿
广州市数間革命历史紀念館及博物館正式开放



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为“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杂志而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刘少奇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现在，已经有十周年了。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伟大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始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以苏联为主力军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欧亚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都表明社会主义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没落是不可抵抗的历史规律。中国革命的胜利，进一步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革命把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战线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使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制度遭到致命的打击。新中国参加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结成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在欧亚两洲连成一片、团结友好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对于一切曾经遭受过或者正在遭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落后国家的人民，中国革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感觉到，中国人能够做到的，他们也应当能够做到。所有这些，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力量对比，已经有了新的变化。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彻底的解放，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从而迅速地改变着中国贫穷和落后的面貌。

中国在全国解放后的最初三年间，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顺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使工农业生产一般地达到了和超过了旧中国的最高水平。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国人民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使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一，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使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七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四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出现了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今年又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跃进。同一九五八年相比较，今年工农业总产值，计划增长百分之二十，工业总产值计划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农业总产值计划增长百分之

十。鋼、煤、冶金設備、發電設備、金屬切削機床、棉紗、原木、糧食、棉花等項工農業主要產品的計劃產量，都將完成、超過或者接近第二個五年計劃原定在一九六二年完成的指標。中國社會生產力這樣飛速的發展，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比擬的，當然更不是在舊中國的條件下所能夢想的。

馬克思說得完全正確：“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在中國，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民主革命，沒有廢除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革命，就不會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迅速發展，就不會有象今天這樣全國人民精神煥發、意氣昂揚地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的局面。革命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無窮的希望和異常光輝燦爛的前途。

中國人民十年來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的總路線、社會主義革命的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的勝利。

在中國的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反復地闡明了這樣的思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只有認清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同時又認清二者的聯系，才能正確地領導中國革命。”^①一方面，中國革命中的右傾機會主義者正象俄國的孟什維克一樣，他們用一道“萬里長城”把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隔開，看不到這兩個革命之間的相互聯系，在民主革命中看不到有把這個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的前途。另一方面，“左”傾機會主義者又類似俄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他們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要在民主革命階段內消滅資產階級，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這兩種錯誤傾向，都曾導致中國革命受到很大的損失。同“左”右兩種機會主義相反，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指導中國革命的正確方針是：一方面，實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發展階段論，把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兩個階段的革命任務明確地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實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斷革命論，把這兩個革命密切地聯系起來，在民主革命階段就盡一切可能為將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準備條件，以便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國勝利以後，不停頓地立即展開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

無產階級經過共產黨緊緊地掌握民主革命的領導權，是保證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和由民主革命勝利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關鍵。任何中國的資產階級政黨，都提不出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綱領，都不可能把中國的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在無產階級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徹底地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鬥爭，這就是我們黨領導民主革命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概括，叫做“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②。

中國是一個落后的大國，它的農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貧農和雇農又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農民問題是我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舊中國的反動統治是極端野蠻的，人民群眾處於完全無權的狀態，進步的革命家大批地受到逮捕和殺戮。因此，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深入農村，領導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革命鬥爭，達二十二年之久。黨採取了堅決依靠農民的政治覺悟和組織力量，發動農民自己救自己、自己打倒地主、取得土地、保衛土地的群眾路線的方針（黨的這個方針一直繼續貫徹執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土

^① “毛澤東選集”第2卷，1952年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646頁。

^② “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地改革中)，而不是采取与此相反的把土地“恩賜”給农民的资产阶级的方針，就使党在农村中建立了强大的可靠的革命堡垒，建立了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把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革命纪律性逐步提高到接近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水平，并且从他们中间取得了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所需要的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后备。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的革命战争，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的土地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实际上是为准备全国胜利而进行的长期反复的伟大的演习。在这些演习中，教育了群众；锻炼了军队，积蓄了革命力量，培养了干部，并且使党的领导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经验。

因为在民主革命中建立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最密切的联盟，我们就能够正确地解决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正确地区别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封建主义的保护者和同盟者，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凶恶的敌人，必须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排挤，要求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因此，他们有参加革命或者对革命保持中立的可能。但是，他们有软弱性，有革命和反动的两面性，经常处于动摇的中间地位。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在一定的条件下联合他们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另一方面，又要同他们的妥协性进行斗争。实行了这样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就达到了壮大革命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的目的，巩固地保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割断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的联系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混淆这两个革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都不懂得农民问题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而也不能正确地处理资产阶级的問題。右倾机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采取投降主义的路线，把民主革命看成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不去依靠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而主要地依靠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并且对于资产阶级只进行联合，而不进行必要的斗争。这样，他们就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情况下，就使革命遭到失败，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挫折。就是在革命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需要抓住时机，进行决定胜负的斗争的时刻，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也不敢争取胜利，甚至要阻止胜利。

“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联合各种小资产阶级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并且错误地把中间力量作为主要的打击方向，否认在民主革命中有联合或者中立各种中间力量的必要和可能。他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进行斗争，不进行适当的联合，更不愿意利用敌人的具体矛盾，集中力量去反对最主要的敌人。结果也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使无产阶级陷于孤军作战，使革命不可能得到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忽视农民的革命要求和革命毅力，在反动统治时期，不承认我们能够农村站得住脚，能够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能够经过农村包围城市并在最后达到夺取城市的目的。所以，“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调换位置。例如王明同志，他是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人，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又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同“左”、右两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团结了全党，从而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使一个革命胜利接着一个革命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彻底地粉碎了旧中国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粉碎了它的压迫人民的官僚机构和军阀机构，从而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了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

的人民共和国，这就顺利地实现了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革命的最主要问题即政权问题上，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终结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无产阶级在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巩固地建立了自己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因而就不需要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再进行一次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由于我们党在民主革命中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的最后目的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在民主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就十分注意地确立了并且巩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结果。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国外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国内的主要矛盾则将由中国人民同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让位给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个矛盾的一系列的根本政策。中国人民在全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虽然还必须继续解决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任务，主要是在全国很大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来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任务，但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已经在一九四九年开始了。中国无产阶级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通过国家的力量，没收官僚资本，牢牢地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积极地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并且使这种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

在一九五二年年底，当恢复国民经济和肃清封建残余的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规定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在提出这条总路线的时候，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着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我们一方面同企图扼杀新中国的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团结了全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另一方面，在国内，一步不停地继续进行着社会改造和建设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这条总路线，是引导中国社会由当时的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个体经济的复杂的经济结构，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的路线。当时，有些人否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他们或者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的老路；或者企图把革命停止下来，长期保持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经济的现状。党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线肯定要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否定了从右的方面来的各种错误观点。同时，党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线又肯定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是逐步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必须是逐步的，从而否定了企图在一个早上就把资本主义消灭得干干净净的“左”的错误观点。

我们在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点的步骤。

我们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三个互相衔接的步骤。第一步，在土地改革以后，紧接着广泛地发展了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互助组织。这种互助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第二步，在这种互助运动的基础上，紧接着又发展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和主要的生产资料还是私有的，这种合作社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我们把它叫做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就是实行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建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农业合作化問題上，我們党内曾經有过不同观点的爭論。

有一种观点，認為我們工业化水平还很低，还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因此，要很快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这种观点已經被事实駁倒了。我們在基本上沒有机械化的条件下，完成了农业合作化的任务。

有一种观点，認為迅速实现合作化，势必降低农业生产。这种观点也被事实駁倒了。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和合作化以后，我国的农业生产不但沒有降低，反而不断上升，并且上升得相当地快。

还有一种观点，認為我們这样迅速地实现农业合作化，会妨碍农民的团结，就是說，除了富农以外，富裕中农也会不满甚至反对我們，而支持我們的將只有比較貧苦的农民。这种观点也被事实駁倒了。由于我們对富裕中农采取团结的政策，对富裕中农入社的大农具和牲畜采取逐年偿还代倫的政策，由于合作社生产的逐年上升，絕大多数富裕中农对合作化是基本上满意的。

总之，事实証明，我們緊接着土地改革之后“趁热打铁”，不停頓地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进行农业合作化，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好政策。如果我們在土地改革以后把革命停頓下来，让农村資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发展起来，听任农民向两极分化，那在以后要实行合作化，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就会困难得多。

我們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是怎样实现的呢？主要是对資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資本主义的各种形式而达到社会主义国有化的目的。一般說来，国家資本主义的初級形式，是对私人資本主义工业实行供給原料、加工訂貨和統购包銷，对私人資本主义商业采取让它們經銷代銷的办法；国家資本主义的高級形式，是对私人資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由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一定年限内給資本家一定的年息。

在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問題上，我們党内也发生过一些不同观点的爭論。

有一种观点，認為对資本主义工商业只应当加以利用，而不应当加以限制和改造，或者说我們限制得过多、改造得太急了。这实际上是企图让資本主义制度长期保持下去。資本主义的剝削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在同一个社会中，不是这个战胜那个，就是那个战胜这个，长期并存是不可能的。

有一种观点，認為我們对資本主义工商业又是逐步改造，又是实行贖买，又給资产阶级选举权，又給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一定的政治地位，“太妥协了”。他們認為，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我們还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統一战綫，是原則上不許可的。他們要求用对待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那样的政策去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即沒收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或者从国民經济中对資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简单的、迅速挤垮的政策，并且剝夺資本家的选举权。这些人忘記了，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取贖买政策，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的，这是馬克思和列宁多次說过的。至于无产阶级专政并不一定要剝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的問題，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也講过：“限制选举权的問題是某一国家中实行专政的特殊問題，而不是专政的一般問題。”^①

我們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是不是采取了“阶级調和”的政策呢？当然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7頁。

不是。这种怀疑是完全不懂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誤解或曲解。实际上，我們为解决这个矛盾而采取的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无产阶级的极其坚定的阶级政策，同“阶级调和”政策没有丝毫相同之处。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减少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并且在逐步改造的过程中有条件地利用了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而结果是我们能够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并且要把资产阶级分子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当然也是完全适合中国条件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好政策。

我们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这种逐步过渡的办法，并不象有些人所说的，拖长了改造的时间。相反，改造进行得很快。到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我們已经实现了农业的高级合作化，而紧跟着在一九五六年，就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与此同时，也实现了手工业的合作化。这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到七年的时间内，我們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誰战胜誰”的问题。我們在解决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几乎完全没有引起什么破坏，工农业生产一直是上升的。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是结束了呢？有人认为是结束了，再不需要进行任何革命了。我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结束，还必须继续进行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现在，我国的资本家还拿定息，在经济上作为两个阶级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没有完全消失。即使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作为一个阶级完全消灭以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而同社会主义制度相抵触。特别是资产阶级右派，还会利用这些情况，伺机向社会主义举行进攻，阴谋复辟资本主义，有时他們的进攻还会达到非常猖狂的程度。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决不能局限于经济战线上，还必须要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著作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誰胜誰負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①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都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斗争象波浪的起伏一样，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表现尖锐，有时候比较缓和。这种斗争，要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才会熄灭。

为了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要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去对待和处理这两类矛盾，并且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一九五七年，我們党发动了调整人民内部关系的全党全民的整风运动，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斗争。结果是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

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26-27页。

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地打击和削弱了剥削阶级在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中的反动影响。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政治挂帅”的方针，加强了党对经济工作及其他各种工作的领导，调整了中央与地方、领导与被领导以及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同时，党又向全国人民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口号，鼓励革命性的试验和群众性的发明创造，领导群众修改或者废除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了进行教育革命，党又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由于采取了一切革命的措施，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我国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在一九五八年春天，我们党及时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全国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就在一九五八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在全国农村中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成绩。这是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彻底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所得到的结果。

在区别两类矛盾、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些问题上，在我们党内也有过不同观点的争论。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批驳了党内各种错误的观点，因而就能够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事业中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有人说，在过渡时期存在着敌我矛盾，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是不可理解的。他们认为不要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类矛盾。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划清这两类矛盾，对于如何正确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如何正确地处理劳动人民内部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各种矛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在现在的中国，不只是存在着敌我矛盾，还存在着大量的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例如：由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还存在着差别而产生的矛盾，由于劳动人民中间遗留着剥削阶级的习惯上和思想上的影响而产生的矛盾，等等。至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以及人们由于认识上的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的差别而产生的矛盾，则是从来就存在，现在也存在，并且在以后还要永远存在下去的，只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些矛盾的性质和解决方法已经和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同了。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者在阶级完全消灭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后，人民内部就不再存在矛盾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错误的观点。

社会上所存在的各种矛盾，都必然地要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表现出来，也必然地要在我们党内的生活中反映出来。因此，我们必须学会正确地认识并且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才能彻底消灭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完成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知识分子的改造，并且调整人民内部的关系，把我们的事业顺利地推向前进。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矛盾的統一和斗争，矛盾的解决，仍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果不注意划清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就会产生几种错误倾向：看不见敌我矛盾，或者把敌我矛盾看成人民内部矛盾，不知道对待敌我矛盾必须采取专政的方法，即孤立、分化、惩办和镇压的方法，而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处理敌我矛盾，这就必然要犯错误。反之，看不见人民内部矛盾，夸大敌我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

矛盾，不知道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采取民主的方法，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法，而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说，不用说服的方法，而用压服的方法，这也必然要犯错误。此外，这两类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如果矛盾转化了，而我们的处理方法不随之而转化，也必然要犯错误。我们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的具体事例是不少的，因此，认真地认识这个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有人说，我们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策，即所谓“自由化”的政策。也有一些人担心，我们实行这样的方针，会助长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造成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所有这些人都是想错了。

我们实行这个方针，是因为我们对党的领导，对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具有充分的信心。我们采取这个方针，绝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而是实行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实行这个方针，是为了促进科学、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是为着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时候，实行这个方针，是为着便利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战胜资产阶级，肃清它的影响，而不是容许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这个方针也适用于在政治方面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仍然要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思想仍然要在同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斗争中扩大自己的阵地。对于人民内部各种不同的意见，必须让它们充分发表出来，采取批评、说理的方法，进行充分的辩论，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不错，资产阶级会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一切优势都在无产阶级方面，资产阶级利用这个口号来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对我们说来并没有什么可怕。我们从来不承认，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是合法的。我们从来就公开宣布，在我们的园地里，社会主义的百花是应当盛开的，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是应当锄掉的。问题在于：究竟采取什么方法才能够有效地消灭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呢？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思想的影响还没有肃清以前，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毒草总是客观地存在着的，并且总是经常以冒充社会主义香花的姿态出现。当人们缺少同毒草进行斗争的经验的时候，他们常常不善于分辨香花和毒草；甚至还会把伪装了的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当做社会主义的香花来加以欢迎。在我国文化工作的某些部门中，曾经有些同志因为害怕长出毒草，只准许他们所认为是香花的东西生长，其结果，许多对社会主义有益的香花被误认为毒草而受到了压制，相反地，许多有害的毒草反而能以伪装的态度在暗地滋长起来。这些同志的想法是错误的，幼稚的。其实，潜伏地下的或者以伪装面目出现的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对无产阶级专政说来是更为有害的。让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以本来面目长出地面，并不是坏事，相反地，是很好的事。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锻炼人民群众识别毒草的能力；提高人民群众同毒草作斗争的本领，从而达到放社会主义百花、锄反社会主义毒草的目的。在一九五七年，我们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同资产阶级右派作斗争，依靠人民群众击退了右派的猖狂进攻。

事实证明，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恰恰是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中的领导地位，丝毫也没有削弱这个领导地位；是提高了人民群众同反动思想作斗争的能力，丝毫也没有削

弱这种能力。这是在我国条件下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策。

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开创了一个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局面。对于大跃进的事实，人们是无法否认的。但是，有人说，一九五八年我国的大跃进不是正常的现象，在经济建设中组织群众运动，只会造成生产秩序的混乱，即使一时能够跃进，也必然引起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现象，因而国民经济的跃进局面不可能持久。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在经济建设中组织群众运动，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自觉的事业，不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就不可能有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解放了的、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创造力量。在去年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中，几千万人废寝忘餐，不计报酬，表现了热情奔放、干劲冲天、敢于创造新生活的共产主义精神，结果就使我国钢铁工业能够逐步合理地分布在全国各地，并且加速了钢铁工业发展的速度。目前布满全国的无数中小型水利工程和几十万个中小型企业，也都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发挥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办起来的。由于发动了群众，开展了“比先进、赶先进、学先进”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许多大型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劳动生产率有了迅速的提高，许多基本建设工程，大大地节约了投资，缩短了竣工的时间。事实证明，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到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来，就能够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突飞猛进的局面。

这样的群众运动的出现，绝不是一时的偶然的现象。迅速地改变我国贫穷和落后的面貌，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强烈愿望。他们既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了解放，他们的这种愿望就必然要表现为行动，成为不可抗拒的高屋建瓴之势。在正确的领导下，这种群众运动一定能够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跃进发展的最积极的、经常的因素。我们的群众运动是在党的集中领导下进行的。党的领导是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把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和物质鼓励结合起来，而以政治为灵魂、为统帅。因此，在党的领导下，就能够形成和经常地保持社会主义建设的广大群众性的运动，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在建设事业中的积极性，使广大人民群众经常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并且依靠工人、农民和工程技术人员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来不断地增加现代化生产工具和发展现代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只要我们这样做，我国国民经济跃进的局面就能够持久地保持下去。这是毫无疑问的。

群众运动发展起来以后，是会要破坏一些原有的生产秩序的。但是，它所破坏的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旧秩序，而在同时又建立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新秩序。在一九五八年，我们通过群众运动，在企业中调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行了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实行了领导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几方面在党委领导下密切结合的制度，同时有领导地改革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结果就大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生产水平。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凝固的东西。有领导地改变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就是充分发挥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要这样做，就要依靠人民群众，同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的习惯势力作斗争，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只要我们这样做，就能够推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就能够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就能够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的跃进。

列宁说过：“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

的运动。”^①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大跃进中，我們真正看到在我国出现了这样的群众性运动。非难群众运动的人，他们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指手画脚，向群众泼冷水，散布泄气、埋怨和悲观的情绪。他们对待群众运动，完全不是共产党人所应有的满腔热情的态度，而是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

有人说，采取跃进的速度，会违反客观经济规律，会引起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但是，我们的事实完全不是象这些人所说的。我们的跃进，恰恰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轨道上出现的新事物。客观经济规律是不能违反，而必须遵从的，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也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跃进发展。我们党的总路线包括一整套“同时并举”的方针，就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后来大家给这套方针一个通俗的名称，叫做“用两条腿走路”。采取这样的方针，就可以在经济建设的跃进中避免各种片面性，例如：只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只重视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只重视大型企业而忽视中小型企业，只重视中央对工业的统一管理而忽视地方发展工业的积极性，只重视洋法生产而忽视土法生产，等等。这就是说，我们党的总路线正是要求在高速发展国民经济的时候，把客观可能性和主观能动性统一起来，注意各种比例关系，遵从客观经济规律。从去年以来的大跃进中，我国国民经济各门类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总的说来都是协调的，相适应的。虽然出现了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失调现象，但是很快就被我们发现并且克服了。这种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失调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出现了也是容易克服的。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和几个“同时并举”的方针，就可以保证不会发生长期性的、全局性的比例失调现象。

当然，我们必须做好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尽可能使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互相协调地向前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又要有高速度，又要有综合平衡。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在高速发展中有较多可能出现某些不平衡现象。但是，我们不应当前怕狼、后怕虎，贪图安宁，用不适当的降低速度的办法来达到平衡。只要我们注意总结经验，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在高速中求平衡是能够做到，也是应当做到的。

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可能每年都是一样的。有的年份较高，有的年份较低，这是正常的现象。可以肯定，我们的经济总是逐年增长的，而且我们是能够保持跃进的发展速度的。

非难大跃进和群众运动的人，同时也非难我国农村的人民公社。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超过了社会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这种非难，没有任何站得住的事实根据和理由。

认为人民公社的发展没有客观必然性的观点是不对的。他们没有看到，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是中国几亿农民群众为着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它是去年大跃进中农业生产大发展、农田水利大发展、农民办工业的积极性和农民社会主义觉悟大高涨的产物。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看到，要办水利，办工业；综合发展农业的各种经济，在各种较大规模的生产事业上实行劳动协作，所有这些，都要超出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要求在原来合作社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建立某种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组织形式，这就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拥有几千户至上

^①“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8—459页。

万户的人力，几万亩以至十几万亩的土地；能够更合理地安排人力和利用自然资源来发展农村经济，并且有利于逐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农民群众所迫切需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和集体福利事业，在人民公社中也能够大大发展起来。由于举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节省了大量劳动力，特别是使大量妇女劳动力得到了解放。农村人民公社虽然还只成立了一年，但是它在实践中已经充分显示了它的伟大生命力。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合乎中国农民要求迅速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农村贫穷和落后面貌的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是在中国条件下合乎历史规律的群众运动。这样的运动，不是什么人喊一下就会出现，也不是什么人反对一下就会垮台的。

有人認為，现在的人民公社还是实行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那就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什么区别，就没有必要组织人民公社。他们看不到，人民公社在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因而二者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其中所说的农，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在组织生产的同时又组织生活，实行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机构和公社的管理机构的合一，这些都是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没有的。尤其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现在虽然还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生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是基本的，公社的所有制是部分的；但是，这部分的公社所有制是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没有的，它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全民所有制成分。由于公社可以逐年从生产队中提取一部分积累用于社办企业，由于社办企业的发展，并且由于国家对公社的援助，公社所有制部分必将逐步扩大，以至转变为公社所有制是基本的，而生产队的所有制只是部分的。目前的公社所有制虽然还是部分的，但正是这部分公社所有制代表着人民公社的伟大希望和伟大前途。只要公社的部分所有制转变为公社的基本所有制，那就为我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人民公社在分配制度方面，现在基本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同时也实行部分带有按需分配的萌芽性质的供给制度，这也是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没有的。许多人民公社采取适当部分的供给制度（一般说来，占社员总收入中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它在目前的主要作用，是保证丧失劳动力的人和儿童的生活。这是在我国农村实行社会保险，帮助多子女家庭以及其他负担较多的家庭的一种很好的办法，是适合于农民群众现在实际生活的需要的。当然，这还不是实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原则。

有人以为，人民公社的性质只能是共产主义的，必须完全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否则，就不能称为人民公社。因此，他们认为，在现在条件下办人民公社只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他们对于人民公社作了完全机械的理解。他们不了解，我国农村现在的人民公社是一种基层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上述的各种特点，因而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容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不同程度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不同水平的生产关系。对我国说来，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既适合于目前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也将适合于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既适合于目前的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将适合于将来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有理由相信，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在我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后，也将是一种适当的基层社会组织形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公社制度是一种发展过程。在我国农村中，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能够推动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将反过来促使人民公社制度在内容和形式上得到发展。有了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以后，我们在实际上找到了在我国条件下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

主义全民所有制，以至将来在农村中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如果认为人民公社一成立就能够实现公社的全部理想，这是错误的。如果因为人民公社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就认为人民公社办得太早，最好不办，办了也要让它散掉，更是完全错误的。

非难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非难我们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些非难党的总路线的人，是些什么人呢？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就是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代表。在国内外敌对势力恶毒地攻击我们的时候，他们竟借口我们工作中某些早已被党中央发现并且已经纠正了的缺点，否认我们工作的伟大成绩，把我们的伟大事业说成似乎是黑漆一团。他们企图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阻碍今年的继续跃进，阻碍党的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我国目前的主要危险。同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克服右倾机会主义，扫除它的影响，是我们党当前的一个主要任务。

我们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得到的成绩是伟大的。现在，我们正在胜利地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广大人民群众正在响应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掀起了一个新的增产节约运动的大高潮，有力地回答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同时也回答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攻击。

我们的伟大事业正在胜利地前进。我们的党不只是同中国人民共命运、同呼吸，而且我们从来认为，我们的事业是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部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了我们以很大的帮助，全世界劳动人民和各国进步势力也给了我们以很大的同情和支持。我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日益增强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团结。我们的口号是：“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依靠这两个伟大的团结，我们的事业是无往而不胜的。

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证实和新胜利。曾经有过一种说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不适用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只适用于西方，不适用于东方。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胜利后，又有一种说法，好象马克思主义只适用于东方国家，不适用于西方国家。所有这些说法，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和他们的仆从们的奇谈怪论。事实上，自从马克思主义出现以来，不论在经济先进的国家，还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每一次历史事变和每一次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恰恰是反复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各国人民群众的斗争和革命，都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但是，不管各国革命有多大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一切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共同的历史轨道，正象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不能离开自己的轨道一样。

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毛泽东同志有一个著名的概括的说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一贯努力的就是，使自己能够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且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取得胜利的结果，无论如何，这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当然，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带有自己国家的特点。但是，某些重要的特点也可能在别的一些国家中重新出现。就这方面来说，中国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国际意义的。

让我们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前进！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 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 ☆

加強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

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院長 杜國庠
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籌委會主任

“一唱雄雞天下白”。毛澤東主席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這是十年前的事。十年，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不過是那麼短暫的一瞬間。然而，我們偉大的祖國、英雄的人民在毛澤東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卻取得了光輝燦爛的成就。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勝利，同時也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勝利。

隨着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我省哲學社會科學事業在黨的理論聯繫實際和百家爭鳴的方針指導下也日趨繁榮，取得了一定成就。

解放以來，在黨的領導下，我省哲學社會科學界開展了對帝國主義代言人杜威、胡適等的反動理論的批判，使社會科學工作者初步劃清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思想界限，逐步拋棄資產階級世界觀，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一九五七年，所有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投進偉大的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通過這場嚴重的鬥爭的鍛煉，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堅定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和信心。特別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形勢的推動下，各大專學校和科學研究機關都開展了紅專問題的大辯論和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的批判運動，進一步克服了过去脫離實際、厚古薄今、只專不紅或先專後紅的傾向，初步明確了科學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厚今薄古、又紅又專的方向。部分社會科學工作者響應了黨的號召，下鄉上山，參加勞動鍛煉。解放以來，許多社會科學工作者有了很大的進步，部分人還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黨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使我省社會科學工作者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中國科學院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成立了，許多大專學校例如中山大學、華南師院等都舉行了科學討論會，而且出現一些質量較高的學術著作。一九五八年，社會科學工作者經過整風運動、反右派鬥爭以及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在提高政治覺悟的基礎上，在工農業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推動下，密切結合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進行學術研究，收效很大。部分社會科學工作者下鄉下廠做調查研究、參觀訪問，或親自動手為勞動人民編寫人民公社史、工廠史、海員工人工鬥爭史等等。

在黨的領導下，我省掀起一個史無前例的工農學哲學的高潮，工農群眾大破迷信，紛紛成立哲學學習研究小組和其他的學習組織。廣州中一煙廠工人哲學小組寫的學哲學的小冊子出版後，受到好評。部分社會科學工作者同工人農民一起學習和研究哲學，在向工農學習的

基础上，参加工农学哲学的辅导工作，或同工人农民合作撰写哲学论文。学哲学，用哲学，蔚成风气。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高潮中，为了进一步把省、市哲学社会科学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广东哲学学会、广东经济学会、广东历史学会、广东教育学会筹委会、广东逻辑学学会筹备小组。今年五月，又成立了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筹委会，以统一对学术活动的组织领导，进一步开展学术活动。今年六月以来，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举行了十多次学术讨论会、座谈会、报告会。现在各个学会共有将近一千名的会员。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提高大专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今年暑期又举办了有二百多名大专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师参加的学习会和开办了以培养逻辑学教学力量为目的的逻辑学学习班。

总的说来，十年来，我省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方面，已经建立了一支队伍，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开展了一些学术活动和研究工作。这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基础。

但是，我们丝毫不能自满。我们的队伍还不够大，力量还不够强，许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还不够高，较有价值的科学著作还不多。这说明我省社会科学界的状况同国家大跃进的形势、同我国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同党和人民的要求比较起来，还是不相称的。基本的情况还象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整顿党的作风”）今后，我们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在已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继续鼓足干劲，认真努力。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也是一项艰巨的创造性的劳动。我们要继续贯彻党的科学为政治服务、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重大课题，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工作。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问题、不断革命论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与比例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关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问题、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问题、关于资产阶级世界观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对立问题；等等。

此外，由于我省在近百年来历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为我们历史科学工作者提供了研究我国近代和现代史方面的有利条件和繁重的任务，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还未得到应有的成就，今后如何广泛而深入地搜集和整理我省方面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资料，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科学研究，这是我省历史科学工作者无可旁贷的光荣任务；在教育学方面，我省拥有较多的研究工作者，有可能在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教育思想的批判问题、关于党的教育方针问题、发展工农教育问题、师范教育问题的研究方面，做出更多的成绩；我省过去在逻辑学的研究、宣传方面做得不够，今后也必须加强，积极筹备成立广东逻辑学学会，把这方面现有的力量组织起来，并积极培养新的力量。

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方面，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但还不深透，有些问题的批判仍未穷根究底。这方面的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为了深入开展学术思想批判，应该更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批判同反右派斗争是不同性质的斗争，前者是属于人民

內部的問題，是意識形態的鬥爭，而後者是屬於敵我矛盾問題，是政治鬥爭。我們在學術思想批判中應該開展自由討論，以理服人。這是一件細致的講道理的工作，不能用粗暴的強制的方法。有些同志對百家爭鳴的方針還有顧慮，這是不必要的。在學術問題上各抒己見，如果自己的意見對的可以在討論中得到補充和發展，如果自己的意見確實不對可以得到改正。當然，對於某些有爭論的學術性問題，如果一時還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還可以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見，不必急於作出結論。另有一些同志認為百家爭鳴，會冒出毒草。這種擔心也是不必要的。毒草是客觀的存在，總是要冒出來的，即使沒有爭鳴，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也會頑強地通過各種辦法、形式表現出來的。只要我們善於識別香花和毒草，就能夠把毒草化成肥料。馬克思主義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鬥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為了促進科學繁榮的正確方針。今後，在各大大專學校、在理論刊物上要更好貫徹這一方針，以繁榮社會主義的科學事業。

許多同志經過了黨的幫助和教育，經過了歷次政治運動的鍛煉，都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改造世界觀的問題對於部分社會科學工作者來說，仍是一個重要的不容忽視的問題。改造世界觀應有充分的自覺，要認識到世界觀的改變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我們要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學習毛澤東思想，提高自己的覺悟水平；通過自己的業務實踐和社會生活的實際鬥爭等等，來改造自己，逐步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以充分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就目前來說，我們必須堅決投身到黨的八屆八中全會所號召的“反右傾，鼓干劲”的鬥爭中，堅決擊退在我國地平綫上出現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潮，保衛黨的總路綫！並在這一場鬥爭中鍛煉我們的立場，提高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我國當前的良好的形勢，對我們進一步徹底地改造思想，是一個十分有利的條件，相信我們社會科學工作者在黨的領導和關懷下，在今後的自覺的努力中，一定會得到更大的進步。

哲學社會科學各個學會成立不久，或剛剛成立，有的正在籌備成立，在學術研究、活動方面做的組織、推動工作還僅僅是開始，經驗也不多。今後，各個學會應該在黨的正確的方針指導下，更好發揮組織領導作用，摸索和積累經驗，向兄弟省的學會學習，以進一步開展學術活動，推動我省社會科學事業。

我們同全國人民一道走完了第一個十年。我們滿懷信心，展望未來。我省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今後一定會在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光輝照耀下，鼓起更大的干劲，踏踏實實地從事科學研究和理論宣傳、教學工作，爭取在第二個十年獲得更大的收穫。

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繼續前進

廣東哲學學會副會長 戈 楓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了，這是喜事重重、令人興奮的十年。

十年來，由於黨和毛主席一貫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正確方針，我國學術界表現得異常活躍。就哲學社會科學方面來

說，這十年可以說是大發展、大普及、大提高的十年。十年來，黨和毛主席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解決了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一系列的實際問題和理論問題，大大地發展了

馬克思列宁主义，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庫中增加了新的武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现在日益深入人心。革命理論指导革命工作的无限威力，更进一步地显示出来了。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工作，已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成为带有群众性的运动了。由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和反动的唯心主义观点，遭到了严重地打击。在庆祝建国十周年伟大建設成就的时候，讓我們同时庆祝理論战綫和思想战綫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吧。

十年来，广州市的理論宣传教育和理論研究工作，在中共广东省委和市委的直接领导下，有了相当的发展。理論干部日益增多而且在不断提高；理論研究单位在逐漸增設和充实；研究工作在日益开展；对干部和群众的理論宣传和教育工作，在日益加强。特别是在1958年，由于大跃进形势在群众思想上的反映，由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进行，群众政治觉悟大大提高，曾出现了一个全民学理論、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到处大談矛盾論、到处大辯證法。打破了对哲学的神秘观点，出现了一个哲学大普及的运动。群众通过理論学习，提高了認識和觉悟水平，又推动了各項工作的跃进。在1958年理論大普及的过程中，劳动群众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毛主席的著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高度的求知热情。这是一种可喜的和极应珍貴的热情。我們在理論工作战綫上的同志們，有責任以滿腔热情的态度去輔導他們、幫助他們，并向他們学习。

广东哲学学会正是在这一形势下成立起来的。在成立的这一年多的時間里，广东哲学学会根据党的理論与实际相結合和百家爭鳴的方針，組織和推动哲学工作者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特别是在工农学哲学的高潮时期，积极組織會員到工厂和公社，和工农群众一起学哲学，組織有关哲学問題的报告会、座談会和討論会，等等，进行了一些工

作。但这还仅仅是个开始。今后还要大力开展工作。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实践规模和内容，是伟大而丰富的，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認真地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并提升为理論，以指导新的实践，这是当前理論战綫上的重要任务。我国人民现在从事着前人所沒有从事的工作，即要在极短的时间內，走完資本主义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路程，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这样，就不可能設想不遇到一些需要解决的新問題。哲学工作者經常关心实际、深入实际，从实际中发现和提出問題，然后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艰苦深入的研究，尽可能地加以解决，以推动实际工作的順利进行，这更是当前理論战綫上的重要任务。当然，这项工作是十分艰巨的，但是，我們无论如何不应当因为它是艰巨的就迴避它。

我們应当經常地、通俗地同时联系实际地从理論上正确宣传解释党的方針和政策，使党的方針、政策，貫徹到群众中去。在当前应当充分地宣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精神，反右傾，鼓干劲，坚持总路綫，以使我們的伟大事业繼續跃进。

关于哲学的普及工作，例如对工农群众学习理論的輔導，通俗小冊子的編写，哲学講演工作的举办等等，都是群众所需要的，应当大力进行和开展。

应当經常注意对各种資產階級思想、唯心主义观点和修正主义观点进行坚决的斗争，兴无灭資和維護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洁性。

最后，为了做好以上各項工作和向各种非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进行斗争，就必须繼續开展学术討論和进行認真的、刻苦的学习，努力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和鍛煉理論工作队伍。学习，当然是要認真地讀些书的，既要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經典著作，讀毛主席的著作，也

要認真学习党的方針政策，并到实际工作中去学习。在当前大大提倡認真讀書的时候，我們应当警惕忽視联系实际、不关心实际和不深入实际的现象发生。

广东哲学学会决心在党的领导下，进一

步做好对全体會員和哲学工作者的組織和推动工作，高举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繼續前进。

1959年9月24日

进一步开展經濟学界的学术活动

广东經濟学会会长 王全国

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了光輝的成就。随着建設事业的进展，特別是一九五八年史无前例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带动科学文化事业出现了一个空前活跃的局面，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武器，特别是从事經濟理論工作和从事經濟业务工作的同志迫切要求提高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水平，用以指导自己从事經濟建設的实践。我省經濟学会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成立起来的。

学会成立一年以来，在中共广东省委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做了一些工作。我們把經濟科学的队伍初步組織起来，发展了将近两百名的會員，这些會員主要包括大专学校、省市党校的經濟理論工作者、經濟业务部門工作人員等。与此同时，我們坚决貫徹了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理論联系实际和百家爭鳴的方針，結合社会主义建設中一些重大問題，进行了一些学术活动，例如举行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問題、关于国民經济发展的速度与比例的关系問題、关于当前市场情况与价格問題、关于計件工資問題等的討論会、座談会、报告会。其次，我們收集、整理与汇编了一些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和毛泽东同志有关經濟理論的資料，介紹了全国学术界关于一些重大經濟理論問題爭論的主要論

点。……通过这些活动，帮助經濟理論科学工作者提高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應該說，經濟学会的工作还仅仅是开始，学术活动还不多。今后，我們必須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鼓足干劲，进一步加强經濟理論的研究工作。

我們知道，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設的实际过程中，創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在高速度建設社会主义方面，創造了极为丰富的經驗，需要我們理論工作者認真地学习和系統地加以总结；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建設事业飞跃的进展，生活本身也不断地向我們提出許多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論問題。国内外資产階級反动派对于我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对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和高速度发展国民經济的一系列方針政策，进行了疯狂的攻击和污蔑，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也附和着敌人的叫囂。我們所有經濟理論工作者，应当根据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精神，积极行动起来，从理論上彻底回击資产階級反动派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保証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保卫人民公社，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繼續高速度发展。

今年以来，我們学会曾經对某些經濟理論問題进行了初步的探討，今后还要繼續进行比较深入的討論。比如，同国民經济平衡

和发展速度問題有关的有：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基本理論和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的規律問題、我国国民經济高速度发展問題、我国国民經济中主要比例关系及其变化趨勢、我国国民經济平衡中的財政信貸平衡和物資平衡的关系、劳动力的分配和平衡問題、国民經济的地区平衡問題、国民經济綜合平衡的方法論問題。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价值規律作用問題有关的有：社会主义制度下諸种交換关系的性質問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規律的作用問題、我国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以及重工业产品和輕工业产品的价格問題，此外还有关于經济核算和成本、利潤問題，关于投資效果問題、提高劳动生产率問題、工資問題、以及我国人民公社經济問題，等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济理論是一門具有强烈的階級性和战斗性的科学，因此，我們必須进

一步貫徹科学为政治服务、理論联系实际和百家爭鳴的方針，更紧密地結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特别是广东地区的經济建設，进一步开展学术活动，彻底批判资产階級經济理論，反对右傾思想，使我們的經济科学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我們應該加强經济理論的宣传和普及工作，結合干部学习政治經济学，通过举办报告会、討論会、写文章、編印一些通俗的小冊子等形式，来宣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济理論。我們还应組織部分經济理論科学工作者下乡下厂，做一些專門問題的調查研究。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我們必須把社会上从事經济工作和經济理論工作的力量进一步組織起来，健全队伍。我們相信，我們今后在党的领导下和全体会员的努力下一定能在經济学术研究和經济理論普及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为历史科学的大跃进欢呼

广东历史学会会长 杨荣国

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政策鼓舞下，广东历史学界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随着社会主义建設的进行，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也迅速地空前地活跃和发展了起来。历史科学工作者的队伍扩大了，觉悟提高了，质量較高的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历史科学著作增多了，如同其他工农业建設和文教战綫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一样，历史科学方面也取得了令人欢欣鼓舞的伟大的成績。

我們的历史科学工作者的队伍在解放初期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真正能够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以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不算很多，但大部分人都在解放后加强思想改造得到了提高。一些有旧的唯心主义史学

观点的人在党的领导下經過改造，也知道自已販卖的貨色不是真理，自觉地或者半自觉地轉向人民，试图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更大一部分則是解放后新培养和成长起来的。

广东史学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进行了整頓巩固工作，还經常举行报告会，展开历史科学問題的討論。除訂出計劃进行各項历史研究外，又展开了对曹操問題的討論。在討論中，不仅对曹操有了新的正确的認識，而且使我們对于如何評价历史人物获得了进一步的理解，这就是，評价一位历史人物，应当正确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不夸大其作用，也不貶小其作用，要恰如其分地給予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为此，在

评价历史人物中，就要注意：

第一，除分析他的阶级出身与阶级立场以外，还应分析他对当时主要矛盾的政治态度；

第二，必须分析他的世界观，是唯物抑或唯心的；

第三，必须分析他对当时的创制或建议，这创制或建议不论政治的、经济的或文化的，是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是对发展生产有利还是有害？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促退？

毛主席说过，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但是对于历代的农民战争，我们历史学界尚未作过仔细的研究，历次农民战争的性质与作用如何，我们还没有清晰的理解。通过这次对曹操问题的讨论，使我们对黄巾、对赤眉，乃至对陈涉、吴广的起义，都作了一番缜密的分析与研究；虽然在看法上尚有若干的不一致，但较之未讨论前，已经取得了某些共通的认识，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由于对曹操问题的讨论，使我们对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也作了进一层的分析与研究。虽然某些意见还不够一致，但认为两汉社会性质之为封建的，经过讨论已为多数人所肯定。

此外，还对曹操的屯田所起的作用，作了较全面的分析。

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些论著文字，其中有些论文的质量是比较高的，有助于问题的探讨和解决。

在讨论中，不仅有大学教师、研究人员参加，广大的中小学教师及其他工作人员也都参加了讨论。大家一致感觉，这样的讨论，不仅提高了人们的认识，对于历史科学的研究质量和教学质量之提高，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真理是愈辩愈明的，大家从讨论中日益接近于真理，甚至发现了若干的真理；这从另一方面说，亦有利于人们的思想改造，因为我们知道，除了大脑是花岗岩那样的死顽固以外，任何人都不能不在真理面前低头。

这一切都说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既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又提高了人们的思想认识。

在这个基础上，广东史学界今后自应和全国史学界一道，更全面、更深入地展开百家争鸣。我的意见是：

第一，关于学术的讨论，应使之经常化。不论全国所提出的问题或是我们自己从研究中或教学中所提出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从历史发展来说是带有若干关键性或是普遍性的，我们就可组织起来讨论，因为从讨论中，互相启发，既可以深入提高，又可以便于普及，使对这个问题不甚了解的同志也可以获得初步的理解。

第二，定期地组织若干报告会，对某一历史问题，任何人如果从学习或研究中有了一些新的体会或看法，就可提出报告；报告以后，还可交付大家进行讨论。这不仅对参加讨论的人裨益匪浅，对报告者也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组织学习会，进行理论的学习，如结合中国史或世界史的历史实际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这样，对于提高历史的理论认识有很大的帮助。目前我们的缺点，往往是有了资料，甚至资料还掌握的相当充分，但是由于理论水平低，不能作很好的分析，不能从分析中提高历史科学的水平。

总之，为了提高历史的科学研究质量与教学质量，为了提高对历史的认识水平与思想水平，广东史学会一定要使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获得进一步的贯彻。

进一步开展教育学的学术活动

广东教育学会筹委会 副主任 饒璜湘

解放十年来，广东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巨大的。就教育事业来说，发展也很迅速，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既然教育是上层建筑，它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和政治服务，所以广东省教育工作的巨大成就，对于广东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就具有巨大的意义。

解放前，广东省教育事业是落后的，而且当时的旧教育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成为麻醉、奴役和统治人民的工具。广大工农群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全省十四岁至四十岁的青壮年文盲约占青壮年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其他偏僻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甚至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而且全省的学校多半是由私人举办而以赚钱为目的的，因此设备简陋，学费高昂。学校分布也很不合理，多数在大中城市和较发达的地区，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学校。

解放后，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广东省教育不断发展。一九五八年广东省和全国一样，实现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全面大跃进，和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因而推动了广东省教育工作的大跃进，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今年又继续跃进。今年小学生达五百二十六万六千人，为一九四九年的三点三倍；普通中学学生六十九万三千人（不包括民办的半日制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为一九四九年的五倍多；中等师范学校学生三万零六百多人，为一九四九年的二倍多；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四万八千七百六十八人，为一九四九年的十一倍；高等学校学生三万五千八百五十

七人，为一九四九年的四倍多。在工农业余教育方面，解放后也有很大发展，取得很大的成绩。解放后到一九五七年全省共扫除了文盲四十八万人。一九五八年在党提出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历史任务后，随着工农生产的大跃进，工农群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群众要求学习文化就越来越迫切，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迅速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扫盲运动的高潮，出现了“万人教、全民学”，“人人学文化，处处读书声”的动人情景。到去年九月底参加扫盲学习的群众约有七百万人，扫除了大批文盲，一年的扫盲工作成绩大大地超过了过去八年的扫盲成绩。随着扫盲运动的开展，数以千计的各级业余学校在全省各地迅速建立起来了，工厂矿山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的青壮年，大批的进入业余高小，也有进入业余中学，还有少数人进入业余大学学习，因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遍布全省的工农教育网。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今年继续掀起了工农群众文化学习的热潮。

广东省教育事业的辉煌成就，不仅表现在数量方面，同时也表现在质量方面。解放后，广东省从帝国主义手里收回了教育主权，改造了旧教育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基本上肃清了隐藏在教育界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学校里开设了政治课，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了思想改造；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了院系调整 and 教学改革；在中小学里进行了整顿、巩固和提高的工作；在教师 and 大学生中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在学校中建立了党、团和少先队组织，在教育工作者中发展了大批党员和团员，加强了党对学校的领

导；学校参加了历次的重大的政治运动，教师和学生在这些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所有这一切，都使教学质量大大提高，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广东省教育工作坚决贯彻了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方针，各级党委都加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积极在各级学校中树立四大观点，即：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工人阶级观点，反对资产阶级观点；培养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反对个人主义；培养劳动观点，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观点，反对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主张劳心与劳力分离的观点；培养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并且组织了教师、学生参加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从中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锻炼。同时各级学校普遍的开展了勤工俭学。在以教学为主的原则下，全面的安排了生产劳动，把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成为正式课程。

适应着教育工作的的发展，在党的领导下，广东省的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十年来也有迅速发展。广东省广大教育工作者不断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理论和经验，并在教学实际工作中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加以运用，不少教师总结了自己长期教学实践的经验，写成了一些论文。在各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教育学工作者，十年来对教育学方面的理论问

题，不断地探索和研究，积极批判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清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取得了不少的成就。特别是自一九五八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更明确地提出了我国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之后，广东省教育工作者都广泛而深入地学习了党的这一教育方针，教育学的理论工作者们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党的教育方针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和研究，不少人将研究心得或实践体会写成了论文，广泛地开展宣传工作，并进一步将研究成果贯彻到教育工作的实践中去。

十年来，广东省教育工作取得了上述辉煌的成就，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不仅在方针政策上和政治思想上，党能够领导得好，而且在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上，党同样能够领导得好。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正确贯彻教育方针。

为了进一步开展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工作，我们正在筹备成立广东省教育学会，以组织和团结全省的教育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地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说和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思想，积极展开有关党的教育方针、教育学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并广泛地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开展教育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我们今后一定更加信心百倍地鼓足干劲，为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丰富社会主义的教育学说而奋斗。

作好党培养和组织理论队伍的助手

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孙 孺

十年前的今天，在那庄严而雄伟的天安门上，我国各族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代表六亿人民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

站起来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了。在这短短十年间，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精神焕

发，意气昂扬，决心把穷困的旧中国改变成为一个伟大的富强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十年来，我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解放了我国社会生产力，順利地完成了艰巨的經濟恢复工作，超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計劃。在第二个五年計劃开始时，党及时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在这个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全国人民以冲天的干劲，在各个战綫上努力奋战，开創了国民經济大跃进的局⯈面，在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各方面获得了伟大的成就。

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党的第八屆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談到根据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的要求，我国在文化革命方面的主要任务时指出：“……培养新知識分子，改造旧知識分子，建立一支成千万人的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干部的队伍（这是数量最大的），教授、教員、科学家、新聞記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馬克思主义理論家的队伍。”在这个正确的指示下，我国的科学事业出现了大跃进的新面貌。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在省委的领导下，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的直接领导下，于去年国庆节正式成立。这一个新的研究机构，絕大多数的工作人员都是年青的干部，在党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以边干边学的精神，开始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在这短促的一年間，紧紧地依靠了党的領導，遵循党的科学研究工作为当前的政治、生产服务，走群众路綫的方針，采取了从調查研究，收集資料着手的方法，进行了对人民公社和少数民族的調查；对广东革命历史資料的調查、訪問、收集整理；同广州市工商局协作，进行了广州市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調查研究；开始了对香港和东南亚各国的經濟資料的收集。在这期間，还組織研究人員深入工厂，在向工人学习的基础上，协助推

动工人学哲学，編写工厂史。在收集整理資料的基础上，开始了初步的研究工作；参加了“伟大祖国的广东”一书的編写工作；参加了对资产階級学术思想的批判。与此同时，还参加了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活动，并协助各个学会的組織工作。为了更好地展开研究工作，还建立和逐步充实了图书資料室。这些初步的成績，是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中取得的。

当然，由于我們全体同志都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战綫上的年輕的新兵，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还低，并且缺乏研究工作的經驗，因而我們的工作同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很不适应，工作中也还存在不少缺点。今后，必須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政治挂帅，团結党內外的研究工作人员，边干边学，認真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学习党的政策和业务知識，提高业务水平。坚决貫徹执行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貫徹科学研究工作为工人階級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方針。

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屆首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应当鼓励社会科学理論工作者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有系統的、長时间的努力，充分掌握有关資料，从事独立的、創造性的研究。”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研究工作的正确方向。我們必須在去年工作的基础上，反掉右傾思想，鼓足干劲，进一步掌握有关資料，对我国建設社会主义进程中、对人民公社运动进程中所提出的新課題作进一步的較系統的研究；对广东各族人民的革命斗爭历史进一步地整理研究；繼續开展对资产階級学术思想的批判，开展对各种修正主义的理論批判。同时，还必须积极参加、推动和組織有关部门、单位的协作和哲学社会科学各学会的群众性的学术活动，成为党培养和組織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队伍的助手。

欢呼在党的领导下教育事业的胜利

中山大学校长 許崇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这个节日是特别令人欢欣鼓舞的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是伟大光辉的十年。

这十年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用三年工夫，就恢复了被长期的战争所破坏的国民经济；接着，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又用了五年工夫，完成和超额完成了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就在这个基础上取得了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经过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我国人民又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在各个方面基本上战胜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基本上清除了，生产力得到了完全解放。

为了在新的条件下，高速度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基础，党在1958年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发挥了六亿多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推进了生产建设的速度并扩大了它的规模；适应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农村出现了人民公社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它本身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动员和组织五亿多农民，鼓起更大的干劲，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于是在我国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国民经济的全面的巨大的跃进。

这个大跃进，造成了我国人民继续跃进的总前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这个大跃进并掀起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文化高涨和促使他们

精神面貌的改变，出现了广大人民群众性的文化革命的局面。文化教育工作者在自我改造中大多提高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强了同工农群众和生产劳动的联系，在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方面积极地发挥了作用。文化与经济之间形成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文化教育的任务和经济的任务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中不可分地一起提出来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要在基于现代的科学技术，基于电气的、化学的现代技术，基于和平利用原子能技术的基础上来改造和建设全国的工业和农业。我们发展技术的途径是：改进生产工具和工艺过程，实行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实行国民经济的电气化，在生产中广泛应用化学以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在这些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以及原子能和平利用的事业中，仅仅懂得关于机械、电气、化学以及原子能的知識，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样在技术上把机械、电气、化学以及原子能利用到工业和农业上去。各个战线上各个部门的劳动者和整个青年一辈都必须学会这点。提高劳动者和青年一辈的文化技术水平的任务和推进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任务就更迫切地要紧密结合起来。

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发布了“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一九五九年国务院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继续调动文化教育战线上一切积极因素，向前推

进文化革命事业，普及社会主义文化，并且不断地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提高工作，使文化教育工作的發展能够适应整个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的任务，这在我們当前的条件下，首先就是要使我們的文化教育工作的發展，循着新的方針，能够有系統地去反映整个社会主义建設的政治、經濟的任务，并按照任务的要求，有系統地去适应整个社会主义建設的政治、經濟的需要，这是把文化教育工作和經濟組織工作密切結合起来的一个极重要的步驟。

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教育工作和經濟組織工作总是要密切結合起来的。这不仅是要为进一步發展經濟提供更广大的、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技术修养的劳动者，而且是要把文化教育工作和經濟組織工作結合起来，用以帮助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的实现。列宁曾指出过，社会主义意味着“有計劃地組織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証社会全体成員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列宁的这个原理揭示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遵循的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的实质。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的特点就是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以保証充分地滿足社会全体成員經常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使社会全体成員得到全面的发展。人的彻底改变和全面发展正就是我們根本改造經濟和建設新文化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

十年来，全国六亿多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向着这个崇高目的——一直飞跃前进。在这个过程中，全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設的道路，每跃进一步，都意味着党的自觉的調整作用的逐步提高，也标志着国家的欣欣向荣，标志着人民觉悟的逐步提高和人民主观能动性、自觉首創性的进一步发展。

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第一个五年計劃胜利完成的基础上，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

綫，是我們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經濟、普及和提高社会主义文化、并进一步克服在經濟上和人們意識中的资本主义残余的指路灯塔。它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結合的产物，它反映了党和毛主席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客观条件和现实可能性的科学的估計，它表现了我国六亿多人民伟大的决心和伟大的智慧、力量，因而它极大地鼓舞人民群众为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而进行頑强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党实现了对人民群众的更全面、更細致的领导，因而这条总路綫已成了我們的整个社会发展的更强大的动力。它使六亿多人民在为解决社会主义建設的全部任务而斗争中，更加有計劃的自觉的行动，更充分的發揮主观因素的作用。

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正确地领导着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不但改变了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由于这是与党所领导的巨大的教育工作結合着来进行的，結果就使得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起了深刻的变化。党所领导的巨大的教育工作，不但为根据先进技术解决全国經濟改造的任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为使人民掌握精神文化資料，充实和扩大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創造的范围，建立高度发展的科学文化事业，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整个中国，六亿多人民，高举着总路綫的光荣旗帜，正在由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的王国跃进。

我們庆祝国庆十周年，我們热爱我們社会主义的祖国，热烈的欢呼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經濟、文化、思想方面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欢呼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历史功績，欢呼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伟大的胜利，欢呼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胜利。

高等教育事业大跃进中的一朵红花

暨南大学副校长 梁奇达

暨南大学诞生于1958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伟大年份里，是去年千红万紫的新办高等学校中的一朵红花。她是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发展的需要，和满足广大侨胞子弟回国升学的愿望而创办的；她在中共广东省委和陶铸书记的亲自栽培下，建立在广州东郊风景优美的文化区——石牌。

暨南大学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象巨人一般迈开第一步：创设了矿冶、水产、航海、历史、中文五个系，下设地质勘探、采矿、选矿、冶炼、水产养殖、工业捕鱼、水产加工、海洋船舶驾驶、轻机管理、历史、汉语言文学等11个专业；此外，还创办了一个两年制的工农预科和一年制的华侨预科，招收了学生共1,300多人。这样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是极不寻常的。

我们以这样高的速度前进，究竟能不能保证教学质量并把它巩固下来呢？这是一些好心朋友和家长们所关心和疑虑的问题。的确，就一般情况来说：在设备不足和老教师不多的条件下，要保证教学质量并使之日臻完善，实在是不容易的。然而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在中共广东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校教职员生一年来的奋斗，暨大终于迅速地成长起来了。

我们现在不仅有足够为教学使用的宽敞的课堂，有可容两千人的大礼堂，而且还正在兴建一座宏伟的、计有14,000平方公尺的教学大楼。

我们已组成一支相当可观的教师队伍，专职教师达228人（兼职教师除外），特别可贵的是有不少来自实际工作中的工程师、船

长、文艺工作者和政治理论工作者。这对于保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提高教学质量是有重要作用的。

作为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的图书、仪器和工厂等，现在也初具规模，计有图书32万册，仪器一万件，淡水养殖场一个，浅海养殖场一个，炼钢厂、机械厂各一间。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我们一开始就坚决贯彻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全体师生热烈地投入全民大炼钢的运动里。随后教师和学生一起，根据专业性质的不同，分别到人民公社、工厂、渔港和轮船参加生产劳动，一面进行劳动锻炼，一面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在下放期间，不仅养成了劳动的习惯，初步树立了工农感情和共产主义风格，也学到了不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如水产加工专业学会了78种罐头的制造法并革新了技术，制成了117种产品；养殖专业学会养殖珍珠贝和鱼类的人工孵化技术；航海系的驾驶和轮机专业学会了水手操作、生火、加油等基本技术，初步学到了有关航海的驾驶知识和机器、动力装置的原理，并且制成了一部最新型的复式万能车床；冶金专业不仅掌握了炼钢技术，而且还炼出了优质的低碳钢；中文、历史专业初步掌握了调查研究 and 创作的方法，并在这个基础上编写了调查报告14篇，创作民歌、短诗1,400多首、歌曲8首和讲义5种。可见，这半年的收获是极其丰富的。

当转入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的教学活动后，我们又采取了在党委领导下，正确发挥

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相结合的、教学相长的、群众路线的教学方法。首先集中力量搞“試驗田”，組織了强大的教学观摩团，通过“现场练兵”、层层带动，以加强对年青教师的教学指导工作；在全校掀起了一个教好学好、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经过半年多的奋战，教师的业务水平、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方法、学习质量，都有很大的改进和提高，因而在教与学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本科学生年终考试的结果：优良的达到72%多；不及格的只有1.7%。与此同时，又由于放手发动学生开展科学技术研究活动和创作活动，在教师的指导下，半年来已完成的科学研究项目达21项，其中較重要的有比手工业效率高几百倍的珍珠磨核器和插核器、手术台、脉冲示波器等；又結合教学、生产劳动、考古实习，制成产品32种，收集了新旧石器几百件，其中有“手斧”一件是国内少见的；创作了中篇小说“赤道烽火”、“流溪河畔”等六部、电影剧本“一朵红花”、诗歌集“广东民歌选”、长诗“光辉的一年”和“炼焦大合唱”等。此外，有些系科的同学还制成不少教具、模型、仪器、图表等以充实教学设备。其成绩也是比較显著的。

学生学习成绩的好坏，无疑取决于教学领导和教师本人的教学水平；而教师的教学水平又取决于教师本人的业务水平、政治觉悟以及是否能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运用群众路线的教学方法。半年来，我们就以此为指导思想，采取了与资产阶级“教授治校”、少数人办学、压抑新生力量、冷冷清清等相反的办学思想和办学方法。在政治挂帅和大搞群众运动的前提下，充分调动老教师的积极作用，特别注意发挥年青教师的积极性，不但从思想上鼓励他们端正教学态度、刻苦钻研、认真备课、虚心学习、树

立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而且从业务学习和教学过程中经常关心他们，使他们的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不断提高，从而保证了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上述学生年终考试的成绩就充分说明了这点。青年教师也迅速成长起来。

我校教师不仅胜利完成了教学任务，而且还鼓足干劲，作出了不少的科学研究成果。一年内共計写出論文39篇，編写“番禺史志”，参加“伟大祖国的广东（古代部分）”的編写工作；編选了“荔枝滿山一片紅”（民歌）、“毛泽东論經濟”（与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經濟室合作）等；已完成較大的科学研究项目計有“鱧魚人工孵化”、“团鯉及广东鯉魚品种生物特征的研究”，以及与中山大学合作的“吸血虫病化学治疗的研究”等；創制与仿制的新产品有超声波发生器、电动籃球記分器、电动起跑器等。而特別可貴的是由絕大多数年青教师們所組成的教学教研組，在教学任务极其繁重、科学研究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制成了六阶的“电子模拟计算机”。此外，全校师生共編好讲义达32种，其中水平較高的有“动物学”、“珍珠养殖法”等十多种。

暨南大学的迅速成长和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我国去年高等教育事业大跃进的一个縮影。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等学校所不敢为也不能为的，是他们所望尘莫及的。

暨南大学在党的栽培下，今年又增加了經濟和化学两个系，下設化学、財經貿易、对外貿易等三个专业；新招了490名学生。此外，还招收了工农預科与华侨預科生235名。现在，她正以昂扬的斗志和矫健的步伐，向新型的、完善的綜合性大学的目标前进，为不断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和繁荣祖国文化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党的教育方针的伟大胜利

华南师范学院院长 王燕士

华南师范学院是1951年10月1日成立的，到现在恰好八个年头。八年来，我们学院经历了从小到大，从旧到新的深刻的变化。

学院成立初期，只有五个系科，四百多师生，图书资料 and 教学仪器十分缺乏，校舍也十分简陋。中间经过二次迁校，才确定现在的校址。就在当时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全院师生在党的领导下，坚决执行党的“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向工农开门”，特别是勤俭办学的方针，终于战胜种种困难。时间仅仅八年，学院面貌已大为改观了：在校学生人数发展到四千多人（其中出身工农的学生占58%），此外还有五千多函授生；教职员达六百六十多人；系科发展到十一个系十二个专业，建成了一间多科性的新型的高等师范学院。八年来修建了十一万平方米的建筑，整个校区面积达六十多万平方公尺。昔日破烂的校舍，已变成一幢幢宏伟的教学大楼、图书馆和宿舍了。学校面貌这样迅速的巨大的变化，在旧中国是不能想象的，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我学院面貌的变化不仅表现在数量的发展上，更重要的是学校性质的改变和教学质量的提高。1953年院系调整后，学院破除了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教育制度，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在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理论和教学经验的同时，开展了教学改革和思想改造运动；并着重把政治思想教育和社会实践、业务实践以及各项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在院党委的领导下，一方面不断组织师生学习党的方针政

策，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方法，另一方面又在逐步改善教师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同时，分别组织教师下乡下厂进行参观访问。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广大师生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有了迅速提高，教师队伍也进一步健全了。与此同时，学院里党的组织加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巩固了。

在教学上，党一开始就注意了教学 and 实际的联系。根据中央提出“全面发展”的要求，结合师范教育的特点，学院不断地革新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自1953年执行国家颁发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以来，学院根据大纲的精神自编了各科的讲义，也采用一部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苏联教材，使教学内容基本上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在教学方式上，加强了讲授、课堂讨论、实验、作业、野外实习、教育实习等环节，摆脱了单纯“先生讲学生听”、教死书的方法，因而逐步提高了教学质量。

经过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党总结了过去的教育工作经验，进一步明确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我院和全国兄弟院校一样，根据党这一方针，胜利地进行了教育事业中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斗争，展开了教育革命运动。通过这个运动，提高了广大师生的政治思想水平，调动了全院一切积极因素，进一步加强了党在学校中的领导，保证了党的教育方针更好的贯彻，把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也使师

生意气风发，形成一种要求进步、热爱劳动、勤奋读书的风气。从而在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等方面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由于教学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在生产劳动中得到一定的感性知识，使学过的理论也得到印证补充，这就大大的巩固和丰富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独立工作能力。也使他们在生产劳动实践中，亲身体会到理论知识对生产建设的重要，从而增强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钻研精神，因此，广大学生的学习热情高涨了，学习目的性进一步明确了。1959年，根据党中央“巩固、提高”和“在工作中具体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指示，学院党委提出认真读书的号召，学生们又勤学苦练，全校形成努力读书的风气。在这个有利于教学的形势下，学院又加强了基础理论的教育，不仅使学生按各专业计划完成了应学的课程，而且在各类课程中都增加了现代理论和最新科学技术成就部分，并开始在高年级中开设了某些专门化课程。教学方法上，一方面强调系统讲授，另一面又提倡加强结合教学和生产劳动的实验和作业。这样，学生较深较透地掌握了理论知识，提高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许多学生写出质量较高的论文，并能动手制造产品，学习成绩显著地提高了，1958—59年度下学期，全校学生学习成绩优良的达89.3%，有的班级成绩优良的达到94.7%。

教育革命和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推动了科学研究工作和教学建设工作的飞跃发展。去年以来，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推动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广大师生经过参加农村人民公社运动和生产劳动实践，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全院65%以上师生参加科学研究活动，形成了群众性的科学研究热潮。仅仅一年，就完成了585个研究项目，等于过去七年完成了的研究项目的一倍多，其中不少是尖端科学的研

究和对当前生产建设有重大意义的项目。群众性的科学研究的开展，不仅提高教学质量和师生的学术水平，也促进了教学建设工作，广大师生在短期内就制造成功了模拟式电、超声波发生器、超声钻床、示踪原子能度计等许多高级仪器；学会了观测和预报人造卫星的运行情况，充实了教学设备和教学内容。在教育革命中，全院办起了36间工厂，生产出车床、刨床、钻床、金霉素、电动机和各种化学试剂等工业产品250种。这些工厂经过调整，已逐步成为各科专业“三结合”的基地。此外，还通过师生合作，重新编出了全部课程的教学大纲；并根据党的教育方针的精神和各门课程的系统性、完整性，写出了80门课的教材，部分地满足了教学上的需要。

八年来，我院先后培养了4800多名中学师资和部分高等学校师资。这些毕业生具有一定的政治、业务水平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他们中有许多人被选为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教学组长，在教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成为教学中的骨干。

上述一切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取得的，这就充分地说明党的教育方针的完全正确，有力地驳斥了某些未经彻底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认为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使“教学质量降低”、“得不偿失”，使“学校秩序太乱了”的谰言。

八年来的工作，特别是近一年来的教育工作实践，给我们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体会。其中最主要的是：毛主席在1958年8月视察天津大学时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的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工作的三件法宝。不把这三件东西抓好就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建设人才；丢掉三者中的任何一件，都不能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势必犯错误。在这里，最根本的问题还

是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法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完成巨大和深刻的教育革命，也就没法处理学校实际工作中各方面的关系，因此，必须把学校全部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而党的领导是和党的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只有党委领导和群众结合，才能彻底铲除资产阶级的专家路线，才能不断地把群众动员组织起来，发挥各级教学行政组织

的作用和群众的积极性。党的领导如果脱离群众，也谈不上真正的领导。同时，党委如果不抓住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中心问题，教育工作就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就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总之，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工作的生命线，是照耀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指路明灯。

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民教师

广东师范学院副院长 张海鳌

我们的教育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它是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有力工具之一。十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人民教育事业有了飞跃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它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材上，也表现在广大师生的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上。十年来，光是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就为国家培养了170万多名毕业生。他们成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战线上的一支新的力量。此外，还有一千多万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直接参加工农业生产，成为生产战线上一支新的生力军。

我们党向来就是非常重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教育群众的。党在学校教育中也是一贯地重视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解放以来，党不仅在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开设了政治理论课程，对生学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而且在小学中，也通过各项课程和各种活动，对小學生进行新的道德品质教育，此外，还通过引导学生参加或接触各种革命运动和生产建设实践，以便使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熔炉里受到锻炼。特别是去年以来，由于经过整风

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贯彻了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广大师生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精神面貌有了巨大的变化。就广东师范学院来说，经过整风运动，红专大辩论、教育革命和学术思想批判，特别是由于师生下乡、下厂，参加了生产劳动，广大师生清算了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学术观点，下定决心要做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劳动锻炼，劳动观点增强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增长了；对人民的教育事业必须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光荣任务，有了更具体的更进一步的认识；对于理论必须结合实际的原则，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一切，反映在教师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活动上，大大的克服了过去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倾向，逐步地把教育、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三者结合起来；反映在学生的学习上由于更加明确教育工作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懂得当人民教师的责任重大和光荣，进一步巩固了专业思想，明确了学习的方向，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

广大师生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必然在

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做出成绩来，这首先表现于毕业生的质量上。三年来，我院一共培养了1,600多名专科毕业生，按照原定的培养目标，他们毕业后是担任初中教师的。但他们被分配到中学以后，由于工作需要，也由于他们高度发挥主观努力，许多人已经担任高中的教师，并且作出了不小的成绩。例如，三年来我院化学系的两届毕业生共150名，其中绝大部分都已担任了高中课程。按照他们原有的业务水平，担任高中课程是有困难的，但由于他们敢想敢干，不向困难低头，经过一年的实践，证明了他们是完全可以胜任的。根据不完全的了解，他们当中已经有八人被评评为“优秀教师”，更多的人被评评为“五好教师”、“积极分子”。去年应届毕业生中，有许多人在教育实习中，已经能够独立地解决教学中许多问题和学生生活纪律的各种问题，出色地完成教育实习的任务。

其次，表现在我院科学研究工作蓬勃发展和取得了大量的科学成果上。大跃进以来，我院师生响应党的号召，打破迷信，解放思想，掀起了群众性的科学研究热潮，改变了过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搞科学研究的局面，已完成了的科学研究项目，从1957年44个跃进到58年的648个。其中有些是尖端科学的成果，例如数学系制成了的“模拟式计算机”，物理系的“核子计算器”“电位计”“电子开关”，化学系完成了土法炼铀的工艺流程的研究，并在半导体提纯的研究方面

获得了重大的进展；适应国家生产建设的需要而进行的研究，也有重大收获，例如关于强化竹材的研究报告，幼猪奶尿病的防治研究，从植物一品红提取乳胶和37种农药、化肥的制造成功，都是有较高质量的。此外，还适应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编写、翻译出大批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中文系编出了“毛泽东同志论语言”，该系黄铁球教授编写了“十八世纪越南诗人阮攸之研究”和翻译了“金云翹传”，得到国内外文学界的重视，此外，教学系翻译出“直偶模拟电子计算书”和“数值计算书”等资料，有助于有关这方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

可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否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否定我们教育工作的巨大的成就。他们夸大去年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后，师生下乡下厂参加生产劳动、在学校大办工厂大炼钢铁和进行教育革命等运动中，曾经出现的已经克服了的一个指头的缺点，放出“教学质量降低了”的谰言，借此来攻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这就说明，资产阶级思想对人们还有影响，我们必须继续深入开展政治上思想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彻底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当前我们必须深入地开展反右倾、鼓干劲、厉行增产节约运动，扫荡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高昂的干劲，为争取教育工作的更大的成就而奋斗！

为培养更多更好的中等教育师资而奋斗

广州师范学院副院长 杜伯奎

在庆祝国庆十周年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回顾广州市中等教育事业的过去并展望未来，真是又感慨又兴奋。

广州市中等教育的真正整顿、巩固和发展还是最近十年间的事情。在解放前，广州市的中等教育一般是腐旧的、落后的和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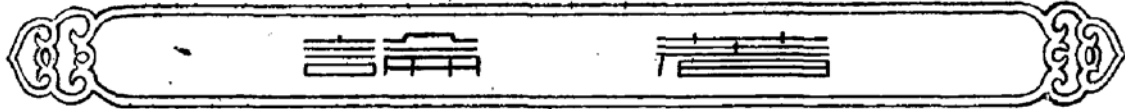
的。在国民党反动派控制之下的官办中学，不但在思想上向学生灌輸反动的教育，而且在一般課程的教学上也因循苟且，因陋守旧，一切图书、仪器、体育等設備，也多是空有其表。民办中学則大多数都是商业性质，以营利为目的。那些所謂校董和校长之流，都是沽名釣利之徒，他們开办学校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获利。此外还有一些和帝国主义有着千絲万縷关系的教会学校，它們之中大多数都是蒙着宗教的外衣，传播着迷信、崇外、奴化的思想，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当先鋒。所有象这样的学校，真可以說是誤人子弟，使教育事业沾染了許多污点！

这种情形在解放以后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十年以来，广州市的中等教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迈进了一大步。十年来逐步的整頓、巩固和发展，成績是巨大的。以今年預計的数字來說，就有公立普通中学75所，民办中学54所，共有学生77,891人，教师3,199人，此外还有中等师范5所，学生2,807，教师110人；中等职工技术学校36所，学生22,228人，教师978人。这种情况和十年前国民党反动派統治时期相比，真有天淵之別。根据1949年調查的数字，当时只有公立中学2所，民办中学84所，中等师范一所，中等职业学校33所，学生总計約26,000余人，教师約1,800余人。随着社会主义經濟建設高潮的到来，今后广州市中等教育势必有很大的发展，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个急待解决的問題：如何多快好省地培养更多更好的大批中等教育師資，以适应未来广州市中等教育发展的需要？

目前广州市中等学校的師資，一部分是解放前各校留下来的老教师，一部分是解放

后連年培养出来的新教师。在广州市中等教育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学教师队伍的扩大，远赶不上实际的需要，因此发展高等师范教育就成为很迫切的事情。我們广州师范学院，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在去年全面大跃进中誕生的，她将配合着去年由广东师专扩充而成的广东师范学院以及历史較长、去年及今年又有进一步扩大和发展的华南师范学院共同肩負起大量培养中等師資的任务。而对于培养广州市中等教育師資，广州师范学院将直接地担承着更大的任务。目前我們正在貫徹党的多快好省和两条腿走路办教育的方針，既办四年制的本科，也办两年制的专科。在逐步提高和适当发展的原則下，逐年增加本科学生人数，也相应保持专科学生人数一定的比例。預計1960—1961年間，每年将有可担任初中教师的专科毕业生200—250人；从1962年开始，每年将有可担任高中教师的本科毕业生250—350人，担任初中教师的专科毕业生約200人。如果全市中等教育在第三个五年計劃期間将有更大的发展，我們也可以在1962年的基础上再加以发展和扩充，使能培养更多的師資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面对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不断跃进的形势，我們一定要鼓足干劲，力爭上游，把培养广州市中等師資这一工作做得更好。这个任务是光荣的，我們具有充分信心。为了貫徹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決議的精神，反右傾，鼓干劲，开展增产节約运动，为了迎接伟大的建国十周年紀念日，我們坚决以勤俭办学的精神，克服困难，为广州市培养更多更好的中等教育師資而奋斗！



在高速度問題上 我們与右傾机会主义者的分歧

丘子江

高速度問題爭論的實質

十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由于采取了一系列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建设事业更日进千里，我们国家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局面。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今年又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跃进。同一九五八年比较，今年工农业总产值计划增长百分之二十，其中工业总产值计划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农业总产值计划增长百分之十。钢、煤、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金属切削机床、棉纱、原木、粮食、棉花等项工农业主要产品的计划产量，都将完成、超额完成或接近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在一九六二年完成的指标。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我们就可以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成一个富强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总之，形势很好，前途光明。我们高歌庆祝高速度发展我国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可是一小撮

反映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要求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却在唱反调，说这不好，说那不好，而且据说这许多“不好”，都是由于高速度带来的“恶果”。这样，关于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问题的争论就揭开了。

这场争论的实质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我们党在一九五八年春天，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各方面的经济关系，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精神。高速度，“象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要求高速度，当然没有什么多快好省的问题；那样，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了。因此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1958.6.21人民日报社论）

为什么一定要高速度呢？这是因为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我们从事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又是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个最根本的任务。然而，有人认为：“快些或慢些，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反正我们迟早总会建成社会主义。”对的，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困难，我们迟早总要建成社会

主义的。这是我們坚定不移的信念。而且，快慢問題的确也是一个時間問題。但是，我們国家作为社会主义陣营的一員、作为世界和平的东方堡垒，要同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賽跑，是由時間来計算的。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冲破资本主义体系在地球出现时，時間問題对于当时的苏联人民來說具有非常严峻的意义，列宁提醒人們注意：“……或者是灭亡，或者是开足馬力向前进展。这是历史提出来的問題”。今天，時間問題对于我們中国人民來說就不关紧要么？不，决不。当然，我們今天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比苏联当时的情形好得多了。由于社会主义陣营力量的不断壮大，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浪潮日益高涨，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反剥削反压迫斗争的日益加强，由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的加深等等因素，使世界持久和平有了现实的可能。但是帝国主义者軍备竞赛仍在繼續；美帝国主义还侵占我国領土台湾。因此，对于实际上还存在的战争狂人不能有任何幻想。维护和平和安全的主要办法是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加强自己的建設，壮大自己的力量。假如我們不是以高速度来发展社会主义經濟建設，从而获得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并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那就不能說我国的安全和和平建設有了可靠的保証。再則，我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这种落后的状态如不迅速改观，把我国建成一个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国家，那就不能說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巩固的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就不能較迅速地改善六亿多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時間問題，对于我們国家來說，同样具有严重意义。爭時間，就是爭主动，爭优势，爭胜利。

由此可见，時間問題本質上是一个建設路綫問題。我們党拒絕了那种少慢差費的路綫，而采取了多快好省的路綫。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完全符合国内外形势的要求，

完全符合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落后的經濟面貌的强烈愿望，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高速度是总路綫的灵魂，因而反对高速度，也就是反对总路綫。

为了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为了貫徹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我們党还制定了經濟工作中的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針。这些，都是为了調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了动員一切可以动員的力量，亦即是說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設。我們党从来認为，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运动都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觉的事业；群众的积极性創造性愈是发展，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愈益发展。群众路綫的方法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根本方法。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就是党的群众路綫在社会主义經濟建設中的应用和发展。鬧革命，應該大搞群众运动；搞建設，也應該大搞群众运动。

高速度与大搞群众运动

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光輝的成就，正是由于大搞群众运动的結果。可是，右傾机会主义者却說，在經濟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会破坏“正常的”生产秩序。对的，任何一个企业都应该有正常的生产秩序，但是何謂“正常”，却有不同的理解。我們在一九五八年通过群众运动破坏了一些不利于生产发展的旧秩序，建立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新秩序，調整了企业中人与人之間的关系，实行了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实行了領导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員相結合的制度，并有領导地改革了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試問：这样的在党的正确領导下依靠广大群众进行破旧立新，不断地調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一切束縛生产力发展的旧习惯势力作斗争，从而使生产更蓬勃发展，能說是破坏正常的生产秩序么？事情恰恰相

反，只有根据生产发展的要求、群众的要求，不断破旧立新，才算是正常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以为一切应该原封不动、四平八稳，不敢触动一切旧的规章制度，不去触动一切妨碍生产发展的旧习惯势力，那才是反常的。

六亿五千万人民，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大的本钱。我们依靠了这个伟大的力量，就能够移山填海，迅速改变我国落后的经济面貌。可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总是不相信这一条，不相信人民群众伟大的创造作用和生气勃勃的革命精神，对于我们能不能高速度发展生产力抱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我们的国家底子薄，凡事只能慢慢来。

对的，我国的底子薄的，旧中国遗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烂摊子”。但是，我们依靠了人民群众，通过大搞群众运动，就能够在这个“烂摊子”上建设一座宏伟瑰丽的社会主义大厦。

事实上，我们的“家底”天天在变，逐步地、不断地由薄变厚、由穷变富。大家知道，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和超额完成，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和规模，我们建立了许许多多现代化的工厂企业，如冶金、采矿、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新式车床、发电设备等等；许多器材过去要靠进口，现在自己国内也能生产了，如1957年钢材的自给率达到86%，机械设备的自给率已达到60%以上。这个变化是巨大的。去年和今年的国民经济大跃进，为我国生产的高速度发展打下了更好的物质技术基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除了在政治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散布悲观主义论调之外，在思想方法上总是用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观点，静止地、孤立地、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来看“底子”问题。当然，今天的情况同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来说还距离很远，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技术水平比较起来，还是较落后的。总之，“一穷二白”的

面貌还没有根本改变。然而，“这看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毛主席语）

我们国家有良好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我们国家九百多万平方公里肥沃的土地上，已经盛开着许许多多的社会主义鲜花，结下了许许多多社会主义的美果。可见，论条件，并不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想象的那样糟。这里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我们有六亿多勤劳勇敢的人民。我们办事情，做计划，看问题，总是从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毛泽东同志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党从来遵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认为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是发展生产、推动历史、创造历史的一个伟大的动力。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人民群众结下了血肉般的联系。我国亿万劳动人民经受了千百年历史上一切反动统治者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深沉灾难，他们有高度的革命性和革命的坚定性，因而当他们一旦成为新社会主人就会迸射出无穷的力量和智慧，迫切地要求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以达到国强民富的境地。十年来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而且历史将继续证明，我们依靠了六亿人民这个伟大的力量，凡是人类能够做到的事，我们都能够做到，或者很快就能做到。事在人为，这是一条普遍真理。人，是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客观物质条件再好，如果在懒洋洋的人的手下，也不能产生什么良好的效果，反之，物质技术条件差些，有了冲天的干劲，往往可以产生预料不到的丰收。人多，消费多，这是事实。但，人多，生产多，这也是事实，而且是更重要的事实。我们正是依靠了六亿人民，取得了大跃进的伟大胜利，这不是早已再次证明了的事实么？我们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坚信：冲天的干劲在任何时候都是

发展革命事业的决定性因素。有些人硬不相信或不愿意相信这一条，站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立场上来看问题，因而他们就不能不掉进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

当然，在亿万群众参加的大跃进运动中，由于经验不足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缺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抓住某些早已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的缺点，攻击群众运动，向革命的群众大泼冷水，其实质就是攻击我们党的总路线，攻击我们采取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高速度发展的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

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我们一定要采取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才能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社会生产以空前的高速度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可能性，根源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在这种制度下，消灭了剥削，消灭了压迫，消灭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因而能够由整个社会来计划生产、发展生产；特别重要的是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他们的命运、生活、前途总是同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他们能够发挥最大的干劲和智慧为国家的富强、为自己的幸福而劳动和斗争。

社会主义经济必然是高速度地发展的。但是，离开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就不能把高速度发展的客观可能性变为现实。上面已经讨论过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作用，这里，我们想着重讨论一下政党、领袖的作用。因为我们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乃是我們能够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最重要的保证。不管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愿不愿意相信这一条，但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我们党是一个成熟了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思想指南的工人阶级政

党，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正确地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正确地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我们党一向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而毛泽东同志就是创造性地科学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光辉典范。我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都怀着深沉的激情，庆幸我们有一个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已经由毛泽东同志的艰巨工作和天才创造，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这就要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这是刘少奇同志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的一段话。我们的事业越往前走，我们也就越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解决了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这一特殊困难的任务，从而给我们人民开辟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试想看看：我们全国人民离开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能取得今天如此光辉灿烂的成就么？“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因此对于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尊敬和爱护，本质上就是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正是由于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国人民才能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有了党的领导，才有正确的方针政策；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正是我们所以能够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根

本保証。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看到我們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困难和缺点，就怀疑党的领导，甚至有人污蔑领导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党的领导。可见，要不要高速度问题争论的实质，也就是我們要不要党的领导问题的争论。只有粉碎右傾机会主义思潮，才能保証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高速度与平衡問題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和特点是：在先进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以便最充分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的需要，并使他們得到全面发展。我們只有采取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坚定不移的政策。“以鋼为綱，全面跃进”的方针，是一条完全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我們去年和今年都执行了这条方针，因而綱举目张，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涨。但是，有人却說：“抓了鋼鉄，挤掉一切”，因而弄得“市场供应全面紧张”，这当然是污蔑。更荒謬的是，右傾机会主义者造出了一套“理論”，說什么“高速度必然造成比例关系失調”，“高速度就无法平衡”。

这种說法，既不符事实，也不合邏輯。

我們认为既要高速度，也要按比例，即是說，国民经济各部門之間的发展应该組織平衡，而且可以平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实现了生产資料的公有制，国民经济就能够、而且应该按比例、有计划地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书中，早就預见到社会主义組織生产的这一特点，他說：“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化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的生产，向着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

社会的有计划的生产投降。”我們计划工作机关的中心任务，归根到底是为了高速度发展建設事业而去寻求最恰当的最好的比例关系。我們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依据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結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和在經濟工作上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从根本上保証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既是高速度、又是按比例的。一整套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从經濟学的角度來說，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中的应用和重大发展。假如說，国民经济比例失調了，就不可能出现一九五八年工农业生产各部門的全面跃进。事实上，我国国民经济正是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軌道上发展的，因而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比例关系是协调的、正常的。当然我們也不否認这一事实，在各經濟部門内部的某些环节上，某些产品上，曾經出现过某些个别的、局部的不协调，但这是暂时性现象，經过了調整已經克服了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老是死死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其居心何在呢？

我們說，高速度发展应该組織平衡，可以組織平衡。但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平衡现象不断被打破，因而不断出现不平衡现象。问题是：要用什么方法去平衡，向什么方向去平衡。一种是消极的平衡，即用压低先进的指标、定額去迁就落后的指标、定額，这是向落后的定額看齐的平衡法。另一种是积极的平衡，用帮助落后单位、部門改善經營管理，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額，这是赶先进、向先进定額看齐的平衡法。我們应该采取后一种方法，而拒絕前一种方法。当然，当我们說到先进定額时，也反对那种浮夸的作风，把定額定得超出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在整个国民经济來說，低速度发展比较容易組織平衡，比较容易調动后备力量去調节矛盾；高速度发展則比較难些。这是事

实。但是，能够因为一个“难”字，就要求采取低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做法么？比方说，要大跃进，要高速度，某些生产部门、企业会碰到劳动力或生产资料比较紧张的困难。解决的途径只能是用鼓干劲、挖潜力的办法，而不能用降低某一方面某一部门的发展的速度的办法，更不容许拿这些客观困难作为掩饰右倾松劲的借口。

为了在我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在高速度前进中必然会有这样的或那样的、大的或小的困难。共产党人对待困难的态度是：既蔑视它，因为我们的困难总是前进中的、高涨中的困难，我们只要依靠群众，就一定能克服它；但是又要重视它，因为只有不断克服困难，才能使我们不断地前进。而要战胜困难，就要有革命者的刚毅性和坚韧性。当前，在我们革命队伍中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之所以成为一种危险倾向，一方面（这是根本的方面）固然是由于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种思潮使它存在和扩展下去，必然妨碍我们前进。斯大林同志说得好：“右倾问题如果不是和我们发展中的困难问题有联系，也许不会象现在这样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但是问题也就在于右倾的存在使我们发展中的困难复杂化，并阻碍我们克服这些困难。正因为右倾危险阻碍我们进行克服困难的斗争，所以克服右倾危险的问题对于我们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201页）

知难而进还是畏难而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区分革命的坚定性和动摇性的重要标志之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散布种种悲观论调，泄群众的气，企图挡住历史车轮前进，这难道不是一种罪恶的行为么？

简短的结论

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我国人民迅速改变我国落后经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战斗纲领，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灯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灵魂。这条总路线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统一，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应用和发展，因而它是一条完全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我国人民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有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能够胜利地百折不挠地建成社会主义。因而，要不要高速度、要不要群众运动等等问题的争论实质就是要不要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就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一场严重斗争。我们只有坚决地粉碎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保卫党的总路线，才能够使我国人民不断地去战胜困难，继续沿着高速度道路前进，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富强的、伟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严克柔

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从来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根本问题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这同样是一个根本问题。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正确与否，是区分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要标志。

右倾机会主义者把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两大群众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是“少数人强迫命令的结果”。他们认为根本就不需要这两个运动，认为这两个运动搞糟了，弄得“到处紧张”，“浮夸极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要不要大搞群众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样的群众运动是不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是不是“少数人强迫命令的结果”。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两句马克思主义的名言，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群众为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总是不断地变革现实，改造世界，人民群众的这种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没有革命，历史就不能前进，没有资产阶级革命，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人们改造社会固然要革命，改造自然也要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没有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

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另一方面来说，革命的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而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这不仅因为革命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而且，也只有依靠亿万群众的力量，才能使革命事业生气勃勃，使革命事业获得成功。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亿万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总是表现为运动的形式。群众的革命运动是要不断地搞下去的，革命需要群众运动，建设也需要群众运动，而且需要越来越广阔的群众运动。动则进步，静则后退，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随着社会的革命改造日益深入，革命的群众运动也愈发展、愈扩大。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神圣家族）列宁把这个原理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深刻的哲学原理之一，并且还揭示了这个原理的另一个方面：“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唤起人们对这种改造的兴趣和采取自觉的态度，使千千万万的人相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列宁全集第31卷第452页）

我们党从来是重视群众运动的，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这是党的一条重要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也是一条重要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可是，右倾机会

主义者却相反，他們經常地玩弄反对群众运动的把戏，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們反对群众运动，失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們也反对群众运动，又失败了。现在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他們又出来反对群众运动了。他們振振有詞地說：“搞革命需要群众运动，而搞建設則不需要群众运动，因为建設需要‘才干’，而群众是沒有‘才干’的。所以，社会主义建設要強調依靠专家。”他們認為，社会主义建設只靠几个很“聪明”、很有“才干”的专家，划几张蓝图，今天叫群众干这样，明天叫群众干那样就可以了。这是资产阶级的做法，资产阶级革命家要走的是专家路綫，而我們則走群众路綫（当然我們也要专家，但专家却要融合到群众运动中去）。社会主义建設要是沒有群众运动，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我們究竟是采取依靠几个“聪明”的专家，冷冷清清的慢吞吞的少慢差費地建設社会主义的做法好呢？还是依靠群众，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好呢？要知道人民群众决不是沒“才干”的笨伯，我国解放了的、团結起来和組織起来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是一支有惊人才干的真正伟大的創造力量。去年以来的大跃进中，亿万人民干劲冲天的、敢想敢干的行动起来，結果就造成了我国国民經济突飞猛进的局。群众不仅在革命上十分能干，在建設上也是十分能干的。列宁說：“世界所以有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基本原因是有成亿成亿的人卷进这个发展的洪流了”。（列宁全集33卷第311頁）列宁的这句名言，在我国，用鉄一般的事实証实了。

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群众运动的出現，絕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絕不是“少数人强迫命令的結果”，而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要求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的强烈愿望的反映。六亿多人民既已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获得彻底的解放，他們就必然把这种愿望变为行动，变为不可抗

拒的伟大力量。这种群众运动，在党的正确領導之下，已經成为和繼續成为推动我国經济建設不断跃进的最积极的、經常的因素。

馬克思主义坚决相信人民群众的无限的智慧和力量，相信在党的領導下的人民群众的創造性和主动性是实现我們的伟大历史任务的可靠保証。人民身上的枷鎖，只有靠人民群众自己来打破，人民的幸福生活，也只有靠人民群众自己来創造。所以，馬克思主义者同反馬克思主义者相反，对于革命的群众运动，历来都是采取热情支持，积极領導的态度；并且坚决地認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必須在党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通过群众运动才能不断地取得胜利。大家知道，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是何等重視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何等热情洋溢地歌頌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創精神。他們把群众的革命首創精神放在首要的地位，作为指导革命，发展理論的出发点。馬克思在巴黎公社起义以前的半年，曾向法国工人指出起义的条件并不成熟；但当工人英勇地自动起来进行革命的斗争时，馬克思不仅絲毫沒有“埋怨”、“斥責”群众革命行动，相反，他却以亲身参加这一伟大事变者的态度，对运动表现了莫大的注意，并以全部热情贊頌革命群众“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首創精神，何等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英勇斗争的范例。”伟大的列宁也象馬克思那样，他在領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活动的重大特点，就是深信群众的創造能力，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他对俄国一九〇五年的群众性的武装起义，滿腔热情地支持和积极領導，并且坚决駁斥普列汉諾夫的“本来不需要动用武器”的打击群众情緒的反动濫調，这是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在領導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从来都是善于依靠群众、积极的領導群众运动而不断地取得胜利的。毛泽

东同志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在他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名著中，坚决地驳斥了当时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污蔑农民运动为“糟得很”的谬论，热情地肯定了群众运动的历史作用，把群众运动赞扬为：“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在几个月内就完成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功勋。这是好得很。”一九五八年春天，当伟大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在“介绍一个合作社”那篇著名文章中說：“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他满腔热情地歌颂和支持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群众运动的到来。他从几十年来党所领导下的群众运动里总结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也是群众路线的方法。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之所以获得胜利，乃是由于党积极支持了人民群众要求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愿望，积极发挥群众的革命主动性和创造性，把人民群众团结和组织到工人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中来。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也是由于党集中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和结束小生产者所有制，彻底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强烈意志，广泛地开展群众运动而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当然也不能例外，党的领导必须从六亿五千万人民要求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的强烈愿望出发，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大搞群众运动，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迅速地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

马克思主义者所以这样强调人民群众的创造新生活的热情和革命首创精神，是因为它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的泉源。离开了它，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事业。马克思列

宁主义从来都反对从书本上现成的公式出发，去解决生活中的新鲜问题。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又经济落后的国家中，进行崭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和复杂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依靠群众斗争的活的经验，必须善于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一切问题才会迎刃而解。而群众运动，群众斗争的经验，又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所曾出现过的一切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的可耻和错误的共同特征，正是看不到这个真理，他们不愿意承认群众的无限智慧和力量，不愿意承认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们把群众当成“阿斗”“笨伯”，是“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消极因素，当他们在革命的时候，也只是由于他们一时的个人利益的需要，才不得不去利用群众，依靠群众来进行革命；但革命进一步前进，革命的利益不符合他们个人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就诽谤群众、反对群众，真是“翻手为云复手雨”。这些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右倾机会主义者，所以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群众，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特点，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当民众还是保守的时候，是不免要害怕民众的愚钝的，而在民众一旦变得革命的时候，却又要害怕民众的觉悟了。”

据说，右倾机会主义反对群众运动的所谓“理由”，是因为群众运动破坏了生产秩序，破坏了经济平衡。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的看法。恩格斯说：“运动就是矛盾”。矛盾是在运动中发展的，矛盾也是在运动中解决的。群众运动发展起来以后，是要破坏一些原有的生产秩序的，是要破坏原有的经济平衡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当亿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行动起来的时候，不但使原来以为很难做到的事情迅速地完成了，而且冲破了各种过时的陈

規，按照生活本身的邏輯，為我們的事業創造了新的事物。生產力發展了，就要求人們去改變生產關係。農村人民公社就是我國幾億農民，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一種偉大的創造，它一經代替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就以其“一大二公”的特點，比規模較狹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更能對生產力發展發揮積極作用。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一九五八年，通過群眾運動，在企業中調整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實行了工人參加管理，幹部參加勞動的制度；實行了領導幹部、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幾方面在黨的領導下密切結合的制度；有領導的改革了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使得企業的管理水平和生產水平大大地提高。這也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大搞群眾運動，會更加迅速地發展生產，從而更明顯地暴露生產上的薄弱環節，出現經濟上的不平衡，這是不可避免的。大家知道，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我們不怕不平衡，不怕薄弱環節的出現，我們的任務就是發動群眾，解決薄弱環節，解決不平衡，從而達到平衡。但是，群眾運動的發展，又不斷出現新的不平衡。這樣從不平衡到平衡，從平衡到又不平衡，經濟就不斷地往前發展。這是一條客觀規律。只有那些不願意社會主義事業向前發展的人，才害怕舊生產秩序的破壞，害怕舊的平衡的打破。

據說，右傾機會主義者反對群眾運動的另一條“理由”，是因為群眾運動帶來副作用，不可避免地產生缺點和錯誤。這也是一種十分片面的看法。群眾運動不是繪畫綉花，它是廣大人民為改造社會改造自然所進行的轟轟烈烈的鬥爭。馬克思主義者熱情地謳歌革命群眾運動，但并不認為在群眾運動中不可能產生一些缺點以至錯誤。問題是在於，我們究竟用何種態度來看待它們。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能夠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從全局來分析問題，因而能夠正確地認識到：同群眾運動給人民事業所帶來

的偉大成績相比，缺點和錯誤只是極其次要的東西，只是局部和暫時性的，只不過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的問題。而且正是由於我們依靠和積極領導群眾運動，前進道路上的一些挫折和困難就能迅速地克服。以為革命是十全十美地毫無缺點地進行，這不是書呆子，就是偽君子。列寧說得好：“對轉變中的困難和挫折幸災樂禍，散布驚慌情緒，宣傳開倒車，——這一切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階級鬥爭的工具和手段。無產階級決不會自己上當的。”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指示過的對群眾運動三種不同的態度：“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現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待群眾運動，仍然有這三種不同態度。這是區別每一個人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革命者還是假革命者的一條標準。幾十年來，中國革命的歷史車輪滾滾向前，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隊伍里涌現了成千上萬的群眾領袖。他們站在革命的群眾運動的最前列，對群眾滿腔熱情，和群眾同呼吸共命運，患難相俱，歡樂與共，對群眾運動採取積極支持和積極領導的態度，把群眾運動從一個勝利引向另一個勝利，從而表明了自己無愧於作為一個真正的堅定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家。但是也還有不少人，經不住革命歷史的考驗，對群眾運動發生動搖，甚或站在群眾的對面，反對群眾運動，成了革命的叛徒。特別是在從民主革命轉到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有的人缺乏不斷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逐漸深入的時候，對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採取抵觸甚至敵對的態度，這說明了他們不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而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以資產階級老爺式的態度來非難群眾運動。一切立志做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人，都應當站在革命的群眾運動的前列，站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思潮的最前綫。

当前右傾机会主义思潮的阶级根源及其危害性

龙世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我国进入了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中，由于多种经济成份的并存以及存在着相应的阶级关系，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期间，及时地正确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规律，体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愿望。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头这几年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做了许多巨大的工作，在1956年间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地出现了三大改造的高潮；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但阶级斗争

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时主要就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表现出来。1957年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又取得了全民整风与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斗争的重大胜利，这就表明，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之时，总结了过去几年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又及时地、正确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就是在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地及时地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和方法问题。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正在进入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但这并不等于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刘少奇同志说：“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的中央工作报告）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扭在一道的，在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仍然会有阶级斗争。去年，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体现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每个人都在这两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面前经受考验。在去年全面大跃进和伟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基础上，今年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以跃进的步伐前进着。可是同时也出现了一小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附和着国内外敌对分子的诽谤运动，利用早已克服了和正在克服中的缺点，向群众和干部泼冷水，散布悲观主义的情绪，企

图制造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我們外部还有帝国主义，他們时刻想顛复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我們还未充分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固的物质基础，还未完全地建成社会主义。所以，在我国内部，就不可避免地还会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必然会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国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仇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并力图否定和抹煞这些伟大成就；对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路线表示不满，并力图通过夸大建设事业中一个指头的缺点、否定九个指头的成绩而达到反对社会主义的目的。资产阶级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活动，必然会影响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个别不坚定分子，并在他們的身上得到反映；而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影响就会在党内形成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潮，直接在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内部来危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国当前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抓住我們在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和局部的暂时的紧张现象，說大跃进“冒进”了，叫嚷着“大炼钢铁得不偿失”；抓住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所带来的一些个别缺点，大叫什么“人民公社搞快了，搞早了，搞糟了”等等。他們怀疑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而其根本目的，就是否定社会主义。这说明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斗争中是渗杂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

党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和按比例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要高速度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要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因为只有采取这个方针，才能有国民经济的不断

扩大再生产，才能把国民经济轉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也就是說，才能迅速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因此，凡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要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人，首先要对优先发展重工业表示态度；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实质上正是缺少重工业，有了重工业，就能够带动其他。对于建成独立的工业经济体系，对于改造各个经济部门的技术落后状况，对于进一步从经济上巩固工农联盟，对于巩固国防，重工业都起统帅作用；从扩大重工业开始，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工业化所固有的方法，因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则是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基础，没有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根本没有所谓高速度。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地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提出了“优先”和“并举”、“綱”和“目”的关系，一方面更充分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一方面也反映了按比例的关系，使重工业之間、工农业之間、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之間，既能达到高速度的发展，又在发展中不断调整着比例关系。此外，已经解放了的六亿多人民要求尽快地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因此才能产生出无穷无尽的力量。这股干劲是革命的自觉的干劲，是“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干劲。这是我們能够以高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要求高速度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迫切要求。

为此，所有拥护、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首先得承认高速度的经济建设是一种客观必然性，得承认优先发展重工业是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的方法。在这个重大的问题面前，当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由于高速度发

展社会主义經濟而不可避免产生了一些局部紧张现象和暂时的困难时，我們應該采取怎样的态度？是被目前发展中所产生的一时的、局部的、完全可以克服的紧张现象和困难情形所吓倒，而对总路綫产生怀疑、动摇和反对的态度呢，还是坚定不移地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針，坚持高速度建設社会主义的方針，积极去克服困难而繼續前进呢；是拥护高速度，是反对高速度，还是怀疑高速度，这不仅仅是認識方法問題，應該說是一个立场問題，路綫問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和我們的分歧，不仅仅是在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上的分歧問題，應該說是涉及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的分歧問題。

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同时又是党的群众路綫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的应用和发展。去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都是几亿人民的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规模之大，声势之猛，是无以伦比的。沒有几亿人民的这样一股干劲；沒有反映和体现生产力和思想解放的这样一股干劲，要取得去年大跃进的或就和今年繼續跃进的成就是不可能的。只有依靠群众运动才能多快好省，我們不仅依靠群众运动进行工农业生产，也依靠群众运动大办文化教育事业，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既然是亿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認為在这样几亿人民的开天劈地的行动当中不出一点缺点，不出一点錯誤，这是空想家。当在群众运动当中出现一些缺点或者錯誤的时候，我們采取什么态度呢？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得拥护群众运动；如何对待社会主义建設的群众运动，是支持它，是反对它，或者怀疑它，正是表现为对待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态度。在社会主义建設面前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正是区分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明显界限。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把宝贵的群众热情，詆毀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冒进”、

“浮夸”、污蔑为“上边强迫命令造成的”，这就暴露了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的资产阶级老爷面目。

由于高速度建設社会主义在某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局部的紧张和困难，在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个别的缺点和錯誤；这种情况每每正是社会主义的怀疑派、反对派抛头露面的政治气候，是他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好时机，我們如何对待这些社会主义的怀疑派、反对派的叫嚣、詆毀、諷刺、进攻的行为？如何对待这些右傾言論，右傾观点？每个国家干部，每个公民，都要在这个問題上端正自己的認識。

右傾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是經常的主要的危险。右傾机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的反映。我国当前的右傾机会主义思潮，則是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高速度发展，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党内的反映。右傾机会主义总是在革命的重要关头頑强地表现出来，严重地危害着党的革命事业。它的危险性，正在于它是属于要不要社会主义的問題性质。斯大林同志說过，党内的右傾是离开馬克思主义革命路綫的傾向。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抓住非主流方面，而否定主流方面的东西，只抓局部现象而否定全面的東西——这种錯誤是属于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不仅仅是两种方法的斗争，就不仅仅是思想方法上的錯誤。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每每是当党遭受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就挺身而出向党宣战，不管它們是自觉的或是不自觉的，总是和国内外敌人异口同声，相互呼应。他們不是当敌人进攻时起来保卫党的利益，而是向党拆台倒算。目前这一小股右傾机会主义思潮的危险性也正在于此。

当前我国右傾机会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危害性，也正在于它是直接违背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他們的路綫是泄气松劲，甘居下游，少慢差費的路綫。右

傾机会主义分子和我們的分歧，本質上就是在总路綫問題上的分歧。他們对待党的总路綫，对待大跃进运动，对待人民公社化运动，采取了表面上承認實質上否認；形式上承認，內容上否認；抽象地承認，具体地否認的手段，采取表面上是方法上和我們有分歧来掩盖實質上在路綫上的分歧的手段，麻痹我們对斗争實質的注意。

充分地認識我国当前右傾机会主义思潮的階級根源及其危害性，就使我們能深刻地認識它是我国当前的主要危險。我們必須坚决地和右傾机会主义思潮作严肃的彻底的斗争。只要我們从其階級根源来观察，揭掉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各种外衣，就可以看出他們的个人主义的眞面目。要彻底清除这一小

股右傾机会主义思潮，克服一切右傾思想，必須克服个人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愈是加速进行，资产階級个人主义就愈是沒有容身之地。我們必須在思想战綫上繼續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决以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挂帅，坚定不移地坚持建設的高速度方針，群众路綫方針，坚决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划清界綫，認真学习党的总路綫，認真学习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認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每个人坚持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紅旗的根本保證。

华南师范学院学术研究日益活跃

在党的教育方針的指导下，华南师范学院党委于去年发动全校师生大搞科学活动，一年多以来，全院参加科学研究的师生1784人，共完成科学研究項目 582 項，在学术研究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績。去年9月到今年1月結束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不仅大量揭发和批判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階級学术思想，使全院师生受到了一次深刻而生动的兴无灭資教育，而且使学术活动随着活跃起来，全院师生共发表了学术批判文章 203 篇。今年二月到七月这一段期間，仅文科各系举行的学术討論会，即达31次，写出学术論文60篇左右。学术討論的內容，有中文系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問題、李清照詩詞的評價問題；历史系的曹操評價問題、中国封建社会分期問題；教育系的教学过程和認識过程問題、心理学的对象、性質和任务問題；外語系的中学俄語教学問題以及英語中納氏音标与国际音标的比較等等。最近两个月来，該院师生鼓足干劲，又完成了許多研究項目，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在献礼項目里，包括有关于十年来語言学、邏輯学等論文；有关于研究哲学、历史科学、文艺理論的論文；有关于闡述社会主义总路綫、駁斥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論文；此外，还有結合生产劳动和工作实践而写出来的“工厂史”、“县志”、“民間故事选集”等，質量都較高。

試論国民經济的战略平衡

——駁所謂“国民經济比例失調”的謬論

梁 劍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一年多来的实践，已經充分証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是能够跃进和繼續跃进的。同时，在实践中我們对于充分發揮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考虑物质技术条件的客观可能性相結合，保証重点和全面安排相結合，集中領導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相結合，以及国民經济的綜合平衡工作，都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經驗。对于社会主义經济发展的客观規律，特别是对于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的規律也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

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規律，研究国民經济的战略平衡，反对右傾思想，駁斥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所謂“国民經济比例关系失調”的各种謬論，更好地貫徹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和建設方針，干劲百倍地为社会主义建設而奋斗，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社会主义建設是有計劃按比例发展的，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保証社会主义建設高速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家知道，任何社会形态为了自己的存在和发展，都要使国民經济各部門各方面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这是馬克思再生产理論的一个重要原理。但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公有制的条件下，才有可能通过有計劃地发展国民經济，实现按比例的要求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規律是作为資本主义制度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規律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社会主义生产和需要的調节者。

所謂国民經济发展的比例，实际上就是社会再生产的对比关系，也就是国民經济各部門各个方面之間的对立統一的关系。諸如：生产資料生产和消費資料生产的比例关系、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重工业和輕工业的比例关系、生产和流通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費的比例关系等等。所有这些比例关系，也就是国民經济发展中的矛盾。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保持最主要比例的战略平衡，使国民經济沿着大跃进高速度的道路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問題。

毛泽东同志創造性的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的实际相結合，总结了我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設中的丰富經驗，創立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偉大学說，找到了調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社会主义建設的途径，提出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和指导国民經济发展的一整套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充分地發揮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于是出现了1958年开始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偉大局面，創造了史无前例、前无古人的偉大業績。但是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在偉大成就的面前，却靜眼看不见事物的本質和主流，把某些暫时的、局部的缺点夸大到极其严重的地步。說什么“大跃进破坏了平衡，違反了按比例規律”，他們制造了一条吓人的公式：“跃进——紧张，大跃进——大紧张”，以图达到否定高速度地建設社会主义的目的。当然，这是办不到的。

什么叫做国民經济的平衡呢？所謂国民

經濟的平衡，首先應該是國民經濟的戰略平衡，也就是說國民經濟的主要比例關係是否適應，能否保證國民經濟的繼續躍進，能否使社會主義建設高速度地發展的同時又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去年工農業生產全面躍進的偉大事實，充分證明了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要比例關係是適應的、正常的，在戰略上是平衡的；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發展國民經濟的用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它們已經發揮和將繼續發揮着偉大的作用。但是國民經濟的平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是絕對的，而只是相對而言的。某些局部的、暫時的不平衡那是經常存在的，永遠也不可能避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愚蠢可笑的地方就在於他們把國民經濟看作是一潭死水，他們從孤立靜止的算式出發去理解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規律，他們不懂得區分積極的先進的平衡和消極的機械的平衡，不考慮我國建設社會主義高速度發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不考慮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作用。這就使得他們在國民經濟出現某些個別的暫時的、不可避免的不協調的現象的時候，大驚小怪，發生動搖。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教導我們說：“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過了一年，就整個說來，這種平衡就被矛盾的鬥爭所打破了，這種統一就變化了，平衡成為不平衡，統一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事實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這種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局部的調整”。毛澤東同志的這段話對於我們正確地認識大躍進的偉大成就及其豐富經驗，具有非常深刻的理論指導意義。國民經濟的發展總是後浪推前浪，不斷地前進的。國民經濟的平衡總是相對的、暫時的，不平衡是絕對的普遍的。平衡又不平衡這是國民經濟發展的两个方面。社會主義建設高速度地向前發展，許多部門、許多地方超額完成了計劃，

突破了原來的指標，出現了許多新的成就，這就必然不斷的打破舊的平衡，這種發展中的不平衡，是不可怕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它每日每時都在產生都在發展，並推動着我們前進。這就叫做形勢逼人。領導的任務就在於堅持政治掛帥不斷地反對右傾思想，充分發動群眾，深入地開展裏裏烈烈的、大規模的、群眾性的趕先進、超先進的增產節約運動，而不是害怕群眾超越計劃突破平衡，恰恰相反，應該充分地發揮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高度熱情，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鼓足干劲，不斷地為完成和超額完成計劃而奮鬥。但是這決不是說，國民經濟的平衡就可以不注意了，國民經濟失調和脫節現象可以不去防止了。計劃工作的任務就是要注意組織全面的綜合平衡，加強薄弱環節，調整某些可能產生失調的比例關係，防止脫節現象。為此，一切經濟工作部門都必須堅決地貫徹全國一盤棋的方針，從全國着眼，從六億人口出發，既要保證重點又要照顧一般，統一規劃，全面安排，既要不斷躍進又要留有余地和建立必要的後備，以便及時防止和消除國民經濟的脫節現象，防止任何意外，保證社會主義建設高速度的發展。總的來說，我們所要做的，就是積極的先進的平衡，而不是消極的機械的平衡，大躍進以來所有的事實都說明了我們正是這樣做的。

為了保證國民經濟的戰略平衡，必須正確地解決國民經濟中帶決定性質的比例關係，這就是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類的比例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

在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類的比例關係中，最重要的是工業和農業、重工業和輕工業的發展關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胡說“大躍進破壞平衡，全面緊張”，其實他們對於國民經濟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戰略平衡，對於工農業之間、重輕工業之間的平衡却是一竅不通。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把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提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这样高的地位来，他说：“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几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以及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这就不仅没有产生工农业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严重脱节和互相牵制的现象，相反使得它们互相推动、互相促进，因而，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去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和今年继续跃进的形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我们“只重视重工业而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事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特别注意了农业的发展，跃进的速度才有如此之快。应当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够高速度发展，是和我們党正确地解决了农业发展的問題，充分地发挥五亿多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无限积极性是分不开的。

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得最为厉害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他们说什么“以钢为纲不是全面跃进而是全面紧张，挤掉一切，打掉比例”，“一马当先，万马不奔腾”。但是事实恰好和他们所说的相反，以钢为纲确实是带动了一切而不是挤掉了一切。自从去年提出以钢为纲

全面跃进的方针以后，很快就出现了工业生产全面大跃进。1958年与1957年比较，我国的煤炭增长了108%，发电量增长了42%，发电设备增长了304%，机床增加了79%，动力机械增长了190%，硫酸增长了17%，纯碱增长了26%，机车增长了110%，汽车增长了113%，民用船舶增长了67%，全国去年有55条新的铁路线先后施工，全年铺轨3,564公里，比上年增加一倍多，铁路货运量增长39%。轻工业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例如棉纱增长了31%，棉布增长了13%，纸增长了34%，糖增长了4%，食用植物油增长了14%等等。难道能够说这是挤掉一切而不是带动一切吗？！应当指出，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也和其它的并举方针一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的伟大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再生产理论在我国的创造性运用。马克思的再生产原理告诉我们，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生产资料必须优先增长。我国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正是根据这个原理制定的。在重工业部门中钢铁又是主帅。“有了钢铁就能够有机器，而有了钢铁和机器，也就能够有整个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①贯彻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就是说要突出重点，全面安排，抓住主要矛盾，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我们不可能设想，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不分轻重、不分主次。没有重点就无所谓一般，也就没有政策。但是我们强调重点，也不是说可以丢掉一般。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其结果就是既有红花又有绿叶，红花为主绿叶扶持，这有什么不好呢？！当然要迅速实现工业化，不付出任何代价，不遇到任何困难，没有一点紧张，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宁愿没有工业化，而长期处于贫困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好呢？还是忍

① 周恩来：关于调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第一部分，第一节。

受暫時的困難和緊張，以換取將來更美好的生活好呢？這不是再清楚不過的道理嗎？！

國民經濟是否保持了戰略平衡，應該從兩個最主要的方面來考察，一方面是社會生產的發展；另一方面是人民生活的提高。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攻擊大躍進的主要論據之一就是所謂：“去年的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失調了，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這當然是十足的謬論。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這是我們國家的一條重要原則，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主要表現之一。去年大躍進以來，工農業生產以空前未有的速度發展。在生產飛躍發展的基礎上，去年國民收入的積累部分有較大的增長，僅國家用於基本建設投資方面的積累總額就達267億元，大大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年，相當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投資總額的一半，此外人民公社用於積累的收入也有很大的增長，這就保證了去年高速度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需要。同時，去年人民的生活消費水平也有顯著的提高。去年全國職工增加了約800萬人，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失業現象已經消滅。根據典型調查，廣州市工業部門生產工人每戶現金收入，1952年為771.51元，比解放前的1948年增長50%左右，1957年每戶收入提高到1,084.24元，比1948年增長一倍以上；而1958年他們的收入又有顯著增加，每戶收入達到1,107.57元。^①農民的生活水平也有顯著的增長，1958年一年，廣東全省農村消費的糧食，按農村人口計算，平均每人達到六百斤左右（包括雜糧），比1957年增加了50斤，即增加9.9%。據花縣花山人民公社的調查，“今年上半年，全公社分配給社員的金額175萬元，每戶平均分到121.7元，每人平均分到29.2元，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全社百分之百的社員都增加了收入。”^②隨着工農收入增加，人民的購買力有很大增長，去年上半年城市的購買力比去年同期增長30%，農村由於人民公社化和生產大發展以後，購

買力也有很大提高。今年上半年全國商品零售總額比去年同期增長23%。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一切社會主義的對立派，對於我國勞動人民的生活大大改善的鐵一般的事實，故意睜眼不見，也不願意看見，這就充分說明了他們的所謂“關心人民生活”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了。

綜上所述，可見，去年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在戰略上是平衡的，主要的比例關係總的說來是協調的，我國的政治經濟情況都極為良好的。它不僅保證了去年和今年工農業生產和各方面的建設的大躍進，同時也為今后的繼續躍進準備了非常有利的條件。

誠然，在大躍進的過程中，國民經濟的某些部門，在個別環節上也有過某些比例不夠協調的現象。例如社會購買力增加得過快了一些，市場某些商品的供應情況在一個時候有過一些緊張，發生過部分原料、燃料、材料供應上的困難。但是，這只不過是暫時的、局部的、不帶根本性質的困難，這只是個別的、暫時的、非戰略性質的不平衡。當然這些是缺點，但這主要是由於對大躍進還缺乏經驗而產生的。在黨的正確領導下，經過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上述缺點已經很快在生產發展中逐步克服了。所有這些都只不過是我們前進道路上的一點困難，是在大躍進的巨浪中所濺起的一點浪花。這又有什么奇怪呢？！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鼠目寸光，看不見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看不到事物的本質和主流，一葉障目，誇大了個別已經克服和正在克服的缺點，以至喪魂落魄、神志昏迷，這就難怪他們要滾到泥坑里去了。

① 參閱南方日報1959年9月15日第四版，“全省工人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的報導。

② 張根生：花縣花山人民公社調查報告。南方日報1959年9月3日。

世界觀与方法論的一致

王致遠

工作方法的重要性

工作方法是辯證唯物主义原理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不是简单的技术性問題，也不是学了一种方法就够了。我們要总结經驗、研究工作方法，必須从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上加以分析批判，才能真正提高思想，改进工作。

毛主席对于工作方法問題，一貫十分重視。他不但自己善于运用正确而有成效的方法来指导革命和建設事业，解决各項重大問題，而且經常教导我們要重視工作方法問題，指示我們如何正确掌握唯物辯證法，做好工作。他說：“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沒有桥或沒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問題，过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决方法問題，任务也只是瞎說一頓。”^①这是毛主席在廿六年前講的話，說明毛主席很早就重視工作方法問題。在抗日戰爭时期，他写了“实践論”、“矛盾論”、“关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等有名的著作，总结了党的工作方法，創造性地从辯證唯物主义的原理来闡明工作方法問題，教育了千千万万的干部。这些不朽的著作閃耀着馬克思主义的光輝，永远是我們研究理論和工作方法的宝庫。在全国解放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提出以后，他更反复強調工作方法的重要性，要求全党認真研究和改进工作方法。

为什么总路綫提出以后，要更加重視工作方法問題呢？我們知道，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經驗的总结和概括，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相結合的典范，这条总路綫已經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高速度发展的无数事实，雄辯地証明它是在中国具体条件下唯一正确的路綫。但是，正确的路綫还須要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实现。因此，在总路綫提出以后，工作方法問題就具有决定意义。

在整风运动以后，我国的政治情况已有所改变。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新的生产高潮已經形成。我們就不但要繼續进行阶级斗争，而且要用更多的力量去进行生产斗争。在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大国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設，是一項异常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而这对于我們大多数干部來說，是不熟練和缺少經驗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們的工作方法必須适应新情况的需要。

在去年大跃进中，辯證法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广泛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如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全国一盘棋、搞試驗田、解剖一个麻雀、参观訪問、现场會議、抓两头带中間、检查評比……等等都是活生生的辯證法。千千万万的干部和群众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辯證法，这不是简单的事情，这是唯物辯證法的伟大胜利，是总结大跃进經驗

^①“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1951年版第一卷，第136頁。

时应该首先看到的主要方面，决不能因为看到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錯誤就低估这方面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在各项实际工作中，也有不少干部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还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毛病，因而未能把工作做好或做得更好。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总路线，我们必须对过去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思想，改进工作。因此，研究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对今后工作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必须明确，我们研究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总路线，为了继续跃进，为了工作做得更有成效，而不是其他。有些人在学习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中，抹煞了去年大跃进中伟大成就的一面，而夸大了缺点和错误的一面，专谈缺点和错误而不总结成功经验，甚至把工作方法问题看作路线问题，从而怀疑总路线、怀疑大跃进、怀疑人民公社，这是用右倾观点来学习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其结果不仅无法达到学习的目的要求，反而引起思想混乱，违背了学习的原意。

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关系

在谈到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关系以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工作方法与思想方法的关系。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都是属于方法论问题。一个是怎样想，一个是怎样做。两者虽有不同领域，但都受同一规律所支配。工作方法是思想方法的体现，你怎样想，就会怎样做。思想方法对头，看问题合乎客观实际，做起工作来，就顺利而有成绩。相反，思想方法主观片面，不符合客观实际，工作就不能做得好，甚至会失败。有些干部看问题简单化，以自己来度量别人，自己懂了就以为别人也会一說就懂，于是不去做艰苦深入的教育说服工作，而采取强迫命令的方法来完成工作，这就不能把工作做好。

想得对、做得不好这种情况有没有呢？当然也有，但这不是一般现象。这主要是由于不熟练，受经验限制，或有其他的具体情况。

工作方法体现思想方法，这可由思维规律（主观辩证法）和存在规律（客观辩证法）一致的原理来说明。列宁说，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这就是说，辩证法包含着研究思维和认识发展规律的逻辑和认识论。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存在决定思维，思维是存在的反映，思维规律则是存在规律在人们主观意识中的反映。因此，就其内容来说，它们是统一的。人的脑子怎么能够辩证地思维？这就因为客观事物辩证发展的规律性，亿万次地反映在人脑中，在实践中，人们认识到，只有按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来看问题，来想事情，才能想得对，符合客观实际。工作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思想符合客观实际，就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思想不能正确反映客观实际，工作方法就不对头。比方，客观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如果我们能这样如实地理解事物，用两点论来观察、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在工作中，既看到好的一面，又看到坏的一面；既看到有利条件，又看到困难条件；既看到需要，又考虑到可能；既预见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又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变化。这样全面看问题，做起工作来，就会既藐视困难，又重视困难；既鼓足干劲，又留有余地；既坚持原则，又有灵活性。相反，片面地看问题，思想没有如实地反映客观实际，好就绝对的好，坏就绝对的坏；看到有利就忽视困难，看到困难就失去信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工作自然无法做好。我们工作做多了，对于成功的做法，加以总结提高；对于失败的做法，加以分析批判，引为教训，这样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规律，思想方法就能更近似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

既然思维规律是存在规律的反映，那末，是不是任何人都能够一下子就正确反映

客观规律呢？这个问题说起来似很简单，实际上可不容易。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不但是复杂多变的，而且其实质是难以一下捉到的。虽然本质总要通过现象表现出来，但是本质深藏于事物内部，不容易一下就从现象抓到本质。在外观上，现象往往与本质相矛盾，尤其是在社会生活中更是如此。因此，我們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必須善于从复杂多变的事物和其现象中抓到事物的本质。毛主席教导我們：“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門的响导，一进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①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些同志听了富裕农民的叫喊，就采取“坚决收縮”的方針，解散了大批农业合作社，这在認識論上來說，就是由于沒有抓到事物的本质，而犯了右傾錯誤。毛主席当时批評这些同志說：“这些同志看問題的方法不对，他們不去看問題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強調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問題，必須逐一地将它們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②形而上学的把现象和本质割裂开来，看問題表面化，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在这种思想方法指导下，自然不可能有正确的工作方法。

同样，客观现实是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任何事物都是一个过程，都有其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我們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問題，想事情以客观现实的变化为根据，形势变化了，思想也跟着变化，这样，思想就能符合客观实际，思維规律就正确反映了存在规律，做起工作来，就能具体而切合实际。相反，用靜止、孤立的观点来看問題，来处理工作，就不符合实际。

由此可见，要做好工作，必須有正确的思想方法，而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則必須克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使思維规律正确

反映存在规律。

世界观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关系

工作方法是思想方法的体现，怎样想就会怎样做，已如上述。但是怎样想，不仅包含思想方法問題，还包括立场观点、思想意識等問題，就是說还包含世界观問題；而思想方法也是由世界观决定的。因此，工作做得好坏，其总根源在于世界观。刘少奇同志說：“人的一切行动，都是有人的思想意識来作指导的，而每一个人又有他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来作为他的一切思想行动的总的指导。”^③由此可见，要做好工作，必須有正确的世界观，这是最根本的、决定性的东西。

这个道理，从理論上來說，就是世界观与方法論的一致。世界观与方法論的一致是什么意思呢？

世界观是我們对于整个世界总的看法。我們对于周围整个世界是怎样看的，就决定我們对周围世界采取什么态度和怎样行动。

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階級及其政党——共产党的世界观，也是无产階級及共产党用来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它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論。說它是世界观，因为它回答了哲学的根本問題——思維对存在的关系問題，認為世界是运动着、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这个世界及其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轉移的，人的思想是客观世界在我們头脑里的反映。这就是无产階級对周围整个世界总的看法。一切原則、观点、方針、政策无不受这个总看法的支配。說它是

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1951年版第一卷，第105頁。

②“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21頁。

③刘少奇：“論共产党员的修养”。195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0頁。

方法論，因为无产階級有了这样的世界观，对世界有了这样一个总的看法，就可以反轉过来，拿它来研究世界上的一切問題，来指导革命和生产活动，来进行工作，来指导行动、議論事情。

再从辯証法來說，唯物辯証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維运动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具有极大普遍性和高度概括性，它不是专门研究某一門具体科学、某一領域的具体规律的。研究这种最一般的规律，就关联到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問題。因此，从这方面來說，唯物辯証法是世界观。另一方面，唯物辯証法是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它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发展学說。”（列宁）是唯一科学的方法論，它对于一切具体科学都具有方法論的指导意义。任何具体科学只有以它为方法，才能得出正确的結論。因此，它是方法論。

說世界观与方法論是一致的，能不能就把两者简单地等同起来呢？不能。从整个理論体系來說，两者是各有其相对独立性的。而在两者的关系中，世界观是具有决定作用的，是最根本的东西，它貫串于人生观、社会观、历史观、道德观、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等等之中，一切都受它支配。沒有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就沒有正确的工作方法；世界观不同，工作方法也就不一样。比方，信神的人，认为世界是神或上帝創造的，神是万能的，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由神支配，人若违背了神的意旨，就会受到惩罚。在这种世界观指导下，他的人生观是宿命的，对一切都缺乏反抗精神，甚至得了大病，不是赶快延医診治，而是求神“保佑”或“饒恕”，奉供許愿，求神賜“神方”治病。这种行动，在稍具科学头脑的人看来是愚蠢而可笑的，但是受这种世界观支配的人，却认为是“天經地义”的。又如帝国主义者，他們的世界观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他們不承認客观世界及其规律不依人

的意志为轉移，不承認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資本主义这个社会发展规律。因此，在实践上，他們就制造战争危机，到处搗乱，对社会主义国家搞顛复活动，甚至連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对世界事务有着重大影响作用的大国都不予承認，視而不见。这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到处碰壁的根本原因。有人說，資本主义国家里的科学家，虽然在世界观上，他們是唯心主义者，但在科学研究上，他們也能用正确的方法获得某些研究成果。这又怎样解释？我們必須看到，資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所以也能够取得某些成果，并不是由于他們的世界观所产生的必然結果。恰恰相反，他們也能用正确的方法获得成果，正是由于他們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实际上违反了他們的世界观，自觉或不自觉地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承認世界的物質性和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如果他們认为一切可以随心所欲，那又为什么要进行无数的假設和試驗呢？

既然世界观决定方法論，沒有正确的世界观，就沒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那末，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是否就一切工作方法都对头？或者工作方法錯了，是否都属世界观和立场的問題？我认为不能这样說。就一般而論，世界观正确，方法也往往比較正确。但是世界观、立场基本相同的人，方法不一定都一样。这是因为在实际工作中，还要受其他种种条件影响，如政治思想水平、理論水平、政策水平、經驗技术水平和工作条件等等。简单地推論，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結論。

好人也会犯工作方法上的錯誤，能否說，也都是世界观、立场的問題？对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說，工作方法有錯誤，直接間接总是和世界观有关联的。因为我們大多数人都是从旧社会来的，在 worldview、思想意識上或多或少还存在資产階級的影响，无产階級的世界观虽已确

立或开始建立，但旧的世界观、旧的影响还没有完全克服，还多少有些残余。这样，在思想意識上就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个人主义；在思想方法上就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做起工作来，就可能出现“左”的或右的偏向。正因为如此，所以改造思想，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克服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或其残余，不但对于新干部、旧知識分子是个根本問題；对于老干部、共产党员也是十分需要的。不能說好人在工作方法上犯錯誤，与世界观毫无关系。为了有效地改进工作，从思想認識上、从世界观上来检查犯錯誤的根源是有好处而且是必要的。自然，我們在处理实际問題或批評別人的錯誤的时候，也不能随便給人家扣上世界观、立場問題的大帽子，把一切工作方法上的問題都当作世界观、立場的問題。

好人在工作方法上有缺点，犯錯誤，有些时候，是由于認識事物的本質及其规律需要一个过程，或由于沒有經驗；有些时候，是由于革命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地总会出现一些小偏差；有些时候，是由于思想方法不对头；有些时候，是由于为某些表面现象所迷惑，認識有錯誤，等等。这些和世界观是沒有直接联系的。因此，我們既要認識世界观与方法論的一致性，又不能簡單地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不过，作为学习，为了提高思想，我們應該強調世界观与方法論的一致，从世界观、認識論、方法論上来进行检查、分析、批判，不要把工作方法看作“雕虫小技”。

提高思想，改进工作

既然世界观与方法論是一致的，那末，如何根据这个原則来改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呢？

第一，根据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世界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轉移的

客观存在，世界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也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轉移的。因此，正确的工作方法必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工作方法的第一个根本原則。毛主席說：“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的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①这是正确的思想和行动的定义。

为了做到真正从实际出发，主观符合客观，必須进行調查研究，善于观察形势，了解真实情况。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工作方法，就不能做到从实际出发。

了解客观真实情况之后，就必须以之作为我们进行工作的根据和出发点。超越客观情况所許可的范围，就会犯“左”的偏向。我們进行一切工作，都应该鼓足干劲，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但是干劲冲天，不能违反客观规律；敢想、敢说、敢干，必須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同样，客观情况本来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努力去完成，思想右傾保守，也不是从实际出发。人的認識往往落后于实际，客观条件是不断在变化着的。人对客观规律虽不能創造和消灭，但却可以認識、掌握、运用它們，而且人还能够改变和創造客观条件。低估主观能动性的伟大作用，这是錯誤的。因为反对浮夸而不敢鼓干劲，因要落实而不敢提跃进指标，甚至認為指标越低越好，这种右傾松劲情緒和做法，也都不是从实际出发的。

第二，世界及其规律是可以認識的，因而世界是可以改造的。如何認識世界？通过实践。实践是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因此，群众路綫的方法是工作方法的第二个根本原則。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最正确的認識方法和工作方法。毛主席說：

^①“論持久战”。毛泽东选集，1952年版第二卷，第467頁。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

我们的头脑是一个“加工厂”，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要我们的计划、意见和办法正确，就必须贯彻群众路线的方法，以取得“加工厂”的原料或半成品。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多谋善断，所谓多谋，也就是说凡事要和群众多商量，从群众的实践中找主意和办法。

搞试验田、研究典型、办展览会、参观访问、现场会议、走马观花、下马看花等工作方法，也是认识论原理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

第三，认识事物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就能认识清楚或认识完的；事先预见的情况也可能中途发生变化。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掌握“一切通过试验”、“鼓足干劲，留有余地”、“由点到面，点面结合”、“二本账”等工作方法。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并为实践所检验，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规律，人就能由不知到知，由不完全不确切的知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因此，我们进行工作，特别是推广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必须有个过程，通过试验，由实践证明正确，再普遍推广。如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各地区、每块田地的气候、水利、土壤等条件又不完全一样，因此，新的耕作方法和新品种，不能仅在一个地方一个时候获得增产的效果，就貿

然全面推广。

第四，世界各种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每一事物或现象都是对立的统一，矛盾的斗争是发展的源泉。因此看问题必须全面，不能片面；做工作要两条腿走路，不能一条腿走路。

所谓全面地看问题，就是把事物理解为对立的统一，也就是两点论。如上下、左右、有无、虚实、轻重、缓急、是非、曲直、生死、成败、祸福、吉凶、真伪、美丑、优点与缺点、困难与顺利、冷与热、红与专、苦战与休整、冲天干劲与科学精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只看到或只抓到一面，而忽略另一面，就是片面。两点论就是要看到矛盾，承认矛盾、找出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否认矛盾，掩盖矛盾，回避矛盾，都不是正确的做法。高明的领导者，不但要承认矛盾，而且要按照客观实际情况，树立对立面或有意地“设置”对立面，以推动事物合乎规律地发展。抓两头带中间，评比竞赛、大鸣大放、大辩论等方法，都是这个原则的具体运用。

仅仅把事物理解为对立的统一还不够，还要具体分析矛盾，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便解决矛盾。这就是抓中心、抓关键、纲举目张，全面跃进等等工作方法。

以上四条，只是概略地说明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说明实际工作中的许多方法问题，都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有关，不是简单的技术性问题的。至于如何具体运用，还要进行具体研究，这里就不详细谈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

^①“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1951年版第三卷，第921页。

张載的唯物思想(上)

杨荣国

张載(公元1020—1077年),字子厚,陝西西安人。著作有西銘、正蒙和經学理窟等,其中正蒙是他的代表作。他钻研“释老之书累年”,^①可是,从“尽究其說”中,感到没有什么道理,便尽弃其学,轉而从事于六經的研究。

佛教經過五代末吳越王錢鏐、錢俶和宋太宗、真宗等一再宣揚与宗奉,曾显得一度活跃,^②尤其是在宋神宗时,社会危机暴露:一面是从工商业发达中所导致的土地集中现象相当严重,而另一面壮大了的金人又威势日逼;在这种情势下,有的人从困扰于现实而又不敢正视现实中向佛家的道路上走,以求得精神上的安慰;有的人則有意識地宣揚佛教的主观唯心論,所謂“一切唯心”,“心法起灭天地”,导引人无视现实汨沒人的意志。张載是認識了佛无道理,但是当时是“释老比尤熾,群伦将蕩然,”^③所以他就从佛教的思想上給予佛教以批判。

(一)张載的唯物思想和他的科学思想

佛家否定客观世界有物質的存在,所以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④按“色”指“有形”,“空”即“无形”,意即“有形”就是“无形”,而沒有所謂“有形”;換言之,亦沒有所謂有形的物質,都只是“无”,只是“空”,所以說“太虛空”,整个的太虛是空无所有的。

张載从唯物論的观点出发予以駁斥,他說:

“太虛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耳。”^⑤

这話,按王船山的解释是說:“于太虛之中具有而未成乎形,气自足也,聚散变化,而其本体不为之損益。日月之发斂,四时之推迁,百物之生死,与风雨露雷乘时而兴,乘时而息,一也,皆客形也。”^⑥

意思很明显:太虛中具有形状的固是物質;而不具形状的亦是物質。因为太虛的本体就是物質;至于具形状与不具形状,这是有关太虛中物体自身之凝聚与分散,是物体自身的变化,人們不能任意予以否定。

他又說:“太虛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⑦

他的意思是:太虛的本体是物質,而物質的变化发展,它的聚与散,这是事物的必然现象。

①张子全书卷十五:吕大临所写行状。

②焦氏类林卷之八释部:宋“庆历中,士大夫多修佛学,往往为偈頌以发明禅理,司馬温公为解禅偈六篇。”

③温国文正司馬公集卷五:子厚先生哀辞。

④般若小經。

⑤张子全书卷之二:正蒙太和篇第一。

⑥张子正蒙注卷一:太和篇。

⑦张子全书卷之二:正蒙太和篇第一。

而且不論物体本身如何发展变化，不論它的聚或散，但是有一点，“聚亦吾体，散亦吾体”，①——仍是物质；由是而知，物质只有它的发展与变化；但它的散，自然也不是物质的消灭。物质的自身是无所谓消灭的。

按佛家有所谓“无余涅槃”，肯定死即消灭，即是“息幻归真，从化返本。”而张载是认定“死之不亡”的。②所以从分析中肯定物体虽因它的发展变化而有聚散，但散不是消灭，因而肯定物质是不灭的，给予佛家这种“死即消灭”的思想以有力的批判。

而佛家的“息幻归真，”这所谓“幻”，就是指“天地日月”，——一切物质的东西，都非实在，而只是幻觉。离开了这一所谓幻觉的世界而达到纯精神的领域，——这是“息幻归真”。

张载驳斥道：“气聚则离（离为目）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故圣人仰观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盈天地之间者，法象而已！”③

按：“盈天地之间者，法象而已。”这“法象”指万物，即“盈天地之间者，为万物。”④他在另一个地方亦明确道出这意思：“今盈天地之间者，皆物也。”⑤

这就是说：不论客观的事物如何发展变化，它的凝聚固然是有形的物质，容易为人们所察知；就是它的分散，虽由于不具形状而不易为人们所目及，但自也不是消失，仍是物质，仍是客观的存在，而不是虚无缥缈一无所有，不是所谓幻觉。总之，宇宙间是充满着物质的。

同时，他又说：“若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现）之物，则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⑥意思就是：从佛家说，太虚本是虚空，而太虚中

又有万象，这万象只是太虚中所显现之物，并非真的有此物存在，这样，物和太虚便不是互相资取的；既不互相资取，这所显现的物形和它的性，便各有别，从而形与性，自然与人亦不是相待而有的了。这也就是说，一切客观的存在都是虚无缥缈的，都是幻妄；自然便无所谓物和太虚之互相资取，亦无所谓形与性，自然与人之相待而有，原因是并没有所谓客观的实在。

张载认为：如果有人有这样的看法，则是“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⑦因为浮屠认定“山河大地”并非客体的实在，只是幻妄，人能见到它，那是因为人有“见病”。这显然是颠倒是非黑白的看法。张载认为：“气块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⑧按“块然”，王船山注云：“犹言滃然，充满盛动貌。”而说“气块然太虚”，意即“遍太虚中皆气也。”⑨宇宙间是充满着物质，且它的“升降飞扬，未尝止息，”从而“为风雨，为雪霜，万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结，”⑩都是它的运动变化，怎能说是幻妄而不是客观的实在呢？由于它是客观的实在而不是幻妄，所以它的“升降飞扬，未尝止息，”就是它和太虚之相互资取，就是形与性，自然与人之相待而有。

因而，他又说：“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皆气也。”⑪——意思就是：凡可状的都是实在，实在的东西自有形象；

①张子全书卷之2：正蒙太和篇第一。

②张子全书卷之2：正蒙太和篇第一。

③张子全书卷之2：正蒙太和篇第一。

④易系辞传说卦传。

⑤张子全书卷12：语录抄。

⑥张子全书卷12：语录抄。

⑦张子全书卷12：语录抄。

⑧张子全书卷12：语录抄。

⑨张子正蒙注卷1：太和篇。

⑩张子全书卷之2：正蒙太和篇。

⑪张子全书卷之3：正蒙乾称篇第17。

有形象，就是物質。這話進一步駁斥佛家以万象只是太虛中所显现之物而并非真的有的物的存在——亦就是說，把客观的存在当作幻妄的立論；而张載肯定客观的存在为活生生的现实去駁斥这种論調，这駁斥是很有力的！

接着，他認為：“气之性本虛而神，則神与性乃气所固有。”①這話，王船山注云：“性，謂其自然之良能，未聚則虛，虛而能有，故神。”又注云：“自其变化不測，則謂之神；自其化之各成而有其条理，以定志趣而效功能者，則謂之性。气既神矣，神成理而成乎性矣，則气之所至，神必行焉，性必凝焉，故物莫不含神而具性，人得其秀而最灵者尔。耳目官骸亦可状之象，凝滯之質，而良知良能之灵无不貫徹，盖气在而神与性偕也。”②

根据王船山的注释，对张載的這話自是益加明确。這話的意思就是：有物質便有精神，便有它的变化发展的本性。神与性只是存在于物質之中，离开了物質自无所谓神与性。這話有力地駁斥了佛家的“以性为虚”，而佛家之以性为虚，就是由于它以存在为幻妄。

他在另一个地方又闡明着說：“气之生，即是道，是易”。③意即有物質，即有物質的变化发展的规律，这是肯定的！

张載从探討宇宙的本体中，肯定了宇宙本体的物質性；又肯定物質是第一性，而精神是为物質的从属；把存在与意識的关联問題作了真理性的探討；因而进一步，他又这样分析道：

“心所以万殊者，感万物而不一也”。④

“心所以万殊”是“感万物而不一，”这說明物質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識。

而佛家則反是，它認為“心生种种法生，心无种种法灭。”按“法”即指物質，意即有我則有一切物質；沒有我，則一切物質便随着消失。即所謂“心法起灭天地。”这

是意識决定存在，精神决定物質，是主观唯心論。而佛家夸大主观，张載批判地說，这种的“以我視物則我大，”而“大于我者，容不免狂而已。”狂而至于“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虛空之大，”⑤是狂妄之至。

自唐韓愈以来，反佛的人頗不少，反对的理由，不是从人伦的观念出发（如認為佛不認君臣父子）；便是从單純的經濟观点出发（如認為事佛的多，則影响了生产事业），他們这样的反佛，是“只尚閑言詞，”⑥虽有若干的影响，但不是根本的，自然反不了佛。张載則不同，他是从根本上着手，而又钻研过佛理，于是他以战斗的唯物論观点，从佛理上給予佛理以批駁。这样的批駁較有力量，使对方自然容易接受。

张載虽主要的是在批判佛家的主观唯心論；但另一方面也对道家思想給以批判。

正如他批判佛家的方法那样，他也是从道家的“无”与“有”的关联問題上批判道家的本体論的。

道家本着“有生于无”的观点，說“虛能生气”。

张載則以唯物論观点，認定“虛空即气”。認定“虛空即气，則无无”。——宇宙的本体是物質，自沒有所謂虛空。⑦他举例着說：“气之聚散于太虛，犹冰凝释于水”。⑧冰固是物質，而水同样的是物質，所謂“凝释虽异，为物一也”。⑨怎的有所謂虛空呢？

又道家以“有生于无”的观点而給予

①张子全书卷之三：正蒙乾称篇第十七。

②张子正蒙注下卷九乾称篇下。

③张子全书卷十一：易說上序卦。

④张子全书卷十一：易說上系辞下。

⑤张子全书卷之二：正蒙大心篇第七。

⑥张子全书卷之七：学大原下自道。

⑦张子全书卷之二：正蒙太和篇。

⑧张子全书卷之二：正蒙太和篇。

⑨张子全书卷之二：正蒙动物篇第五。

“无”的作用以夸大，因而說“三十輻，共一轂，当其无，有車之用。”①要有这“无”，才有車的作用。

张載駁斥道：“三十輻，共一轂，則为車；若无轂与輻，亦何以见車之用？”②就是因为有物質的东西，才有物質的东西之用。

从以上看，张載的唯物思想之战斗性，自是很明显的。

张載的战斗性的唯物思想之产生不是沒有原因的，当时工商业发达导致加工生产与原料生产日益分离，致使科学技术亦呈活跃的景象，新的科学技术亦日形开展，他的唯物思想就和当时的科学思想有着紧密的結合关系的。他对宇宙本体的探討，是物質而不是精神，这和他对于天体之科学的認識是紧相联系着的。

首先，他对天体运行作科学的理解，他这样說：“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气中，虽順天左旋，其所系辰象，随之稍迟，則反移徙而虧耳。間有緩速不齐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阴精，反乎阳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为阳精，然其质本阴，故其右行虽緩，亦不純系乎天。”③——这里，他对地球五星繞日而运，月繞地球而运是有了一些体会。

其次，关于寒暑昼夜潮汐之科学的理解，他这样說：“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虽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气升降其間，相从而不已也。阳日上，地日降而下者，处也；阳日降，地日进而上者，盈也。此一岁寒暑之候也。至于一昼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系日月朔望，其精相感。”④——这里，他不仅說明了一岁中寒来暑往的道理，而对潮汐涨落主要的是受月球引力之影响，亦有初步的認識。

但佛家不仅不以宇宙的本体为物質，所以也不能从探討中給予宇宙现象以科学的理解；而“反以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之微，

因緣天地，明不能尽，則誣天地日月为幻妄，”从而“梦幻人世”，这“謂之穷理可乎？”真正的穷理，是从肯定宇宙的物质性中給予宇宙现象以科学的探討，探討中掌握了它的规律而为人們所用，所謂“范围天用”，⑤——这才是穷理。所以张載批評佛家只是“妄意天性”而不是穷理。

他这“范围天用”的話，是具有戳天主教精神的。

由于他具有这种精神，所以他对于雷风云雨的看法，就破除迷信而作了比較科学的分析。他这样說：“阳为阴累，則相持为雨而降；阴为阳得，則飘扬为云而升。故云物班布太虛者，阴为风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阴气凝聚，阳在内者不得出，則奋击而为雷霆；阳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为风，其聚有远近虛实，故雷风有小大暴驟；和而散，則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为戾气噎霾。”⑥这样的从阴阳电的矛盾去分析雷风云雨諸自然变化，确是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是科学性的分析。

又由于他对于雷风云雨諸自然现象从探討中取得了若干科学的理解，从而进一步又給予有神論以駁斥。他这样說：

“范巽之⑦尝言神奸物怪。某以言难之：

‘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见其形，或云有见者，且不定，一难信。

①老子上篇第十章。

②张子全书卷十一：易說上系辞上。

③张子全书卷之二：正蒙参两篇第二。

④张子全书卷之二：正蒙参两篇第二。

⑤张子全书卷之三：大心篇第七。

⑥张子全书卷之二：正蒙参两篇第二。

⑦范巽之名高，张載的学生。宋史卷三〇三有传。

‘又以无形而移变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提，二难信。

‘又尝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为之；人之陶冶舟车，天地亦莫能为之。今之言鬼神，以其无形，则如天地；言其动作，则不异于人，岂谓人死之鬼，反能兼天地之能乎？’

“今更就世俗之言评之，如人死皆有知，则慈母有深爱其子者，一旦化去，独不日日凭人言语，托人梦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祸淫，则或小恶反遭重罚，而大慈反享厚福，不可胜数！又谓人之精明者能为厉，秦皇独不罪赵高，唐太宗独不罚武后耶？”①

这里，他非难范巽之“言神奸物怪”，以否定“有神论”，阐明对于雷霆草木之应有科学的理解。因为物质的东西，自有它一定的理，一定的发展规律，所谓“天之生物有序，物之现形也有秩”，②人们只要从探讨中理解了它的发展规律，所谓“学至于知天，则物所从出，当源源自见；知所从出，则物之当有当无，莫不心喻③。”则自无所谓怪了。但另一面他这话也驳斥了佛家的“有识之死，受生循环，”驳斥了“浮屠明鬼”之说④，所以他历举事例说明无鬼，予明鬼论以驳斥。又从他这些话来看，他受荀子天论篇之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但较荀子说的更为透辟。

他这样说：“盖盟诅起于王法不行，人无所取直，故要之于神，所谓‘国将亡，听于

神’，盖人屈抑无所伸故也。如深山之人，多信巫祝，盖山僻罕及，多为强有力者所制，其人屈而不伸，必咒诅于神，其间又有偶遭祸者，遂指以为果得伸于神。”⑤这说明人之所以认为有神，除了对自然现象缺乏科学的理解外，在不合理的社会中，受了剥削阶级的压迫而无法伸诉，只得求神以雪冤屈，因而肯定有神。同时他还指出，从被剥削阶级来说，求神是出于不得已，但从反动统治者来说，他们之听于神，正是这一反动统治者之日趋没落的表现。

所以他认为“鬼神者”只是“二气之良能，”⑥——意即：是人物的本能——人物本身的运动形态，当人物的出生和他（或它）的壮大，自然显出他（或它）的精神来；而人物的老死，自是人物的归宿。所谓“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⑦这样才叫做鬼，而鬼者归也，就是归宿之意。所以他最后的归结，所谓鬼神，就是如自然界的寒与暑，屈与伸的运动变化，一般的人物运动变化的形态，如此而已，并非真的有所谓神与鬼。（本节完，全文待续）

①张子全书卷十四：性理拾遗。

②张子全书卷之二：正蒙动物篇第五。

③张子全书卷十三：文集抄答范巽之书第一。

④张子全书卷之三：正蒙乾称篇第十七。

⑤张子全书卷之四：周礼条。

⑥张子全书卷之二：正蒙太和篇。

⑦礼祭义。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问题

·董家遵·

四十年來关于我国社会史的分期問題，討論得很热烈，解放后这种討論进展得很快，成績也很大，但是因为这个問題牽涉的面很广，包括的內容也相当复杂，直到现在不仅国内各家的看法极不一致，即苏联方面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見，也很分歧。这里只想就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問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

有人認為我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这样主张。我以为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如何估計当时的生产工具在生产方式中的作用問題。我們知道历史的分期，不是根据生产什么来划分，而是根据怎样生产物质資料和使用什么生产工

具来划分的。封建制的产生，是在鉄器广泛推行之后，再經過很長的时间才建立起来的。我国春秋时代才发明鉄；战国以后，鉄在生产中起了重要作用；鉄器才逐渐推广起来。照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情况，在鉄器推广之后，一般是再經過数百年，封建的生产方式才能占統治地位。西周开始于公元前十一世紀，結束于公元前771年，它基本上属于青銅器时代，距战国約六百多年，如果說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那就是說鉄器尚未推广的六百多年以前，我国已进入封建社会。这种說法对于生产关系必需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原理，是不大符合的。

封建这一个名詞，很早就在我国詩經中

出現，不过它与我們今天所說的封建主义的意義，是不相同的。詩經中“封建厥福”這句話，郑玄的解释是：“大立其福”。这与我們所了解的封建制度的意义，根本不同。后来唐人柳宗元写了一篇“封建論”，①主张尧舜禹湯时，已存在了封建，周时只是更发展而已。他把諸侯、天子、君长、刑政，都認為是封建，他把階級的形成，認為封建制度已經产生。把“方伯連帥之类”看作是封建，很明显的是把部落联盟当作封建；不少同志受了古书上这类传统說法的影响，在思想認識上一时轉不过来，因此老是把上层建筑当作社会基础看待，这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我个人認為不但春秋战国时代是奴隶社会，即使西汉时代，奴隶所有制仍占統治地位。这从西汉末年存在着的矛盾就可以看得出来。西汉末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潁川的鉄官徒起义，攻击过九个郡，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山阳的鉄官徒又起义，攻击过十九郡。这是奴隶暴动，說明西汉时奴隶和奴隶主矛盾的尖銳。在被压迫的人民不断地起义后，汉成帝綏和二年（公元前七年），孔光提出限田限奴的建議，接着于公元九年，王莽实行改制，提出“奴婢不得买卖，”和“无田者授田为制”，这是奴隶主階級企图从上而下解决社会問題的反映。西汉末赤眉起义的口号，也反映了当时群众的要求，赤眉軍樊崇的口号是：“杀人者死。”这个口号，战国初墨子已提过，刘邦继承过来，赤眉軍又強調这一点。这是反对奴隶主任意屠杀奴隶的反映。

二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公元26年至38年）他曾九次下令解放奴婢，这是意味着封建制的因素正在增长，奴隶所有制正在削弱，我

① 柳河东集，卷三，“封建論”。

以为东汉以后经济方面存在着一个特点，那就是经济形式的多样性。

多样性的特点，就是自由民、奴隶、隶农都在生产中占着重要的地位。

东汉政府不断地把“爵”赐与流民，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赐爵的形式把流民变成有户籍的自由民。当然西汉也有过“赐爵”；但所赐的对象多是家长或长子，东汉赐爵的对象扩大到没有户籍的流民，这是说明东汉政府特别重视自由民，它曾十五次下令赐爵，争取更多的流民加入自由民的队伍。东汉政府懂得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照常劳动，照常纳税或服役。当时用奴以千数、以百数的豪门贵族，在记载上是不难看到的。竇融家中“奴婢以千数”，① 馮防兄弟拥有“奴婢”各千人以上。② 刘康有私田八百顷，奴婢一千四百人。③ 折国有赀财二亿，家僮八百人。④ 三国时李严也占有奴婢宾客百数十人。⑤ 直到西晋时代，官僚石崇尚有苍头（奴隶）八百人。更重要的晋武帝竟用官奴代替田兵去种田，并把奴婢五十人编为一屯，每屯又置“司马”来监督。⑥ 这是说明奴隶的劳动开始排挤了“田兵”，这样“田兵”就离开土地，脱离生产。可是奴隶劳动又是被动的，他们对于劳动毫无兴趣，因此又不得不派“司马”来监督。

我国古代的部曲和佃客，从地位上看，实与罗马史上的隶农极相似。

部曲起于西汉时代，它是军事组织上的名称，职责是一面生产，一面防御；也就是守边兼屯田，所以部曲既是战士又是生产者。西汉时他们由将军统率，是隶属于国家的队伍。东汉以后，部曲逐渐私有化。他们开始转化为私家的领兵或领主的依附者。领主有权把部曲传给子孙或其他继承人。例如：后汉人李宝，为邓禹所杀，李宝的弟弟就收李宝的“部曲”来击邓禹。⑦ 孙坚死了，他的儿子孙策就“领其部曲”。⑧ 当领主迁徙时，也常常携带“部曲”一起迁移，李典携

带部曲迁鄴。⑨ 便是一个好例。西晋时这样的情形，也有不少。⑩

部曲可以被继承，被携带，他们已处于人身依附的地位。部曲之外，还有客户，所谓“客户”，还叫复客、田客。复客主要的是依附于土地。例如：吴国曾赐潘璋的妻子“田宅、复客五十家”。⑪ 复客即免除徭役的隶农；但他们的免役，是因依附于主人的田地而获得的，所以把他们和土地一起，当作赏赐的礼品。

佃客的依附化，从西晋政府公开承认官僚地主可以“荫庇”佃客这一事，可以看得更清楚。西晋政府规定：一品官和二品官可以荫庇佃客五十户。八品官、九品官则只能“荫庇”一户。（据晋书食货志）依附于官僚地主的佃户，因受“荫庇”减免了徭役；但他们却走进了农奴化的道路。

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西晋王朝中的大官僚同时就是大土地所有者。不管“占田”的意义如何解释；但政府规定：普通男子“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一品官“占田”五千亩，其余低一级递减五百亩，九品官的“占田”还有一千亩（据晋书食货志）。大官僚就是大土地占有者，当是不成问题，即以九品官为例：他们“占田”一千亩，比普通人的“七十亩”，已超过十四倍。而且官愈大，特权也愈多，一品官占田五千亩，荫庇的佃客五十户，假使用汉人冕

① 后汉书，卷53，竇融传。

② 后汉书，卷54，馮援传。

③ 后汉书，卷72，济南王康传。

④ 后汉书，卷112，折象传。

⑤ 三国志：蜀志，卷10，李严传注。

⑥ 晋书，卷20，食货志3，咸宁元年诏。

⑦ 后汉书，卷46，邓禹传。

⑧ 后汉书，卷105，袁术传。

⑨ 三国志：魏志卷18，李典传。

⑩ 晋书，卷7，成帝纪。

⑪ 三国志：吴志卷10，潘璋传。

錯的話來計算，每戶有二人服役，共耕田百畝。^① 那麼，一品官所蔭庇的佃戶，恰好能夠耕完政府規定一品官的“占田”。可是三品占田四千畝，蔭庇的佃客只限十戶，十佃戶客如果只能耕田一千畝，結果，尙有三千畝的“占田”必須另想辦法。這樣，他們必須用奴隸或自由民來填補勞動力的缺乏，實是必然的措施。

政府把蔭庇的佃戶，控制在一定的數字之內，這是說明依附的農民正在增多，封建化也正在迅速地發展着的緣故。

三

關於封建社會的形成和發展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過這樣一個極重要的原理：“封建主義完全不是現成地從日耳曼搬過來的，它起源於野蠻人在進行侵略戰爭的軍事組織中，而且這種組織只是在征服之後，——由於被征服國家內所遇到生產力的影響——才發展為真正的封建主義的”。^②

這些話應辯證地去體會。要知道封建主義的建立，雖然和“蠻族”入侵有關，但更重要的却是他們受被征服國家生產力的影響，才發展為真正封建制度。具體地說：被征服者的奴隸制正在瓦解，而征服者的原始公社制也開始崩潰；但還保留著軍事性部落制度，在這樣條件下，雙方通過交互作用和綜合的結果，由此建立起真正的封建主義。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兩種制度互相作用的原理，也適用於我國封建化的歷史。

三世紀末，居住在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首先起兵反抗西晉統治者。不久，漢族和各族的人民，又紛紛起義。後來即發展成為我國舊史上所謂“五胡亂華”的局面。我以為西晉末“五胡”和蠻族的反抗。實際上與羅馬史上所謂“蠻族入侵”，具有同等的歷史意義。原因是當時各族與漢族人民的大聯合，不但徹底地打垮了西晉的腐朽政權，而且使我國封建化過程獲得決定性的發展。

原來“五胡”內部都存在着部落的軍事組織。

匈奴人劉聰，在稱帝滅晉後，還是沿用軍事組織來管理戶口。他“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③ 劉聰用“單于”左右輔的名義，使他們各主“六夷”的部落。這是內遷的匈奴族，仍舊保留部落組織的記載。

鮮卑的習俗，據通志卷二百說：“其語言習俗與烏桓同。”烏桓習俗的特點也是部落的組織，他們是“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呼召，各部落不敢違犯”。^④ 羌族也有部落制度的特點，羌人斂岐叛背苻堅時，曾率領部落四千餘家依附李儼。^⑤

氐人苻洪的父親懷歸，就當過“部落小帥”，^⑥ 可見氐族在西晉時，還有部落制度。

羯族是匈奴的後裔，建立後趙的羯人石勒的祖父和父親，都做過部落的小將領。^⑦

據以上簡單的考證，可以知道“五胡”都是處於原始“部落”的階段。（當然，詳細分析起來，五胡中可能有些族比較進步，

① 漢人晁錯說：“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前漢書食貨志）。

②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思想體系（1845—1846年）。馬恩全集第三卷俄文版第2版，74頁。

③ 晉書卷12，劉聰記載。

④ 三國志烏桓傳注引魏書。

⑤ 晉書卷113，苻堅載記“羌斂岐叛堅，自稱蓋州刺史，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按吳注云：張天錫傳作廉岐，姚襄載記作斂岐。

⑥ 晉書，卷112，苻洪載記。

⑦ 晉書，卷104，石勒載記（上）：“祖耶突于，父因曷朱……并為部落小率”。

另一些族又比較落后)，这也就是說，各族間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他們因迁居內地已久，①在汉族社会經濟的影响下，已进入原始公社制瓦解阶段；但他們都保存了部落的組織，却是共同的特征。

西晋时，所謂“戎狄”的人民，始終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江統所說：“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戶口，‘戎狄’居半”（晋书江統传）。他們有的被卖为奴隶，有的被迫当隶农，②有的編入军队当兵。他們与汉族的被压迫的人民，处于相同的命运，受尽汉族統治者的剝削和压迫。使他們“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因此，四世紀初发生了各族人民和各地流民联合的大起义。西晋政权就是由于流民起义和“胡族”入侵而灭亡的。西晋的复灭，我以为可以这样理解：当时奴隶排挤了自由民的劳动，制造了无数的流民。同时，又因为奴隶劳动效率很低，生产衰退了，經濟衰落了。群众生活临于絕境，造成这一切的当然就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因此，起义的高涨，不但打垮旧王朝，而且为后来封建化的发展，鋪平了道路。

公元四世紀中，统一的西晋帝国崩潰了。南方半壁河山建立东晋。东晋的政权頗象古代的东羅馬；保留了很多前封建制的残余。值得重視的是：当时北方出现了許多小王国，这些小国家，正是早期封建国家的特征。而且北方生产力发展很緩慢，自然經濟确是占了支配的地位，城市破坏，分工微弱，这些景色正是一幅封建主义刚刚东升的象征。

我同意中国封建制是由不发达的奴隶社会逐漸形成的，因此，在封建社会形成时，农村公社也有逐漸发展的趋势。例如：公元四世紀初，庾袞率領了同族的人，在禹山就建立起农村公社。他們的誓言是“戮力一心，同恤患难”，他們的办法是“均劳逸，通有无”、“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賢”。而且規定不得采伐別人所种的东西。③他們团结一

起，建立农村公社，表面看来，目的只是通过农村公社的組織来防御战争的影响，其实，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却是农村公社中的农民是自由民，他們可以推选里长，有比較多的自由，比較不容易陷于农奴化的深渊。

但总的趋向，是农奴化，这单从“部曲”的轉变上，也可以看到。四世紀以后，“部曲”的数目与日俱增。一个領主，率領数千的部曲，是常有的事，④“部曲”的來源，有的是奴隶，有的是貧苦的自由民，有的是內迁的“胡”人。因此，“部曲”的发展，正是农民走上农奴化的表现。到了唐朝，“部曲”全部农奴化了。因此，唐律上簡直把部曲与奴隶并举，从本質上說，当时的部曲乃是农奴。

前面說过，“部曲”一詞，起源于军队的編制中，⑤而“胡族”軍事化的部落組織与这种制度很近似。所以四世紀以后，各族的部落組織也与部曲制度混合起来，由此少数种族中也出现了部曲制度。这又一次証明了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社会制度綜合的原理，同样适用我国封建制度的形成。

少数民族也采用部曲制度，这是說明他們已开始封建化。

鮮卑人慕容宝（公元356—399年）拥有

- ① 西汉末，居住于西北和东北的少数民族，已开始向內地迁徙，东汉三国内迁更多，包括鮮卑、匈奴、羌、氐、羯等族。
- ② 晋书卷93，王恂传：“又太原諸部众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
- ③ 括弧引文均见晋书卷88、庾袞传。
- ④ 晋书庾亮传，晋书卷100王弥传。
- ⑤ 前汉书李广传，师古云：“續汉书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营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今广尚于簡易，故行道之中，而不立部曲也。”

很多的部曲，他曾使段仪等“收部曲于内黄”；①羌人姚弋仲的部曲，叫做馬何罗，“博学有文才”；②氐人苻坚的秦州刺史王统，降姚萇（羌人）后仍拥有部曲。氐人李庠曾当过“部曲督”。③胡人沮渠蒙逊曾代領他父亲的部曲。④

部曲是农奴化的表现，又是封建化的象征，因此，在封建化进入高潮时，部曲的数字也大发展了。南朝时，发展至“大半之人，并为部曲”，⑤可知部曲在人民群众中占了很重要地位。

近年研究封建化的論文，已发表了不

少，大体上，大家都同意封建社会形成的时间是很长的，一般要經几世紀，我国封建化的过程，也沒有例外，北魏均田制的推行，可以說封建化的进度，又迈进了一步。本文着重討論四世紀以前封建社会形成过程，其他一些問題，只好另日再談了。

1959年8月27日写于广州中山大学。

① 晋书卷124、慕容宝載記。

② 晋书卷116、姚萇載記。

③ 晋书卷116、姚萇載記。

④ 宋书卷98、氐传。

⑤ 文苑英华卷754，何之元：梁典总論。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举行 研究工作报告和展览会

建国十周年的前夕，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举行了为期三天的研究工作报告会，同时还举办了小型的研究工作展览会，作为向建国十周年献礼。

在研究工作报告会上，各个研究室检閱了建所一年来的工作，热烈地进行了討論。展览会陈列了各个研究室一年来主要的工作成果，其中包括論著、調查报告和研究資料等共約一千万字。报告会和展览会所列举的材料，充分显示出該所自去年10月1日正式成立以来，由于貫徹了研究作为工人階級的政治服务的方針，在研究工作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該所去年正式成立后，就以大部分的力量参加了“伟大祖国的广东”一书的編輯和写作任务。在全部研究活动中，对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問題的調查研究，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写出有关公社問題的論文、調查报告共14篇。該所还参加了国家关于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調查工作，一年来編写有关广东各少数民族的史志和調查报告将近一百万字。此外，該所历史研究室、經濟研究室和有关单位合作編写的“广州市十年来的私营工商业改造”、“协同和机器厂史稿”、“1840—1949年广东人民革命斗争史参考图片集”以及“毛泽东論經濟”（均为初稿）等，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在研究工作中走群众路綫，是該所一年来研究活动中显著的特点。展览会上陈列的六十多项研究成果，約占半数是该所和有关单位共同协作完成的。本所完成的研究項目，也有大部分是研究室、組内集体合作完成的。青老年研究工作人員一同进行研究，专业研究机构 and 业务部門、高等院校共同协作已逐漸成为完成研究工作的主要方法。

在这期間，还同时举行了学术报告会，該所哲学研究室作了以“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結合的产物”（初稿）为題的报告，經濟研究室对“毛泽东論經濟”（初稿）作了介紹。

关于心理科学若干問題的討論

吳江霖

心理学是以研究人的心理现象或心理活动的发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其基本任务的。它同其它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比較，乃是历史較淺的一門科学。但当它一旦为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所武装，即变成为在理論上和实践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苏联心理学就是这样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武装起来的科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年来，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馬克思主义心理学也已經成长起来了。

旧中国所謂心理学是从資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英二国）販运而来的，因之，在心理学领域中充塞着各种各样錯誤的、反动的心理学派別，如弗洛伊德学派、格式塔心理学派、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等。旧中国仅有的为为数极少的、观点錯誤的所謂“生理心理”和汉字心理的研究，及一些反动的智力測驗和心理測驗的編制。从事心理学研究工作的人也极少，其中且有一部份人改行去做別的工作。这就是旧中国心理学的面貌。

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中国心理科学的改造和建設取得了显著的成績，它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首先，全国心理科学工作者通过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認識了只有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是心理学研究的唯一正确的观点，只有在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指导下，心理学研究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其次全国心理科学工作者进行了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动学說的系統学习，明晰地認識了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动学說是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基础，是揭露心理现象的物质本体（神經过程）、負荷者的一把钥匙；而心理现象的物质本体、負荷者的揭露乃是彻底唯物主义心理学战胜一切唯心主义、机械主义心理学的重要标志之一。与此同时，全国心理科学工作者也积极地学习苏联先进心理科学。这一切都为新中国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心理科学打基础的同时，新中国心理学的教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也迅速地扩展起来了。除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心理学研究所以外，中央教育部的教育科学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山东等分院的教育研究所也已建立了心理学研究机构；全国高等师范学校都普遍設立了心理学教究組；中国心理学会及各地区心理学分会也已成立起来。此外，北京大学設有心理学专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各师范大学也都招收心理学研究生。同时，新中国心理科学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现在我国已拥有一支比旧中国大十倍以上心理学队伍。

值得特別提起的是由于党的重視，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集全国科学家制訂全国长期科学规划时，有心理科学工作者7人組成心理学科学规划小組，拟制了心理学12年发展远景规划。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心理学的发展规划列入国家科学规划內，不特对心理科学工作者有巨大的鼓舞，并且也使心理科学的各个重要領域的发展有明确的方面。

在科学研究方面，心理科学的各个領域的研究工作已开展起来的主要有下列几方面：

第一，在人的心理活动的生理机制的研究方面，心理科学工作者研究了儿童大脑皮质第一和第二信号系统的相互作用、儿童高级神经活动类型的测定等，在研究方法的改进上获得了不少的成績。此外，开始利用现代尖端科学技术和理論如脑电波、电子计算机、控制論、訊息論来揭露人脑活动的机制的研究工作。

第二，在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面，不仅运用实验室实验法研究了小学生概括化能力的发展，并且也运用了自然实验法研究了中学生概括化能力的发展。关于各科（如算术、語文、俄語等）知識的掌握和运用的心理条件的研究也已开展起来。这些都是属于各科教学的心理科学基础方面的研究。在劳动教育的心理学基础方面，心理科学工作者已开展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如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如何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心理学基础方面，心理科学工作者已开始研究班集体的形成的条件及班集体对学生共产主义性格的形成的作用，生产劳动、各科教学、团队活动在学生共产主义性格形成中的作用。教育实践原是心理学的实际运用的主要領域，同时也是心理学知識的丰富源泉，而在全国范围内从事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的人数比从事心理科学其它領域的研究的人数多，因此，可以預期这一方面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可能贡献是极多的。

第三，在劳动心理学的研究方面，心理科学工作者研究了細紗工培訓的心理学問題、冲模自动机构試制中的創造性思维問題、改进冲压机操作方法的心理学問題、轉炉炼鋼工火焰的视觉判断問題等。这些研究的成果已直接地有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劳动心理学的研究不仅对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有直接的贡献，并且对心理学理論的发展也有巨大贡献。

第四，在医学心理学的研究方面，心理科学工作者同医学科学工作者合作，运用快速綜合疗法对80个患有較重的神經衰弱症的大学生进行了为期四周的治疗，疗效极佳：100%的病者都有好轉，其中痊愈的和有显著好轉的占81.2%。这样巨大的疗效是医学心理学史上所未曾见过的。

十年来新中国心理科学的出版物也不少。除了介紹苏联先进心理科学的譯书和“心理学譯报”的出版外，还有許多心理学著作出版。最突出的是全国各高等师范学校几乎每校都編有心理学讲义或教本。此外，还出版了“心理学报”。

如上所述，在党的领导下，建国十年来，心理科学各方面的成就是很显著的。

然而，由于心理科学工作者对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伟大的思想武器的掌握还很不够，并且某些心理科学工作者本身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还没有完全清除，因此，在整风运动前，不論在心理学的科学研究上或心理学的教学上都出现了脱离实际、脱离政治、忽視从人的社会本质和阶级性去理解人的心理现象等錯誤倾向。部分心理科学工作者片面地強調“心理是大脑的机能”，忽視“心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以致造成无視心理现象的社会本质，对某些具有鮮明阶级性的心理现象仅从生理学方面加以分析。这些都是超阶级、生物学化的錯誤倾向，是心理学中的资产阶级方向。去年全国各地对这种倾向展开了批判运动，取得的成績是十分显著的。首先，在心理科学領域里清除了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影响，提高了心理科学工作者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同时在心理科学領域中扭轉了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基于这些思想認識上的重大收获，克服了“从书本到书本”的研究作风，心理科学工作者都紛紛到工厂、农村、学校、医院进行科学研究，获得了許多富有創造性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心理学中资产阶级方向的批判运动无异是扫清新中国馬克思主义心理学发展道路上的各

种障碍，一旦这些主要的障碍扫清了或基本扫清了，心理科学就更向前发展。

在批判运动中，心理科学工作者也接触到了一些心理学的学术性问题，如在心理学的对象方面，心理学要不要研究感觉等心理过程，要不要研究心理的生理机制？有没有全人类共同的心理规律，心理学要不要研究它们？一切心理现象是不是都具有阶级性？心理学是不是阶级心理学？在心理学的科学性质方面，心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还是一门自然科学或边缘科学？在心理学的方法方面，阶级分析法是不是心理学的唯一方法？要不要应用实验法？这些心理学的学术性问题，曾引起热烈的讨论。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心理学界在党的领导下，遵循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热烈地讨论了心理科学中的几个重大学术问题。这些讨论对中国心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心理科学工作者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一些人认为心理学的对象问题，迄今还没有得到解决（见“人民日报”，1959年7月6日）；一种见解认为心理学的对象问题虽然不是完全解决了，但可以说是大体上解决了（见“光明日报”，1959年8月21日）。持第一种见解的人可以分为三派。第一派认为心理学以意识为研究对象，但不是所有关于意识的问题都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他们以为心理学大致研究（一）意识的起源、发生和发展及（二）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过程（见“光明日报”，1959年4月19日及“科学通报”，1959年10期，309—312页）。这些人最近又增加“人的意识活动的特征”一项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之一（见“人民日报”，1959年7月9日）。但这一派人的意见还有值得商量的是：（一）以意识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似乎是不很确切的。“意识”和“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有相同的地方，但二者毕竟有差别，不能等同起来。一般地说，“心理”概括着从新生婴儿到成人的一切心理活动。虽然人的心理活动在社会生活条件的决定性影响下，到了一定阶段就成为有目的、方向性的、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活动，婴儿的心理活动没有具备这些特点，但他的心理活动仍然属于“心理”的范畴，因为他的心理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受社会因素（如母亲的抚育等）所制约的。“意识”则不然。它是有目的、方向性的、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活动。婴儿的心理活动都没有具备这些特点。因此，“意识”概括不了全部心理现象，而“心理”则包括“意识”在内。倘若以意识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则婴儿心理将不可能构成心理学的一个部分。苏联捷普洛夫的心理学著作以“心理”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被誉为反映苏联心理科学四十年来最新成就的苏联师范学院心理学教科书（斯米尔诺夫等主编）也以“心理现象”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尽人皆懂，有没有必要以“意识”代替“心理”呢？（二）他们认为意识的起源、发生和发展主要是动物心理学的任务。这一论点也值得商榷。首先，动物只有高级神经活动，没有象人的心理活动。伟大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以毕生的精力从事动物高级神经活动的研究，也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没有什么方法来探索动物的内在世界，“动物心理学”没有存在的权利，它的题材应归入神经系统高级部位生理学的领域内而加以研究（参看“巴甫洛夫全集”第3卷第2册，1951年俄文版，第21—22页）。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或心理活动的科学，它可以不包括动物的高级神经活动。然而为了研究人的心理活动的生理机制，在不可能对人施行手术或注射有损健康的药物的情况下，利用动物来进行科学研究是完全可以的。但这已不是以动物“心理”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之一，而仅是研究心理的生理机制中的一项措施。其次，研究人的心理的起源问题，主要是从个体的发生方面入手，亦即是从新生儿的心理活动的研究开始。以人的心理现象或心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心理科学原包

含有这一方面的研究任务。“年龄心理学”就是以心理的起源为其任务之一的科学。这一方面的研究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但它并不必然包括动物高级神经活动的研究。我们说人的心理的起源的研究不必然包括动物高级神经活动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对后者的轻视，恰恰相反，对于后者的研究，现在已有一门独立的科学专司其事，那就是“动物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至于人的意识形成以前的所谓动物“心理”阶段及从动物“心理”阶段到人的意识的发展的研究，乃是许多科学综合的任务，似不是心理学的独特任务。（三）他们认为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过程的研究是心理学的核心问题，如果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在“首先确定心理现象对于社会生活条件的依存性，同时又揭露对社会生活条件发生反映的生理机制”的原则下进行的，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一派的意见不是这样。他们仍然是偏重于从人脑的机能来研究反映过程，忽视社会生活条件对反映过程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因之，他们的见解仍然不是全面的。由于他们只偏重人脑的机能方面，所以他们认为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过程是不随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可是如果考虑到社会生活条件能够决定人的反映活动的目的方向，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同一的事物“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所发生的反映截然不同，则所谓“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过程不随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论点的适用范围是很狭小的。（四）他们认为个性是生活条件的反映，而反映是大脑的机能，因此，研究个性也不能忽略脑的反映机能的规律。就心理学必须研究个性的生理基础而言，他们的这一论点是对的。但心理学研究个性并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研究社会生活条件对个性形成的巨大制约作用。仅仅从人脑的机能方面去研究个性，是不可能全面地揭露个性形成的规律的。此外，他们还指出，个性虽是社会生活条件的反映，同阶级地位有密切的关系，但个性的结构（个性表现的方面如能力、气质、兴趣等）和个性形成的规律并不因阶级而异。这一论点有一部分是对的，有一部分是还有商榷余地的。如果说人的能力和气质的发展不因阶级而改变其本质，那是事实；但如果说人的兴趣的发展不因阶级而改变其本质，则困难便发生了。工人对劳动有极高度的兴趣，资本家对劳动不特没有兴趣而且厌恶、鄙视劳动。可见与阶级利益联系的兴趣的发展是因阶级而异的。至于作为个性的核心部分的“性格”则更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第二派的意见基本上同意第一派见解，但主张心理学应该专门研究心理过程而不必研究个性（见“人民日报”，1959年6月10日）。这是一种片面的同时也是危险的主张。个性的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并且更重要的是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为什么要把它排斥在心理学的领域之外呢？

第三派主张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具有个性的人的心理过程，是个性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和个性对于心理过程的影响（见“人民日报”，1959年6月10日及“新建设”1959年6期15—20页）。这一派强调社会实践对人的心理活动的决定作用，显然是对的，因为这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发展上起主导作用的一面。这一派的心理科学工作者较之他们在去年的主张已有很大的改变，已注意到心理学研究心理的社会历史制约性，也应该研究脑的机能。但是同他们所强调的心理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相比较，心理的生理机制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他们已公开指出，心理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人的心理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此外，个性和心理过程相较，前者显然被他们认为是心理学的主要对象，而后者在心理学中的地位就还没有被摆得很恰当。

以上三派都是属于第一种见解的三种意见。持第二种见解的则认为心理学的对象问题已

大体上解决了，现在爭論的問題主要是属于理解和看法的問題。这一种见解在某种意义上看来是对的，因为查閱苏联的几种心理学教科书，它們給心理学规定的研究对象，虽然措辞有所不同，但不外是“心理”或“心理现象”等，没有什么原則性的分歧。而“心理”或“心理现象”是什么，則在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已給予了正确的闡释。但是从实际的情况看来，如果心理学的对象問題是很明确地解决了的，那也不会出现如此分歧的爭論。如果心理学的对象問題只是“大体上”解决了而不是明确地解决了，則进一步明确这已“大体上”解决了的問題的詳細論点，对于心理科学的发展还是有很大好处的。

关于心理学的对象問題的正确解决，我認为由斯米尔諾夫等主編的、反映着四十年来苏联心理科学的最新成果的苏联师范学院心理学教科书可供我們学习。根据这书的精神，心理学的对象乃是人的心理现象或心理活动发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研究。而人的心理现象或心理活动乃是人脑的机能、客观现实的反映。这就是說，在揭露人的心理现象或心理活动的本质时，首先必須揭露心理现象对社会生活条件的依存性，同时也必須揭露对社会生活条件的反映的生理机制。馬克思教导說：“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乃是社会关系的总合”（见“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第74頁）。列宁教导說：“他，这个科学的心理学家，攘弃了关于灵魂的理论，径直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本体（神经过程），因而，譬如說，分析了并說明了某种或某些心理过程”（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124頁）。这两个指示在指导我們理解人的心理现象的本质上不特沒有矛盾，而且是統一的。前者指示我們在揭露人的心理现象的本质时必須揭露社会关系、社会生活条件对人的心理活动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后者指示我們在闡明人的心理现象的本质时，必須揭示人的心理活动的物质本体。必須把这两方面結合起来，才能正确地揭示人的心理现象的本质。自然，第一方面对人的心理活动所起的作用是决定人的心理活动的目的方向性，而第二方面对人的心理活动所起的作用則只揭露人的心理活动的負荷者。有些心理科学工作者片面地夸大第一方面的意义、忽視或低估第二方面的意义，以致現出只看到研究心理现象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的重要性而看不到或不完全看到研究心理的物质本体的重要性。反过来說，有些心理科学工作者片面地夸大第二方面的重要性而忽視第一方面的重要性，以致造成只看见研究心理的物质本体的重要性而看不见或不完全看见研究心理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的重要。前一种情况有可能导致心理学的社会学化，后一种情况有可能导致心理学的生物学化。二者都有可能成为心理学的取消派。

心理科学工作者討論的第二个問題是心理学的科学性质問題。关于这个問題，目前国内心理学界已沒有人主张心理学是一門自然科学，但是还有三种不同的见解。第一种见解認为心理学是一門社会科学（见“新建設”1959年6期6—14頁，“光明日报”1959年5月20、23、29日）。这种见解的主要困难是：把心理学当作一門社会科学，是不能概括全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的，因为如上所述，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的心理现象并不是純社会现象，而任何心理现象都有其物质本体。这种见解的另一个困难是它片面地強調人的“社会实体”，抹杀研究心理的物质本体的必要性，因而有可能导致心理学的社会学化，成为心理学的取消派。第二种见解同第一种见解稍有不同，認为心理学主要是一門社会科学（见“光明日报”，1959年5月23日）。这种见解的困难是沒有清楚地区别确定心理学的科学性质和确定心理学研究的重点是有不同的。在确定心理学是属于那一种科学时，最主要的是这一种科学能否概括心理学的全部研究对象，而在确定心理学的研究重点时，則因所研究的心理学問題的性质及研究的具体条件而异。因此，这一种见解仍然有可能导致心理学的社会学化。第三种见解認为心理

学是一门居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中间科学。这一种见解还分成三派：（一）认为心理学是一门偏于社会科学的中间科学（见“人民日报”，1959年6月10日）。持这种见解的人认为心理过程的研究主要属于自然科学领域，人的个性的研究主要属于社会科学领域，而个性的研究乃是心理学的主要问题。这一种见解的困难是：把心理过程看作是纯自然的或主要是自然的现象，乃是不正确的。心理过程如感觉、知觉、思维、想象等正同个性的一切方面如性格、能力等一样，既受社会生活条件的制约，也有其生理基础。片面地夸大个性的研究的重要性、贬低心理过程的研究的重要性，实际上有可能如第一、二种见解导致心理学的社会学化。（二）认为心理学是一门偏于自然科学的中间科学（见“人民日报”1959年6月10日，“新建设”1959年6期1—5页）。持这种见解的人认为心理学主要研究不随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人脑的反映过程，而人脑是自然界发展的结果，研究脑的反映过程，重点属于自然科学，所以心理学是接近于自然科学的中间科学。这一种见解的主要困难是：把心理学列为偏于自然科学的中间科学，正如以上各种见解一样，不能全面地、准确地概括全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随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人脑的反映过程只能是一些纯生理的脑的活动，而心理学所研究的对象远比这为多，如果按照这种见解做去，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就被不恰当地缩小了。如江苏省心理学界所指出的，这种见解有可能重新导致心理学的生物学化。（三）认为心理学是一门不偏不倚的中间科学（见“新建设”1959年7期24—26页；“光明日报”1959年5月23、29日）。持这种见解的人认为今天还没有充分的根据去站在那一边。如偏在自然科学一边，有可能向个性心理学“开刀”，偏在社会科学一边，则有可能向另一方面“开刀”。因而这是“性命交关”的问题。

我认为，要确定心理学的科学性质，首先必须使所确定的科学能够全面地概括全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根据上面所说的心理现象的本质来看，心理学乃是一门介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科学，不能有所偏倚，因为任何偏倚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忽视、贬低或甚至抹煞某一方面的心理问题的研究。这是就心理学的总的性质而言。然而在心理科学的研究的实际进行中，在下列条件下心理学是可以有所偏重的：（一）在心理科学领域里有着许多分门，如教育心理学、艺术心理学、劳动心理学、医学心理学以及研究心理的生理机制的部门等等。以教育心理学为例，它的研究对象是在教育过程中儿童和青年的心理活动的发生发展。这一类的心理现象虽然都是受社会生活条件所制约，都有其生理机制，但在对它们进行研究时，除了必须重视它们的生理机制的探讨外，重点是放在社会生活条件对这一类心理现象的制约作用上。再就研究心理的生理机制的部门而言，它虽然必须重视社会生活条件对人脑的活动的影 响，但它的重点却是放在人脑的活动的机制上。（二）各时期的心理科学研究的重点可有不同，视现实的需要而定。在当前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的情况下，多进行一些偏于社会生活条件对心理的制约作用的研究，少进行（不是不进行）一些偏于心理的生理机制的研究，仍可视为是合适的。（三）各地区各心理学研究和教学单位可按设备、人力的不同而进行一些偏于社会方面或自然方面的研究。但在进行偏于社会方面的研究时必须同时注意心理的生理机制的研究，在进行偏于自然方面的研究时也必须同时注意社会因素对心理的制约作用的研究。

关于人的心理的共同性和阶级性问题是心理科学工作者讨论的第三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已有一种多数人同意的见解，那就是人的心理活动有共同规律，心理学必须研究这些规律，但在阶级社会里，部分的心理活动是受阶级影响和制约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心理

学也必须研究这些具有阶级性的心理现象的规律（见“人民日报”1959年6月10日、7月9日；“光明日报”1959年5月29日、8月21日；“新建设”1959年6期，15—20页）。但是目前还有两种同上述见解很不一致的见解。第一种见解认为一切心理现象都具有阶级性，甚至感觉等也具有阶级性（见心理学报，1959年2期127—128页）。这一种见解的主要困难是：没有区别感觉等心理现象是一回事，而由感觉等心理现象所引起的其它心理现象又是另一回事。心理学必须研究各心理现象的相互联系，但是也必须区别这些现象的不同。第二种见解比第一种见解更趋极端，认为动力定型也具有阶级性（见“光明日报”，1959年5月29日）。尽人皆知，动力定型是巴甫洛夫学说中的一个生理概念，它被用来阐明熟练技能、习惯或情感的生理基础。人的某些情感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但作为情感的生理基础的动力定型能否被视为具有阶级性呢？倘若是的话，人的第二信号系统也应该具有阶级性了。但这样做，恐又将混淆了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界限了。

我认为，人的心理的共同性是存在的，人的心理的阶级性也是存在的。以视知觉为例，对于方形，人人皆认为方形，不因阶级地位而异。这就是人的心理的共同性的一例。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一共产主义理想，工人对之，认为最美、最善，剥削者对之，认为最丑、最恶。同一事物，因阶级地位不同而产生如此不同的判断，这是人的心理的阶级性的一例。由此可见，凡与阶级利益密切相关的心理现象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凡与阶级利益无关的心理现象都是没有阶级性的、全人类所共有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必须研究全人类共同的心理的规律，同时亦必须研究具有阶级性的心理的规律。

心理科学工作者讨论的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已没有以阶级分析法为心理学的唯一研究方法和根本废止实验法的主张。但对于心理学的各种方法的具体运用，还有着倚重倚轻的不同看法。这里只涉及两个问题：（一）关于阶级分析的运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是已为多数人所同意的，即阶级分析是心理科学研究所必须依据的原则，是心理科学研究上必须贯彻的阶级观点，但不是一种具体方法。可是就在这个问题上，也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种看法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人的意识都打上阶级烙印，因此不能离开人的阶级性去研究人的心理的变化发展，必须在研究中贯彻阶级分析的原则，甚至在研究儿童的心理发展时也必须分析阶级的影响（见“新建设”1959年6期15—20页）。另有一种看法则认为心理科学的研究必须因问题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方法，不应该对所有问题都应用阶级分析（见“人民日报”1959年7月9日）。此外，有人认为对儿童心理的研究不能作阶级分析（见“人民日报”1959年6月10日）。（二）关于实验法的运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心理科学研究只靠观察记录是不够的，必须以实验法为主要的办法，并且必须运用现代尖端科学技术和理论如电生理学、电子计算技术、信息论、控制论等，才能提高研究方法水平（见“人民日报”1959年6月10日、7月9日）。第二种看法认为心理学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单靠实验法是不够的，有些心理学问题的研究不能完全应用实验法，有些心理学问题的研究中实验法并不一定占有主要地位（见“人民日报”1959年7月6日）。

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是关系心理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我认为，全部心理科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包括阶级观点）——为最高指导原理，并以此来指导各种具体研究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谈话法、活动产品分析法、个案研究法、现代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法等）的运用。离开了这个根本原理，心理学的一

切具体研究方法都不能求得正确的研究结果。其次，实验法是全部心理学研究方法之一。它的优点在于能在一定控制的条件下对某个心理学问题的研究求得较准确的结果。在一定控制的条件下所进行的实验，其结果只适用于与这一定的控制条件相似的情境。在超过这一定的控制条件的情境中，实验结果的应用的范围就受到一定限度的限制或甚至极大的限制。因此，过于夸大或贬低实验法的作用是不对的。再次，现代尖端科学技术和理论在心理学研究上的运用无疑是必要的，它们对于揭露人脑活动的机制必会作出重大贡献，对于心理科学的发展必会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因此，对于在心理科学研究中采用现代尖端科学的技术和理论一事不应该抱怀疑或轻视的态度。然而，也必须指出，现代尖端科学技术和理论的运用，也只是心理学研究的途径之一，还不能以此来研究全部人的心理现象。因此，过于夸大现代尖端科学技术和理论在心理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也是不适合的。

心理科学工作者讨论的问题还有很多，如心理形式和心理内容的关系问题、理论研究 and 实践研究的关系问题等，这里都不谈了。

通过心理学的学术讨论，心理学上的若干根本性理论问题已取得了或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若干问题存在的分歧论点也已明确地提出来了。这些学术讨论对心理科学的发展无疑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遵循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更多的科学研究成果来丰富已解决了的问题和解决尚待解决的问题。摆在心理科学面前的任务是很繁重而伟大的。今后我们必须要在党的领导下，在心理科学的这些重要部门如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艺术心理学、劳动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心理的生理机制等开展更多的科学研究，使心理科学不断向前发展。

中山大学历史系热烈讨论“老子”思想问题

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于八、九月间先后举行了两次学术讨论会，热烈地讨论了关于“老子”思想的问题；并已写出四篇文章，作为伟大的十周年国庆的献礼。

全国学术界关于“老子”思想问题的讨论，目前正在逐渐深入，但对老子的世界观等主要问题的看法，各家的意见还有着根本的分歧。因此，该校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着重关于“老子”的世界观问题、方法论问题、阶级性问题以及“老子”其书和其人的时代背景问题等等。参加讨论的几乎一致认为“老子”一书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属于唯心的，它所说的“道”，是一种超出万物之上的绝对观念，而不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但在方法论方面，老

子却具有辩证法的因素，这是很可贵的。至于“老子”的年代问题还待考证，可以肯定的是“老子”一书为战国到汉初时代的产物。

对于“老子”思想的阶级性问题，有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是原始氏族公社没落的农民思想的反映；第二种意见认为，它是代表没落的旧氏族的贵族思想；第三种意见则认为，它的思想属性问题与古代史的分期问题有关，因而“老子”思想的阶级本质目前还不能确定。但大家都认为“老子”的思想实质是消极的、落后的和反动的，我们应给予批判。

为了把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能够进一步的开展和深入下去，今后，该校还准备继续进行讨论。（庆）

从柳永的三首詞談到 有关古典文学作品评价的問題

王 起

北宋著名詞人柳永的“乐章集”里有三首詞对宋元时期的戏曲小說有較为显著的影响。第一首是“雨淋鈴”：

寒蟬凄切，对长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无緒，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靄沉沉楚天闊。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經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設，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金元时期民間有十首詞流行最广泛，柳永的这首“雨淋鈴”是其中的一首。这首詞在宋元人筆記里有种种傳說。金元人杂剧、散曲引用它的句子或运用它的語意的更多。董解元“西廂諸宮調”的“长亭送别”一段写张生、鶯鶯在清秋的季节里离别以及张生别后酒醒梦回时的凄凉场景，不但在艺术构思上可以看出这首詞对它的影响；詞句方面如“那堪值暮秋时节”、“纵有千种风情何处說”，也显然留下了沿袭的痕迹。后来王实甫“西廂記”的“长亭送别”一场又是根据董西廂改写的。

“雨淋鈴”可能是柳永跟汴京一个歌妓离别时写的。抒情作品总是通过作家在生活里的感受来表达。然而这作品如果打动了許多人，它就一定概括了现实生活里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雨淋鈴”詞下片說：“多情自古伤离别，”这就概括了封建社会自古以来一些共同的现象。这共同现象是什么呢？那就是自古以来有情人往往不能团聚而偏偏

要离别。封建社会彼此有情的青年男女，虽然双方泪眼相看，不愿离别，結果却不得不离别，是出于广大人民的愿望呢，还是代表封建統治階級利益的势力和礼教对他们干涉、压迫的結果？我們的回答只能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样，作品就通过有情人离别时的伤心，表现了当时許多青年男女所共同感觉到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时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

然而“雨淋鈴”詞如果仅仅具有“多情自古伤离别”的抽象的概括，而没有通过艺术形象表达出来，依然不可能打动宋元以来許多讀者的。作者写一对有情人在离别前的泪眼相看，依依不舍，离别后的晓风残月，无限凄凉。这就通过艺术形象反映当时现实里带有普遍意义的問題。抒情詩不比小說、戏曲，它有时不必要把这一对有情人离别的前因后果一一交代清楚。然而从詞里所表现的情緒看，他們的离别不会出自男女主人公双方的自愿，而总是当时跟青年一代的幸福不相容的某种社会力量加以压迫的結果。

有人問：“这首詞里表现的是不是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从“帳飲”、“兰舟”、“千种风情”等詞句看，肯定不是，然而从作品的艺术形象所体现的思想傾向看，它既然从某一方面冲击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应该承認它跟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有相通之处。

高尔基說：“人民永远是乐观主义者，他們与悲哀是没有緣分的。”有人以为这首詞流露了浓厚的悲哀情緒，因而否定了它的

价值。对于高尔基这句话，如果理解为人民总是怀着乐观的态度和胜利的信心对待残酷的现实，那是正确的。如果认为在封建社会人民生活中没有悲哀的东西，那是不符合实际的。封建时代的统治阶级为了保护他们的阶级利益、门户尊严、保护他们的多妻制度，在男女关系上给青年们带来多少痛苦。因此我们应肯定作品里表现的哀愁有它的现实根据。如果把他们写得高高兴兴，好象今天青年们送爱人去学习或工作一样，那倒是不真实的。然而由于作者对生活没有更高的理想，对现实缺乏战斗的精神，因此他在作品里所表现的也缺乏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改变现状的激情。从这方面看，它和民间歌谣所表现的恋情，如“杀头好比风吹帽，坐监好比游花园”，如“丝线作桥依敢过，深林月黑有人行”，有较为明显的区别。这是作者阶级地位带来的软弱性的表现。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清现实生活中的痛苦、时代的低气压所形成的哀愁和个人叹老嗟卑、无病呻吟的区别。其次要看作者对现实生活里的痛苦的态度，是积极改变它，或消极逃避它，甚至沉没在哀愁之中不能自拔。词里的豪放派和婉约派一般可以看出他们对待现实态度的不同，前者比较积极，后者往往流于消极的等待或逃避。

第二首是“玉女摇仙佩”。

飞琼伴侣，偶别珠宫，未返神仙行缀。取次梳妆，寻常言语，有得许多姝丽。拟把名花比，恐傍人笑我，谈何容易。细思算，奇葩异卉，惟是深红浅白而已。争如这多情，占得人间千娇百媚。须信华堂绣阁，皓月清风，忍把光阴轻弃。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且恁相偎倚，未消得，怜我多才多艺。愿奶奶兰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为盟誓：今生断不孤鸳被！

这首词可以明显看出是题赠妓女的作品。词的上半首拿下凡的仙女和名花来形容

妓女的美，那是一些无聊词人惯用的手法。就词论词，它远比不上“雨霖铃”，影响也没有“雨霖铃”广泛。然而词的下半首说：“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却跟“多情自古伤离别”一样的提出了当时封建社会青年男女之间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作者在词里坚持“才子佳人”、“当年双美”的结合，客观上显然跟“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对立。后来董解元“西厢诸宫调”结曲“瑶台月”：“从古及今，自是佳人，合配才子。”可以明显地看出它受柳词的影响。“古今小说”里的“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话本，写妓女谢玉英热恋柳永，也引了这首词作证。可以看出它在通俗文学里的影响。

第三首是“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销，腻云髻，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般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鸂鶒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少年，光阴虚过。

相传柳永去见宋仁宗时的宰相晏殊，晏殊说：“听说你近来时常作词。”柳永说：“你不也时常作词么？”晏殊说：“我虽然作词，却从来没有作‘针线闲拈伴伊坐’那样的词。”两下就不欢而散。

为什么也是以写词著名的晏殊，会对柳永的“定风波”那样反感呢？首先因为这首词里所表现的思想倾向惹怒了他。

这首词上所写一个少女在大好春光里心灰意冷的形象，因为她在爱情上受了欺骗。这少女在生活上有自己的憧憬，那就是一男一女，一个读书，一个做针指，永远相伴在一处，不要分离。然而结果她被欺骗了，她所幻想的那个可以永远过共同生活的青年一去再无消息，她能不懊恨么？能不心灰意冷

么？作者写这少女是那么天真、善良，好象她早先一点也想不到会有人在爱情上欺騙她，好象一切可以由她的愿望安排，要鎖就鎖，要拘束就拘束，要伴坐就伴坐似的。这就容易使讀者通过作品中动人的形象，同情她的遭遇，憎恨那在爱情上进行欺騙的薄情少年。

封建时代的統治階級，特别是那些統治集团里的官僚，他們只許自己三妻四妾，却不允許妇女在爱情上有自己的正当愿望；只許自己欺騙、玩弄妇女，却不允許妇女控訴他們的欺騙与玩弄。晏殊家里就养有許多家妓，他虽然也写詞，却只是为了“一曲新詞酒一杯”，在无聊消遣时增加一点雅兴。柳永的“定风波”则是通过艺术形象譴責了以欺騙态度对待爱情的薄情者，同情那被欺騙的少女对爱情的要求，这怎么不会引起那些大官僚的反感呢？后来关汉卿的“謝天香”杂剧，根据当时传说，写妓女謝天香跟柳永的热恋，当柳永被逼离开謝天香时写这首“定风波”詞贈她，而且最后还由一个錢大尹，替柳永和謝天香撮合，滿足了他們在爱情上的愿望。应该肯定这位伟大的戏曲家在儿女风情戏里所表现的进步的思想倾向，跟柳永在“定风波”詞里所表现的有其一致的地方。当然，关汉卿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远非柳永所能比拟。他的部分杂剧如“詐妮子”、“救风尘”，不但揭露了当时統治階級中人物在爱情上的欺騙行为，同时还集中描写了那些被压迫、被欺騙的妇女所进行的斗争。这就把我国宋元时期通俗文学中的民主性和人道主义精神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里我想提出分析古典文学作品的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是全面而深刻地了解作家所生活的时代和他在这时代里所接触到的生活面，作家所处的时代和他所接触的生活对作家所提出的問題。再具体分析作品的艺术形象和思想倾向，看它的思想倾向是跟当时社

会里的进步势力連系的，还是跟反动势力連系的，而分別采取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另一种作法是把作品的典型艺术形象还原为作家的个人生活和個人思想，然后看这种思想是不是劳动人民的，是，就肯定；不是，就否定。

柳永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比較稳定的北宋前期。生产有所发展，都市日趨繁荣。封建統治階級为了滿足他們奢侈淫靡的生活，加深了对广大人民的剝削和压迫，土地兼并的现象在加剧进行。一些破了产的农民或中小地主，男的被迫去当兵，或流入城市作小販、苦力，女的被卖到有錢的人家作妾侍，作婢女，或流入青楼，出卖色笑。都市表面的繁荣正象这些不幸的妇女脸上的脂粉，掩盖不了她們发自内心的鬻蹙和刚刚擦过的泪痕。封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矛盾，同样深刻地表现在婚姻問題上、男女关系上以及老鴿和妓女的关系、妓女与狎客的关系上。柳永出身于官僚地主的家庭，带有当时一般封建文人的习气，玩弄妓女，这在他的詞里同样有所表现，我們必須严格批判。然而他又是一个出名的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当时統治階級的文人，使他跟封建統治階級的距离越来越远。他又长期在娼楼歌館流連，熟悉这些被剝削、被玩弄、被欺騙的妇女的生活和命运。这就有可能使他通过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在詞里反映了这些不幸妇女的命运和要求，在作品的思想倾向上体现了跟当时社会进步势力連系的一面。

柳永在詞里所表现的是不是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呢？肯定不是，或者可以說很少。在封建社会，作家受劳动人民的影响，写出符合劳动人民愿望的东西，那是可能的。要作家直接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直接为劳动人民服务，不仅柳永办不到，屈原、杜甫、李白等作家同样不容易办到。要拿这一点作标准来衡量历史上的作家作品，显然是不实际的。

我們一方面要理解在階級社會里產生的
藝術作品總被打上了階級的烙印，因此歷史上
出自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它的鮮明的思想
傾向和強烈的反抗精神，是封建統治階級
出身的文人所萬萬難以企及的。即使是歷
史上偉大的作家，如屈原、杜甫、陸游、辛
弃疾，同樣存在着階級局限性。然而另外一
面，歷史上封建統治階級和勞動人民之間不
是絕緣的。勞動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他們
在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里所表現的巨大力
量，不能不對封建統治階級里部分在生活上
接近他們的知識分子起影響，使他們在作品
里有意或無意、直接或間接表現了勞動人民
的利益與願望。這就是他們作品里的民主性
的精華，值得我們肯定。然而封建時代勞動
人民絕大多數不識字，他們不會買杜甫的
“草堂集”或柳永的“樂章集”來看，作家
在寫作時很難要求他們寫出直接給勞動人民
閱讀的東西。抒情詩又總是通過作家的生活

感受表達的，他們過的既不是勞動人民的生
活，也就更難在詩詞里直接表達勞動人民的
生活和願望。因此封建歷史時期作家在作品
里所表現的思想總是首先希望獲得同一階級
里的進步階層的支持，從而擴大它的社會影
響，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勞動人民的願望，
推動歷史前進。

歷史上出身封建統治階級的作家在特定
情況之下也有可能直接反映勞動人民的生
活和願望，如杜甫的“三吏”、“三別”，白
居易“秦中吟”、“新樂府”的部分篇章。
這些作品無疑應在文學史上給予最高的評
價，但不能以此作標準來衡量文學史上一切
作家作品。我們評價文學史上作家作品的政
治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毛主席說的“檢查
它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
步意義”。而不是看它是否有勞動人民的感
情，是就肯定，否就否定。

“中國歷代人口土地田賦統計”一書已脫稿

數達80多万字的“中國歷代人口土地田賦統計”一書，系中山大學教授梁方仲先生和他的助手們多年精心編著的巨作。該書廣泛搜集了我國自西漢到清末約二千多年間有關戶口、田地及田賦數字，制成統計表213張。全書分為正編、附編、別編等三篇。正編按內容分為甲、乙兩篇：甲編主要是關於全國戶口、田地的總情況和歷代戶口在地域上的分布情況；乙編主要匯集唐、宋、元、明、清五朝有關的全國分區田地、田賦的統計數字。附編為分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別編則為各表說明。

我國歷史悠久，幅員廣大，歷代實行的田制相當複雜，戶口和田賦數字記錄不詳不實，即使同一種書的不同版本亦記載互異。而且古人的著述如類書、文集、筆記、方志關於這方面的記載，亦至為繁瑣。因此，如何進行整理和利用這一方面的材料，是史學工作者的一項重要任務。該書的完成，對今後歷史教學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及其他各方面都有很大幫助。

該書系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編成的，備列了各種有關的記載及不同的版本並廣泛吸取前人校勘、注釋等成績以至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優點很多；特別在附注及說明中有許多獨創的見解。

大眾邏輯學講話

李匡武

第一講 从帝国主义的“邏輯”說起

——学习邏輯的目的、态度和方法

为什么要“学点邏輯”？

“帝国主义的邏輯”是諷刺的用語。它和“强盜的邏輯”一样，是指歪曲事实，强詞夺理，不合真正邏輯的“邏輯”。帝国主义者和他們的走狗經常无耻地进行欺騙麻醉的宣传；誣蔑进步的人和事；对自己的罪恶却抵賴狡辯。譬如艾森豪威尔之流，把实际上是对劳动人民残酷地压迫剝削的資本主义社会称为“自由世界”；嘴里說要寻求“和平”，行动上却不断地挑动战争；一方面声称要“維護”黎巴嫩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同时又派兵去直接侵犯黎巴嫩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象这一类顛倒是非，自相矛盾，混淆概念，全不講理的思想言行，都是“帝国主义邏輯”的具体表现。它的目的是要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辯护，为垄断资产階級服务。人民的科学的真正邏輯是实事求是，有証有据，說理說法的；目的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它在揭露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的紙老虎原形，批判修正主义，斗争右派分子等活动中，已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使各色反动派哑口无言或低头認罪。由此可见，人民的科学的真正邏輯是人民大众和一切反动势力斗争的銳利武器。

这自然不是說人們一定要先学邏輯，然后才会駁斥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派的謬論。

人們本来就是具有正确地推理思考底能力的，并不是先学邏輯才会正确地推理，正如我們不是先学生理学才会呼吸消化一样。如果不先学邏輯便不能正确地推理，那末，邏輯科学从那里产生也将无法解释。可是，学了邏輯，会使我們对于邏輯的問題由不知到知；对于邏輯的形式和规律由不明确到明确；对于邏輯底形式规律的运用由不自觉到自觉。邏輯的学习有利于思維能力、思想表达能力的培养，有利于良好思想方法的培养。学了邏輯，我們就應該能够运用有关知識去分析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种种謬論，指出它所违反的邏輯规律并抓住它的要害，致命地予以打击。因此，自觉地（即有意識地）掌握和运用邏輯底知識，对于投身到階級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的人民群众，是非常有利的。

其次，在目前全国工农业以至科学文教事业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下，各方面都不断地涌现新的問題。其中有些問題是要經過鳴放辯論才能解决的。譬如农业方面的疏植密植之爭，浅翻深翻之爭；工业方面的小厂大厂之爭；造纸业的草浆木浆之爭；漁业的养殖和捕捞之爭；治水工作的蓄水和泄水之爭；还有办工业的群众路綫問題等等，都是要通过大家的鳴放辯論，才能集中群众智慧，获得真正的解决。又如对于保守派、怀疑派、

观潮派、算賬派、条件論等等謬論的批駁，也有賴于邏輯力量的發揮。我們一定要有完全統一的思想認識，才可能有真正統一的战斗行动，从而才可能积极發揮集体的力量，使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認真地大大跃进！

此外，邏輯的学习还可以促使生活、工作和学习的邏輯化。邏輯的修养应深入到生活、工作和学习中，也就是使生活、工作和学习规律化和合理化，因而有助于生活的舒畅、工作的順利和学习的成就。不但个人应当如此，社会生活也同样要有組織、有秩序、有规划。要之，个人行动應該服从集体的行动；个人或某一单位的利益應該服从整体的利益；个人或某一单位的规划應該服从祖国建設的规划。如果个人底生活、工作和学习紊乱，不但会妨碍自己的进步和影响自己的成就，而且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組織、秩序和安全。邏輯的生活應該是有规律的，合理的，因此也应当是勇敢的，追求进步的，富于創造的，敢想敢說敢干的。許多伟大的革命領袖的生活都是如此，都可以作我們的好榜样。

一切文化工作者都應該学好邏輯。对于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馬列主义宣传員更为重要。要做好政治、外交、文艺、教育等工作，特别是要做好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要在思想战綫上取得胜利，邏輯的修养是不可缺少的。苏联的和我国的許多外交家、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哲学家的思想言論都具有惊人的邏輯力量。試举一个生动的事例：赫魯晓夫同志有一次和美国記者赫斯特談話，临別时赫魯晓夫諷刺地安慰他說：“如果你（赫斯特）回到美国之后被麦卡錫委员会传訊，我（赫魯晓夫）可以替你作証，你在談話中是曾經积极拥护自己政府的利益的”。这簡短的一两句話充分而尖銳地揭露了美国人民在法西斯的恐怖統治下一切言論行动的不自由——甚

至帝国主义的忠实狗腿也可能被怀疑、受传訊！

邏輯是一門关于思維的形式和规律的科学。邏輯的学习不但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的斗争，而且有助于人民内部的发展生产、鳴放辯論以至日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所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大家“学点邏輯”，决不是偶然的。党的指示总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由于实际生活和工作的需要，群众自发地产生了“学点邏輯”的要求。党的領導鉴于客观形势的发展趋向，了解到这种情况，便及时地、明确地指出了这方面修养的提高，以便学会自觉地、正确地运用邏輯的规律和形式的必要性。这也就是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綫的具体表现之一。

反对把白狗說成黑的！

据說我国古代的詭辯派能够振振有詞地“証明”白狗是黑的。其实，白狗总是白的，那是客观事实，决不容許歪曲。那些詭辯派即使能通过概念的搬弄，迷惑众人于一时，毕竟不能令人心悅誠服。他們的“証明”实在枉費心思，除了証明他們自己是詭辯派外，什么也沒有証明。但偏偏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学习邏輯的时候，抱着那样不純正的动机，希望在学了邏輯之后，能够把白的說成是黑的，把錯誤的說成是正确的。可是，这种希望决不可能实现；而且，由于学习态度不端正，他們决不可能学得好。

另一些人則希望通过邏輯的学习，搖身变成现代的苏秦张仪。苏秦张仪是战国时代的人，凭着他們的伶牙俐齿，游說各国諸侯，博取了个人的声誉地位，并为当时的統治階級服务。他們似乎很“雄辯”。现在还有人在羡慕他們說話的“邏輯力量”，希望学习他們的榜样。抱着这种态度去学习邏輯的人也必然会失望的。现代的科学の邏輯底学习，决不能使人“雄辯”，更不能滿足个

人的野心或为少数統治階級服务。只有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采取正确的观点和方法的人，才可能真正理解它，运用它。

还有一些人，由于对邏輯学的性质了解不够，以为学了邏輯便可以永远不再犯邏輯的錯誤。这种想法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人总是人，总免不了要犯錯誤——包括思想言論的錯誤。即使一个人具有比較好的邏輯修养，但一不小心，便会犯錯誤，特别是情况比較复杂或来不及多方面思考的时候。邏輯的学习只能使人們减少或避免一些邏輯的謬誤，却不能保証他們永远不再犯錯誤。而且連一些邏輯錯誤的减少或避免，也还是以长期不懈的鍛炼为条件的。

此外，还有一种不正确的态度足以妨碍邏輯的学习，那就是把邏輯学看成非常深奥甚或“高不可攀”的东西。自然，学习邏輯学，象学习其他科学一样，是有一定困难的。学习原来就是一种艰苦的劳动，只有不怕艰苦的人才可能在追求學問方面有所成就。邏輯有点象数学，要求学习的人开动脑筋，反复思考——特别是結合实际，深入細致地思考。对于那些思想懶汉，它的确有些可怕。可是，必須指出：邏輯学决不是非常深奥的东西，更不是“高不可攀”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到处可以发现邏輯的踪迹。自从有人类的那一天起，便存在着邏輯的思維。人們經常地（尽管可能是不自觉地）在运用邏輯的形式和规律，一切思想言論都必須遵守它。它能够成为邏輯学并称它为一門學問，也是經過人的創立和发展的。过去无数的人学习过、使用过，只要有信心、有决心、有毅力，我們也一样能学好。特别是生长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青

年，决不应畏难而退。

最后，談談关于学习邏輯的方法。首先，学习邏輯切忌死記公式和定义、規則等等，重要的是應該注意去消化理解。記憶永远是理解的可怜代替物，它永远不可能完成理解所能完成的任务。这个道理，在邏輯的学习过程中，更为显著。要認真消化理解邏輯学的理論，必須經常結合实际。所謂实际，包括当前的階級斗争和生产实践，革命史和国内外时事、政策，以至日常的写作、談話、辯論、演算、教学、判案、写总结、做报告等等。因此，要学好邏輯学，必須認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和馬、恩、列、斯的伟大著作和經常研究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的言論。

其次，学习邏輯学决不能貪多图快，不能飘浮取巧，而應該老老实实地循序漸进，反复钻研，还要独立思考，多做练习。对于一些比較困难的問題，应和同志們展开辯論，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此外，具备一定的哲学修养和科学常識，对于邏輯学的学习也是有利的条件。

总之，要学好邏輯，必須端正学习态度，澄清混乱的思想。邏輯既不能使人“雄辯”，更不能助人詭辯。科学的邏輯学和“雄辯”或詭辯的法术刚刚是相反的东西。学了邏輯，虽然可以减少、避免一些思想言論的錯誤，但是不能保証永远不再犯錯誤。邏輯学的学习虽然有一定困难，但它决不是非常深奥或“高不可攀”的东西。学习邏輯要循序漸进，反复钻研，更应注意結合实际，消化理解。

（第一讲完，全文待續。）

短論与隨筆

撫今思昔庆佳节

陈 一 百

十月一日这个伟大的节日，又来到了。我們已經贏得了第一个十年。

十年来，每逢此日，我的内心总禁不住燃起无限的欢欣。因为我不能忘記：在几十年漫长的旧中国社会里我如何惨淡地消蝕了自己的青春，而只有到了新中国誕生以后，才如梦方醒地認清了自己的生活目标和前进的道路。

年年此日，我的内心总禁不住想起了那些給我們带来了充滿希望的新生的人們：我們党培养出来的、为了祖国的自由富强而視死如归的先烈；冲破了反动势力的重重枷鎖而坚持斗争的革命者；以自己的头顱热血写下了“大渡河”、“平型关”、“淮海战役”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史詩的英雄，是他們使我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当我想起在这天翻地复的历史进程中，作为知識分子一員的我，只是坐享其成，分享着这些英雄人物所創造出来的那一份光荣的时候，我就感到自己的渺小，感到慚愧。

年年此日，我都被这样一些复杂的心情所激动，而年年此日，这些复杂心情也总是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設每一新的胜利基础上增添一些新的內容。今天，在去年全面大跃进和今年上半年繼續跃进取得空前伟大成就的情况下，这个节日使我的这种感觉更是异鮮明。如果說，在早几个年头，对新中国的富强壮大，在認識上或多或少还是属于抽象

的东西，那么在去年大跃进以来，自己就更形象地看到了祖国这个巨人在迈步前进中不断赶上或越过資本主义的碩大身影。如果說，在早几个年头，共产主义所昭示的无限美好的生活图景，似乎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那末在去年人民公社化以后，这种美好生活的萌芽，在现实中已經变成可以捉摸的东西了。

两年苦战，千般奇迹，在人类进步的历史上我們写下了最光輝灿烂的一頁。

仇視进步人类的帝国主义者不甘失敗，对于我們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总是橫加誹謗，妄图动摇我們对党的领导的信心和建成共产主义的信念。然而在这些恶毒的誹謗面前，我就总是自然而然地想起解放前反动統治給全国人民所带来的种种屈辱与苦难，想起由于祖国的积弱，自己如何在异国的土地上和万千侨胞一样的飽受鄙夷凌辱而只得忍气吞声，而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人民政权后的今天，我們的祖国一跃而为世界上的强国，作为新中国的公民也完全抹掉旧中国所带来的灵魂上的創痛。正如俗話所說的“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在这样一种鮮明的对比之下，一切想离間我們和党的关系，想动摇我們的共产主义信念，都是异想天开的、枉費心机的！

“九一八”事变方起，其时我适留学美国。那里的报纸尝譏諷我們无鋼无鉄，何以

抗日，并在巨幅漫画中刻划我們是以筷子充机枪，以鴉片烟枪当大炮。此情此景，依稀如昨，然而曾几何时，我們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仅在朝鮮战场一举而把表面上看来强大的帝国主义者打垮了，而且在发展重工业的战綫上，我国生鉄和煤的年产量去年便已超过英国，鋼的年产量亦已达到英国的50%以上。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我們的輕工业也获得飞跃的发展，产品价廉物美，銷售国外，受到广大消費者的热烈欢迎，引起了英国、日本等国資本家一片惊惶。

这些情况的出现，正是我們祖国日益强大的客观标志，是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这些新鮮事物所发生的无比威力的有力証明。帝国主义者深知过去所习用的武力干

涉，虛声恫吓或炮舰政策，对今天强大的新中国已不能起作用，因而无可奈何地只能訴之于无耻的誣蔑和誹謗等流氓手法。愈是不利于它們的新鮮事物，它們对这些事物的攻击也愈凶。反过来说，它們誹謗和攻击愈凶的东西，也就是壮大我們自己所不可缺少的事物。它們對我們的恶毒攻击，换来的不是我們革命意志的动摇，而是我們愈加坚定对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

我們今后将以愈加高涨的革命热情，厉行增产节约运动，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用冲天的干劲来取得更高速度的跃进，作为对帝国主义者誣蔑的答复，并以之紀念一年一度的伟大的国庆。

“一代不如一代！”——这是魯迅笔下的九斤老太对眼前一切事物的总結論。

九斤老太这个自以为“顛扑不破”的总結論，是有她自己的“根据”的。因为她总是觉得：年青的时候，天气沒有现在这般热，豆子沒有现在这般硬，合破碗的小銅釘沒有现在这般貴，就是造反的长毛，也不是现在这般剪人头发，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

从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一代不如一代”；

足见：“现在的时势是不对了”。

九斤老太按照自己的邏輯，推論一切，所以她一切都看不順眼，曾孙女儿六斤在快吃晚飯的时候，吃了几顆炒豆子，她老人家就不禁勃然大怒，連声叫罵“敗家相”，賭气說：“还是死的好”。

我們讀着魯迅的这篇杰作，对于九斤老太頑固保守的“传统偏見”，不会不发出幽

九斤老太的唠叨

燕 如

默的暗笑。因为她的“邏輯”，她的結論的“根据”之完全謬誤，都是明显可見的。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事事看不順眼，常常喋喋不休地唠叨着，用这样那样的話来表达“现在不如过去”意思的九斤老太，不是也数見不鮮么？

这些当今的九斤老太，自然不象魯迅笔下的九斤老太那么简单和率直了，他們同他們的前輩相比較，要复杂得多、含蓄得多。作为“一代不如一代”的“根据”，也不是天气、豆子和小銅釘了。他們談論所及，都牽涉到“国計民生”之类的重大問題。

譬如說，有些人在日常生活里，遇到一点小小的不方便，不能象过去那样可以只顧个人，不顧集体，只顧眼前，不图将来；或者在工作上要对国家对人民認真負責，多出一点力气，不能象过去那样，做的越少越好，拿的越多越好。于是，他們对过去的資

本主义旧世界总是念念不忘，談起来唾沫横濺，眉飞色舞，而对于社会主义新社会則总觉得格格不入，仿佛走进陌生的清洁环境里，自己长年不停地抓着的疥疮，突然变好起来，不再发痒了，因而仿佛若有所失，觉得渾身不自在，甚至丧失理智，老想着不如回到肮脏的但却熟习的环境去，恨不得身上再长出发痒的疥疮来。

这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和传统偏见，它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结合在一起，同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抵触的。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說来“好得很”的事情，一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和传统偏见去看它，馬上变成了“糟得很”，黑白是非，刚好作了一个头脚顛倒。

在平常日子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和传统偏见，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人們的身上，象潜伏的毒瘤一样，时显时隐，不大为人所严重注意；可是到了革命发展的轉折时期，它就突出地表现出来，对于人人必須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的重大問題，露骨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正如在土场上納凉的九斤老太一样，本来肚里已經喃喃自語地慨叹着“一代不如一代”了，曾孙女儿六斤不吃炒豆子，或者虽吃而没有让她瞧见，那倒也罢了，一让她见到，触动了她，她就要拿破芭蕉扇敲响凳脚，破口罵将起来，要一吐胸中的“不平之气”。

我們看到，有这样的一些人，按照平时

表现来看，他們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并不贊成回到资本主义旧世界去的；但是，由于他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未有改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和传统偏见还很浓厚，他們还未抛弃资本主义的立场，未有死心塌地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永远跟共产党走，因此，每当社会主义事业迅速向前发展，他們的主观認識大大地落在客观形势的后头，新事物和他們旧思想、旧意識显得如此的不調和，不相容，他們就会动摇起来，停步不前，或者返身向后走去，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反对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立场上，非难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时所出现的新事物，埋怨社会的車子走得太快，甚至十足是九斤老太的口吻，叫嚷着、反对着新生的事物。

现在有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存在严重右倾思想的人，就是沿着这条錯誤道路走向泥潭去的。

如果說，社会主义也是一个关口，那末，要順利通过这个关口，不自觉地同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和传统偏见作斗争；不下决心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树立牢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不从资本主义立场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立场上来，将如駱駝要穿过針眼一样，是不可能的。正是这样，世界观的轉变問題，今天必須着重地提到議事日程上来，努力求得逐步的彻底的解决。

“借东风”及其他

賀青

而同地提出用火破曹，以及第四十九回讲孔明祭风，不免引起一点感想。

孔明“借箭”之后，周瑜邀其入帐共飲，說思得一破曹之計，欲求教于孔明。

最近偶然重翻“三国演义”，看到第四十六回写赤壁之战前，周瑜和孔明二人不約

“……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自写于手内，看同也不同？’瑜大喜，教取笔砚来，先自暗写了，却送与孔明，孔明亦暗写了。两个移近坐榻，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观看，皆大笑。原来周瑜掌中字，乃一‘火’字，孔明掌中，亦一‘火’字。”

好一个“……乃一‘火’字……亦一‘火’字”。此谓之“英雄所见略同”。根据原书看来，在孔明“借箭”之前，周瑜并未想出火攻之计；就是想出了，也断不会泄露于孔明。那末，周瑜、孔明二人掌中同一“火”字，你说怪也不怪？（据第四十七回称，庞统亦主张火攻。）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当时的情况是，八十三万曹军虎踞江、汉，与东吴都督周瑜统率的军队，隔江对峙。一场大水战看来是免不了的。但是，若以兵力而论，众寡悬殊，单靠水战，周瑜未必能操胜算；而当时又没有飞机，用的又是木船，因而只有火攻才是上策。这就是周瑜、孔明二人同出“火”字的原因。也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摸到了如何破曹的客观规律。

然而，到这里，加上庞统的“连环计”，使曹军战船钉作一处，问题也只能说解决了一半。“欲破曹公，宜用火攻”，是解决了。可是，由于周瑜居于江东，要实行火攻，东南风就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当时又正值隆冬之际，欲得东南风极难。所以矛盾就集中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上面。对于这个难题，正是“东风不与周郎便”，周瑜表现无能为力；而孔明由于精通天文气象，知道日内将吹东南风，于是乎借题发挥，高筑七星坛，身披道衣，跣足散发，来了一折“借东风”。这样，在读者心目中，“神人”孔明，自然要比周瑜高明得多。其实，孔明之所以高明，赢得多少人的喝采，乃是因为他掌握了自然的变化规律，在有无东南风这个问题上，他就能使自己成为自由的人。

尽管“三国演义”作者对于孔明“借箭”、“祭风”，绘声绘影地加以描写，在卧龙先生身上抹上了浓重的神秘色彩；但对于孔明由于通晓天文，事先就知道将有大雾，有东南风，是交待清楚了的。周瑜却不知道孔明有这方面的学问，当真以为风是孔明借来的。在他看来，孔明自然就是有“鬼神不测之术”的人了。而对今天的读者，事情却很容易明白。虽然这是讲的远在唯物辩证法产生以前的故事，当时不可能出现现代的哲学术语，可是孔明之所以能“神机妙算”，还不是由于他是把自己的判断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認識的基础之上？还不是由于他充分地发挥了主观能动作用的缘故？

二

認識到应当使自己的行动符合于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毕竟是比较容易的事；而要使自己的行动真正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往往困难得多。那末，应当怎么办呢？要使主观符合于客观，既不能象王阳明“格”竹子那样向壁苦思，也不能漫无目的，乱抓一气，或者搞了一大堆材料，抓住一点表面的、片面的东西，就以为掌握了客观规律。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要象毛主席所经常教导的，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对于“实事求是”四字，毛主席曾给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改造我们的学习”）

当然，客观事物是错综复杂，变化无穷

的；可是，它又是可以为人們所認識的。在这里，脱离实际，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实际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压根儿不知道，固然談不到認識客观规律，就是整天在“实际”之中，占有的材料很多，如果不是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加以分析研究，“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結論”，也将会得出錯誤的結論。因此，強調尊重唯物論，尊重辯証法，就有重大的意义。而尊重唯物論，尊重辯証法，首先就要尊重群众，要走群众路綫，要通过广大群众的革命实践，来研究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来檢驗和修正自己的主观認識。尽管从对客观规律无知或知之不多到知，需要一个过程，其間可能要碰上許多釘子，但是通过实践，我們就能一步步地接近于知。在这里，最怕的是“不为”，而不是“不能”。“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則难者亦易矣；不为，則易者亦难矣。”这是一个清朝人講的話，这话是有道理的。

实践的过程，認識和掌握客观规律的过程，也就是發揮主观能动作用的过程。不論做什么工作，研究什么学問，离开了人的自觉的能动性，沒有干劲，都将一事无成。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巧妇之堪称为巧妇，乃在于她在“为炊”这件事情上，有着过人的智慧。

可是，有些人对于主观能动作用，也就是对于意識对存在的反作用，估計不足。他們对于本来是客观条件許可，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和經過主观努力可以完成的任务，不去努力完成，这当然是錯誤的。辯証唯物主义所說的主观能动作用，既与唯心主义完全不同，也与机械唯物主义有根本区别。我們經過落实的各项任务和指标，是須要“跳一跳”才能摘下来的果子，这就是說，它一方面是客观条件許可，是挂在树上的果子，而不是天上的星星；另一方面它又是必須經過主观努力——“跳一跳”才能摘下来的。忽視了客观的现实可能性，或者忽視了人的主

观努力，都是不正确的。而目前的主要危险，則是害怕困难，松劲泄气，对主观能动作用估計不足的右傾保守思想。

三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既沒有打算認真通过革命的实践，認識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設的规律，也不可能从我国的大跃进中領悟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大作用；相反，他們却把我們的大跃进污蔑为“小資产階級狂热性运动”，这样他們就只能夸大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的某些局部的暂时的并且已經糾正了的缺点，把一个指头甚至半个指头的問題，說成是十个指头。“攻其一点，不計其余”。这自然就不止是認識的方法問題，而是世界观的問題，是資产階級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內的反映。事实是誰也无法否認。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是大跃进的，成績是光輝灿烂的，就是我們的敌人，也不得不深为震惊；这正是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的伟大威力的表现，是把客观可能性和主观能动性統一起来的結果。

周瑜、孔明，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了。虽然他們的决定用火破曹，以及孔明的能够預測风云变幻，合乎發揮主观能动作用的道理，但是，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他們，是根本不可能意識到这点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毛泽东时代的今天，我們全国人民在党领导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指引和鼓舞下，有着明确的奋斗目标，同心同德，意气风发，高歌猛进。因此，多少人間“奇迹”，也就不断涌现，多少建設事业的碩果，也就被“跳一跳”地摘了下来。“神人”諸葛，要是旧地重游，面对“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景象，也非弄得瞠目結舌不可。

一九五九年国庆节

广州市数間革命历史紀念館及博物館正式开放

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及新民主主义革命重点地区的广州市，留有許多可資紀念的革命文物及革命历史的地址。除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民运动講習所旧址紀念館”早已整修开放外，今年国庆紀念前后，經广东省广州市文物保管领导部門修繕或补充新的紀念文物并正式开放的有：曾經指揮英勇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三元古庙”、“黃花崗起义总指揮部旧址”、“广州起义紀念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館”等等。这些紀念館、博物館收集了大量有关历史的紀念文物，是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良好场所。三元古庙于1857年英法侵略联軍攻陷广州时遭到破坏，现在重新修繕，辟作一所规模相当大的紀念館，保存了当时抗击英国侵略軍的許多紀念文物，那面指揮三元里人民反击英国侵略軍的黑旗，因为历代保存于“更練館”中，“烂了照样再造”，一直保存至今。“黃花崗起义总指揮部旧址”在广州市越华路小东营五号，广州起义紀念館在維新路公安局內，都征集了或补充了許多有关革命历史文物。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館設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內，文物系按历史发展阶段陈列的，其中重要的展品有洪秀全、孙中山先生等在广东进行革命活动的史迹及文献資料、大成国所遺留下来的李文茂克复柳州的告諭、黃鼎凤的令箭等实物、海陆丰和广东各地农会成立的証件文件、农軍軍旗武器和当时在广州出版的农运刊物等等，尤为珍贵的是展出了毛泽东同志所主办的农民运动講習所时編著的农民运动丛书等。

敬 致 作 者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本刊本期出版特大号，承蒙学术界人士大量賜稿，特表示感謝。但由于篇幅关系，本期未能尽数刊用，我們打算將質量較高的在本刊上繼續刊出；未能刊出的，將尽可能迅速退回作者，請作者原諒。

理论与实践 編輯部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日

学术月刊

第十期要目
十月一日出版

· 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

更高地竖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社论〕

- 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力量源泉 姚耐
关于企业史料工作的若干问题 史惠康
纪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发表二十周年 刘振海 殷洲
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胜利前进〔纪念七一公社诞生一周年〕 步会庭
论“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沙文金 马俊芝
重读十年前的“六评白皮书” 刘良模
两类社会矛盾学说对正确处理我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
指导意义 漆琪生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我国的传播 蒋学模
解放十年来的上海物价 江南
从上海和平大厦谈起 谢去
十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五篇〕

学术月刊编委会编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各地邮局均有出售

理论与实践

月 刊

1959年第10期(总第22期)

编辑者: 理论与实践编委会
广州越秀北路中国科学院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大南路43号

1959年10月15日出版

印刷者: 广东人民印刷厂

发行者: 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预订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本刊代号: 46-71

刊号: (穗)0368

印张: 4

定价: 每册二角